

大历幕府诗研究

——以韩翃、戎昱、卢纶、李益为探讨中心

THE POETRY OF MILITARY COMMISSIONER'S OFFICE STAFF IN THE DALI PERIOD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WITH A FOCUS ON HANHONG, RONGYU, LULUN, LIYI

谭雅琴

TAN YA QIN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Nov 2016

大历幕府诗研究

——以韩翃、戎昱、卢纶、李益为探讨中心

THE POETRY OF MILITARY COMMISSIONER'S OFFICE STAFF IN THE DALI PERIOD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WITH A FOCUS ON HANHONG, RONGYU, LULUN, LIYI

By

谭雅琴

TAN YA QIN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Nov 2016

摘要

中唐大历，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苦难时期。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外有契丹、回纥等强敌地持续侵扰，内有连绵不断的叛乱与战争。生长于大历时期的韩翃和李益等诗人在国家混乱、科举艰难的现实条件下，为了生存和理想的实现，诗人们背井离乡，进入幕府。

本论文首先从中唐幕府诗盛行的时代背景作为切入点，通过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唐大历时期的政治局势、社会风气和诗人的思想变化。第二章则通过对活跃当时的四位大诗人，韩翃、戎昱、卢纶、李益的入幕原因和幕府生活地分析，为大历幕府诗的内容论析和艺术特色作下铺垫。第三章和第四章，则对大历诗人的幕府诗进行综合地探讨，以主题内容为分析单元，结合诗人在幕府之中的遭际，整理出幕府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独特感受。试图通过分析不同幕府环境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以期在分析探讨的过程中展现大历幕府诗的总体创作风貌。第五章，则以诗歌的语言表达、情景呈现和审美风格三个方面来探讨大历幕府诗的艺术特色，深刻体会诗人在诗歌中对人生境遇的反映以及思想感情的传达。

关键词：大历幕府诗 韩翃 戎昱 卢纶 李益

ABSTRACT

The Dali period of Mid-Tang is a suffering period, which is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After “The rebels beat their war drums, making the earth quake And Song of Rainbow Skirt and Coat of Feathers break” An-shi Rebellion, the Society of Tang Dynasty was caught up in upheaval. Outside there is a powerful enemy such as Khitan and the Huihe nationality, who was giving the continuous invade and harass to Tang Dynasty. Inside there have the endless Rebellion and War. Hanhong、LiYi and other poets who were growth in the Period of Dali,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national chaos and the difficul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achieve the dream, the poets leave the hometown, enter into the shogunate.

First of all, This thesis will take the era background of the Shogunate poem is popular as the cut-in point, Through three aspects to discuss the Dali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s political situation, social atmosphere and the change of poet’s thought. The chapter two through the four great poets who were active at that time, Hanhong、Rongyu、Lulun、LiYi’s shogunate life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that poets enter into the shogunate, which provided basis for artistic features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Dali shogunate poems.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 the Dali shogunate poems from the three fields of language expression in Poetry、the scene presented and the aesthetic style, Deeply understand the Reflection of life circumstanc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ich is shown in the poet’s poems. The last two chapters will comprehensive discuss the shogunate poems of poets in Dali period, take the topic content as the analysis unit, According to the life experience of poets in the shogunate, Sorting out the shogunate poets’s unique feeling that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ream and reality. It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s on the poets of the shogunate, in order to through the analyze process to show the overall creation style of the Dali shogunate poems.

Key words: The Dali shogunate poems Hanhong Rongyu Lulun LiYi

致 谢 词

本论文得以顺利地完成，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林志敏助理教授。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他给予了悉心地帮助和指导，让我在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的求学生活变得简单而充实。在与老师的多次相聚时光中，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术理念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也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在生活中，林老师亦给予了我深切的关怀，让我这在异国求学的学子倍感温暖。在此，特向林志敏老师说声：“老师，谢谢您。”

同时，我要真挚地感谢叶秀清副导师对我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感谢廖冰凌老师在研究方法课上的教导，感谢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我莫大帮助的陈明彪老师，还有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的其他老师的关心和爱护等等。异国求学的艰难与困惑，在拉曼大学的中华研究院中已然变得简单而快乐。感谢拉曼大学的李树枝助理教授、林良娥助理教授和余历雄助理教授对我论文所提之建议，这些建议对我论文的修改和完善有着莫大的帮助，使我获益匪浅。

感谢一路走来，仍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家人。家人的支持与精神上的鼓励，不仅是我求学道路上坚定不移的动力，更是我人生旅途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感谢家人在我困苦、彷徨、焦虑之时的陪伴、理解和支持。同时，感谢马峰师兄、梁丽秋师姐、以及与我一起赴马求学的同学，在学业上的相互交流和切磋，在生活上的陪伴与帮助。

读研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个梦想能够在马来西亚得到实现，皆有赖于林老师的信赖和帮助。老师，请容许我再次对您说声：“谢谢您！”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大历幕府诗研究——以韩翃、戎昱、卢纶、李益为探讨中心为谭雅琴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日期：2016年11月09日

—————
(林志敏)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016年11月09日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谭雅琴（学号：14ULM07880）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林志敏助理教授指导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大历幕府诗研究——以韩翃、戎昱、卢纶、李益为探讨中心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毕业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谭雅琴）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谭雅琴

日期：2016年11月09日

目 录

摘要	i
致谢词	iii
论文核实书	iv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	v
论文声明	vi
绪 论	
一、课题研究之确立	1
二、课题研究之价值	3
三、研究范围之划定	6
四、前人研究之成果	7
五、撰写方法及架构	15
第一章 中唐幕府诗盛行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科举入仕的艰难	20
第二节 幕府林立的局面	22
第三节 入幕风气的形成	27
一、心怀理想 一展抱负	29
二、现实和生计的需求	31
第二章 诗人的幕府环境和生活	
第一节 诗人入幕原因探讨	35

第二节 诗人的幕府生活	46
第三章 大历幕府诗的内容论析（一）	
第一节 报国壮志之作	65
第二节 军旅写照之作	69
第三节 幕宴陪游之作	76
第四章 大历幕府诗内容论析（二）	
第一节 送别亲友之作	85
一、以应酬交际为主的送别诗	85
二、以个人缘情而作的送别诗	91
第二节 思乡情怀之作	98
第三节 人生喟叹之作	108
第五章 大历幕府诗的艺术特色	
第一节 诗歌的语言表达	118
一、简洁凝练的白描写实	118
二、意蕴丰富的典故运用	122
第二节 诗歌的情景呈现	127
一、情景正衬之景悲情悲	128
二、情景反衬之情悲景喜	131
第三节 诗歌的审美风格	133
一、雄壮浑厚	133
二、清新隽丽	137
三、苍凉悲慨	139

四、蕴藉含蓄	141
结 语	146
附录 诗人年谱	152
参考书目	166

绪论

一、课题研究之确立

诗，是古人表达情感、意念最直接的形式，不仅直接表现诗人个人的感受，同时也集中地展现了一个时代人的思想与感情活动，尤其是其内在的心灵状态。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曾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华兹华斯，1979：17）。唐朝（618—907）是继汉朝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上兼容并包，中外文化地融合为唐代文学地发展创作了极为有利的环境。诗歌这一古老的文学题材也在唐代“发展到了极其丰富和相当完美的阶段，诗人们潜心于诗艺，对诗美作自觉地追求，如绚丽的早霞，如开屏的孔雀羽，许多的作品经得起千百年来读者的观赏而不衰”（李元洛，1990:812）。然而唐代诗歌的发展却并不是一直高速而平稳地发展，而是存在着不同的段落时期。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年）冬，“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1979：238）的安史之乱，将唐代社会从繁荣拉入了一蹶不振的深渊。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乱成了唐朝由强盛到衰落的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同样也引起了文学的变化。作为唐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唐诗，时代的苦难淡化了唐代诗歌中“开元、天宝盛世繁荣时期的兴象玲珑、骨气端祥的韵味，同时诗歌中的理想和浪漫色彩也逐渐消退”（袁行霈，1999：175）。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曾在《诗薮》中以“气骨顿衰”四字来评价安史乱后大历诗人们的诗作风格。这一结论似的评价，使得处于开元天宝年间与元和之间的大历诗人们陷入了被人忽视的角落，这一时期的诗歌“既没有引人们的重视，也没有唤起人们研究的兴趣”（蒋寅，2009：2），就连宋人严羽也在著作《沧浪诗话》中云，学诗

的人应该“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严羽，1961:1）。

因此，历来对于大历诗人的研究是很少的。

“任何看似平庸的作品都以其合理的存在而不可随意忽略”（许总，1994:331）。因此大历时期的诗歌也绝不能因一句“气骨顿衰”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从大历初至贞元二十余年是唐诗发展的停滞时期，从贞元中到大和初约三十年间诗坛又出现大活跃的景象”（戴伟华，2006:46），文学的发展总是在不自觉的发生着，并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识而抹杀其留下的轨迹。蒋寅也曾提倡“我们不应以‘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学诗者自居，而是应站在一个文学史研究者的立场上，用文学史的眼光去看待大历诗，那么它就决没有可忽视的理由”（蒋寅，2009:5）。但很令人惋惜的是，“交汇成盛唐之音的观念、气魄、情调全都黯淡了、褪色了、低沉了，为一种疲倦、衰颓、苍老而又冷淡的风貌所取代”

（蒋寅，2009:22）。几乎已成了历史、学术界对大历诗风的刻板印象。一直到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一书的出版，其中对大部分的大历诗人生平进行了详细地研究，使得对大历诗人的研究上从零星个别的诗歌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将人们研究的视角引向从整体上来把握大历诗人的创作和表现特色。特别是蒋寅《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的相继出版，更是开启了学术界对大历时期诗人和诗歌研究的热潮。通过对大历诗人们诗歌的全面审读之后，我们不能否认胡应麟对大历诗“气骨顿衰”评价的正确性，但在阅读大历时期诗人们诗作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在面对国家衰败，社会陷入苦难之时，大历的诗人们也有气势浑厚，表现精神昂扬的诗作，并不一味地体现为胡应麟所言之“气骨顿衰”。诗歌或因为“时代社会的种种特质和限制，（但）也有其历久弥新、俟诸百世甚至放诸四海的永恒性和普遍性”（黄维梁，1987:23）。作为生于开元天宝年间而

长于大历期间的诗人们，在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深重灾难后，能以积极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面对国家的灾难，慷慨地前往战争的前线地带——幕府，以自己的亲身遭际为我们状写下诗人在从幕之时的深刻感悟与人生体验。因此，作为中国文学史组成部分的——大历诗人的入幕生涯及其诗歌创作活动，同样也是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

二、课题研究之价值

但凡研究中唐诗歌的学者文人，都难以忽视幕府对唐代历史的影响。中唐以后的文人几乎都曾进入幕府。投身幕府，是中唐时期文人们进入仕途的一条重要途径。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权力至重，集军、民、财政于一身，伴随节度使的出现，全国处处都有方镇幕府”（张巍，2007:26）。幕府自辟僚属，便宜置员，幕府的用人制度是极其自由的，不仅可以不守朝廷的法规，而且也不必遵守朝廷仕进程序地制约。因此，随着幕府权力地扩大。幕府开始接待和容纳越来越多的文人，文士也渐渐依靠幕主而升沉起伏。幕府大开的格局，也使得文人们纷纷涌入幕府。戴叔伦、顾况、韩翃、皇甫冉、李益、刘长卿、卢纶、戎昱、司空曙等都曾有进入幕府的仕途经历。据不完全统计，中唐以后曾入幕的重要作家，为数当在 70 人以上（戴伟华，1994）。

成长于唐代社会转折中的大历诗人们，或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或为生计而选择幕府生活，或鉴于由宦入世的心理，也曾积极入幕。尽管理由和目的不同，但是大历时期的诗人几乎都曾有过入幕的经历。因此研究中唐以后的文人，不可避免的都要涉及到诗人的幕府经历。幕府经历深刻地影响着文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精神面貌，而这些深刻的影响，则通过诗人的笔端得以呈现，这即是幕府诗的

创作。那哪些才算是幕府诗呢？历来研究诗歌的学者们对幕府诗都并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都是直接将幕府诗等同于边塞诗。这样直接导致了研究者们对幕府诗的忽视，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诗人在幕府时期的真实经历与思想感情。这种基于幕府环境的创作，其实不仅扩大了唐代诗歌的表现主题，而且将幕府之中将士们的精神风貌，幕府文人的苦、乐、成、败，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反映其心理活动的诗歌诉诸笔端，同时诗人也在诗中折射出自己对政治、社会、时代的感悟与思考。虽然有些幕府诗歌会因为幕府环境的限制而语意隐晦，但这些同样也具有可贵的研究价值。笔者认为，对幕府诗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深入地了解文人在幕府中的生存际遇以及心理变化，同时也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幕府诗中所反映出的复杂情感。

但是纵观历来有关诗人的研究似乎都不怎么重视，甚至是忽略了诗人在幕府期间的生活和经历。对于诗人在幕府中的创作——大量反映幕府活动及其心理的诗歌——却很少研究，没有注意到幕府诗歌所透露出的情感体验，也没有意识到幕府经历对诗人眼界的开阔和创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卢纶在幕府之中的创作《和张仆射塞下曲》：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卢纶，1989：255）

该诗历来评价甚高，乔亿引李攀龙云其“音律高健，语绝雄健，堪入盛唐乐府”（乔亿，2004:181）。又如李益幕府创作诗歌之《塞下曲》：情调高昂，写出了诗人无惧牺牲的报国壮志。

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支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李益，1985：135）

上述两首即是大历诗人的幕府创作，为我们展现了边塞将士的英勇善战，其奋勇杀敌的紧张气势描绘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内容充实，气势壮阔，寓意隽永。

直到1990年，戴伟华的《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一书，才让诗人的幕府生活与创作，引起了学术界研究者地重视。但其中比较遗憾的是对于幕府诗人的诗歌创作研究并不深入，仅以一小节述之，难成系统，其中还有很大的提升发展空间。综而观之，可以发现无论是专书还是个人的研究，学术界都还没有真正的研究成果。

“任何看似平庸的作品都以其合理的存在而不可随意忽略”（许总，1994：331）。因此，要正确认识和确定幕府诗所蕴含的价值及其在唐代诗歌中的地位，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幕府诗的概念，而概念的确定，则需要反映出唐代幕府诗歌的基本风貌和艺术类型。由此，笔者认为，唐代幕府诗是包括边塞诗在内，反映唐代诗人幕府活动以及在此活动中情感变化的诗歌。幕府诗之类型，以其主题的表现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报国壮志之作、军旅写照之作、幕宴陪游之作、送别亲友之作（以应酬交际为主的送别诗、以个人缘情而作的送别诗）、思乡情怀之作、人生喟叹之作等类型。

基于以上的研究认识，笔者以安史之乱为界限，爬梳在中唐大历诗人中入幕，而且留存诗歌较多的诗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据笔者统计：

戎昱：今存诗124首，幕府诗40首；

卢纶：今存诗 339 首，幕府诗 57 首；

李益：今存诗 165 首，幕府诗 56 首；

韩翃：今存诗 171 首，幕府诗 30 首；

笔者拟通过对所选取四位入幕诗人作为中心进行研究，以历史时代为背景，结合中唐社会的变革和唐代地理等相关知识，全面梳理诗人在幕府之时所作的诗歌，对其进行系统地阐述、分析，深入挖掘诗人诗歌所蕴涵的意蕴。透过诗歌窥探诗人创作时的复杂心态，并以此探寻诗人蕴藏其内心深处的人格，以求真实地反映入幕诗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从而明白幕府生活对诗人生涯、仕宦生涯地影响。这将有利于我们对大历幕府诗歌的时代特色进行全面地理解，同时也让我们更加重视大历时期幕府诗人在诗坛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三、研究范围之划定

本文研究将主要以中唐大历时期为时代背景。在对大历幕府诗人的爬梳中，笔者发现虽然大历时期进入幕府的文人很多，但是进入幕府的绝大部分文人，其所留存的诗作是非常少的，有的甚至没有留存下任何的文学作品。因此，笔者在全面爬梳中唐大历时期的入幕文人及其所留存的诗作后，选取出生在安史之乱之前，而其行迹活动主要在大历时期，并且幕府诗作留存较多的四位著名诗人：韩翃（？-783？）、戎昱（740—801？）、卢纶（748-799）、李益¹（748-829）为研究对象。四位诗人的生平事迹、交游情况、创作背景及其生活环境皆是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所论述的对象韩翃、戎昱、卢纶、李益等人的入幕时间，均在

¹ 蒋寅在《大历诗风》中云“李益虽然身至耄耋，身历数朝，但是其主要影响是大历时期，且与大历诗人相酬唱，创作中又明显的表现了大历诗风，所以也放在大历时代来研究。”

中唐大历年间，因此，笔者结合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地分析考虑，将本论文的研究年限以代宗大历元年（766）为上限，下限则定在太和三年（829）。

“文学作品正是作家特定时代的心灵标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折光。真正的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和人生苦难，也来源于作家的心灵和情感”（熊烜艺，2008：1）。本文主要即四位诗人之作品来考察诗人内心之情感变化，但诗人在进行创作之时，有时会以诗题或内容清楚的表明诗歌作于何时、何幕、何地，有时则会表达得隐晦艰深，难以判断诗歌是否作于幕府之中。因此，在四位诗人的幕府诗作认定上，有时是难以明确辨认的。本文的考虑方式是全面深入地结合历代学者关于诗人作品的分析和判断、新旧《唐书》中的传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中的相关资料记载，历代诗话中的评论材料和诗歌赏析资料等等，力求客观、准确地对诗歌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地点进行认定。

四、前人研究之成果

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前进的坚实基础与灯塔，只有在对前人已经取得成果进行客观综合地分析与考察之后，才能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幕府，作为入幕诗人进行创作的主要地点，幕府所在之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影响诗人进行创作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幕府及其幕府制度的研究有必要进行梳理。

对于幕府及其幕府生活的研究，学者们历来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题材来看待。其研究主要是对各个时期的幕府进行介绍，如唐代幕府的研究、清代幕府的研究等等，着重于对其中的制度、使团、政治、戎旅等的介绍。通过对幕府的多方面研究，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等都有很大帮助。（于伟，2012）其中

对唐代幕府制度介绍得较为翔实的是 2003 年石云涛所著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这本著作，从八个方面对唐代的幕府制度进行了论述：幕府起源和唐以前幕制、唐前期行军幕府、唐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唐后期行营统帅幕府、唐后期藩镇幕府、唐代幕府辟署制性质和作用、幕府宾主关系与唐代政治、唐代幕制与士风，对了解唐代幕府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纵观唐朝诗歌的研究历史，通过对文献知识的仔细搜寻和梳理，发现对于入幕诗人和幕府诗歌创作的研究很少。学者们在进行诗人个体研究和边塞诗的研究中，对诗人的入幕经历也只是将其作为诗人的生平事迹来进行考证叙述，其中对于入幕诗人的研究中也似乎重点强调诗人有关边塞诗的创作。对于入幕诗人在幕府中的其余诗歌创作则很少提及，甚至是忽略了诗人在幕府中的诗歌创作。

比较专注于论述幕府与文学的是戴伟华于 1990 年出版的《唐代幕府与文学》一书，书中对幕府的起源来历和唐前、唐后期的幕府进行了简略地概述，对文学家的入幕人数、时间、地点和籍贯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同时也对中晚唐时期，幕府兴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文人在仕宦幕府时的优越性、幕府文士生活与创作等加以考述。其中比较可惜的是大部分内容只是做了简单介绍，并不详实。紧接着，戴伟华又陆续出版了《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著作，其中又补充了许多的资料。这些详实周密的材料为研究大历幕府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扫清了障碍，是后来学者们研究诗人所必不可少的珍贵材料。

在戴伟华的研究基础上，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幕府与文学的关系：如伊赛梅的〈唐代幕府与唐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与传播〉、霍虎成〈略论唐代幕府与唐人小说关系〉、戴伟华〈我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和〈唐代文学与幕府关系研究〉等。上述期刊文献研究中也仅仅是简单地叙述了唐代幕府与唐人小说之间的创作和关系，

而对于其他方面则没有探讨。

此外，以入幕诗人和幕府诗为研究对象的期刊和单篇论文式的专题研究，目前手上可查者寥寥可数。期刊论文计有杜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浅论李商隐的幕府生活与抒情创作〉、周蓉〈唐末幕府诗人的仕进心态及其创作〉和张震英的〈诗句无人识，应须把剑看——论姚合反映幕府戎旅题材的作品〉等，对具体有关幕府诗歌研究则有以下的论文，陆婵娣《李商隐幕府诗研究》、于伟《杜牧诗文与幕府生活》、李世柏《韩愈幕府创作研究》、徐璐《杜佑淮南幕府及其文学活动研究》、咸晓婷《元稹浙东幕府文学研究》。这些论文对诗人个体、或是以幕府为整体进行研究，但究其研究的对象，皆属于唐代之晚期亦即是晚唐。这些文章所构的框架及其梳理的脉络，对笔者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至于本文所选取的四位大历诗人的文献研究中，除了李益的研究比较多之外，其余戎昱、韩翃和卢纶的研究很少，并且研究所涉及的面也是十分窄小。下面是历史上对大历诗人研究与四位诗人的研究成果：

（一）大历诗人之研究

学术研究史上，对大历时期诗人的研究，显得颇为冷淡。一般只对“大历十才子”研究较多，而且往往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比较专著的研究有蒋寅的《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集中地讨论了整个大历时期的诗风风貌，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大历诗人的名家，为后来研究大历诗人的人们提供了详实可考的资料。其中单篇论文则有黎文丽〈大历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储仲君〈大历十才子的创作活动探索〉、刘燕燕〈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创作〉、丁放〈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叶琴《论大历诗人对谢灵运的接受》、

张雅青《论大历十才子》等，其中张雅青的研究中第二章第二节提到了入幕诗人韩翃和卢纶，从韩翃和卢纶的生平经历的相似性入手来考察韩翃、卢纶在创作上呈现的异同，但是也并没有对诗人的幕府生活和创作进行详细的研究。

（二）韩翃研究

关于韩翃生平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鞠飞的〈韩翃生平考述〉、〈韩翃生平补考〉和〈韩翃的生卒年考〉三篇，以及鲍俊琴的〈韩翃生平考论〉，以上考证理据充足，都是研究韩翃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关于韩翃诗歌研究中的主要成果是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和《大历诗风》。在《大历诗人研究》中，蒋先生在对韩翃生平作了概述之后，主要从“萧疏风格与意义”、“滞后的装饰风格”和“从盛唐余韵到装饰的堕落”三个方面对韩翃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大历诗风》中，蒋先生把韩翃作为大历诗人群体中的一员，综合分析了大历时期诗歌的整体风格和特色，然而却忽略了对韩翃的诗歌进行个案研究。除此之外，还有鞠飞〈论韩翃诗歌的艺术特色〉、鲍俊琴〈论韩翃诗歌的语言风格〉和骆耀军的〈论盛唐余韵里韩翃诗歌的“枫”意象〉等。

单篇学位论文则有：2009年曲阜师范大学邢振霞的《韩翃及其诗歌研究》该文主要对韩翃的生平以分期的形式进行梳理，对生平中的一些环节做了具体的阐释，并分析了韩翃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2010年四川师范大学张颖的《韩翃研究》一文，则以韩翃的作品为基础，参照史料记载，勾画韩翃的交游情况，再现诗人真实的面貌；同时结合韩翃的诗歌作品，具体地分析韩翃诗歌的题材特点、艺术特色及其送别诗创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韩翃诗歌题材的缺失、送别诗别情的新变、诗歌风格的多样和结构的

整饬。

（三）戎昱研究

研究戎昱的期刊论文有黄圭的〈略论戎昱的诗歌〉、蒋寅〈戎昱的诗品与人品〉、黄慕白〈戎昱入蜀前后行踪及部分诗歌的系年〉、杨军〈戎昱籍贯考辨〉、李军〈戎昱诗论〉；孟修祥〈屈宋式生命关怀——论戎昱诗〉、周绍良〈《唐才子传·戎昱传》笺证〉、许智银〈戎昱离别诗研究〉、许智银〈戎昱在江南地区的生活与创作〉、何旭〈中唐诗人戎昱生卒年考辨〉、陈文丽〈戎昱入幕考及其入幕心态分析〉、郭睿〈戎昱诗歌用韵考〉、何旭〈中唐诗人戎昱籍贯考〉、谢锦文〈戎昱诗歌“绝似晚唐”的荆楚地域文化渊源〉。

学位论文有：2005年何旭的《中唐诗人戎昱研究》中分上下两篇来对诗人进行研究。上篇作者根据现存的史料典籍、戎昱及同时代人的诗作、当代学者对戎昱的研究资料等，从籍贯、生卒年、入幕及仕宦经历、交游四个方面对戎昱的生平经历进行考证，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得出了新的结论。对于诗人的入幕也进行了一些考证。下篇则是重点对诗人的诗歌进行研究，从关注现实、再现历史关怀民虞、怜悯士卒讽时刺世、针贬时弊济世报国、喟叹人生、秋思送别五个方面对戎昱诗歌作了分析与探讨。该论文对诗人的一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索，比较全面，但其中对诗人的入幕诗歌却没有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

2006年刘艳云的《戎昱诗歌研究》则是直接对戎昱诗歌的内容、思想内涵、艺术风貌进行探讨，分析了戎昱对杜甫的继承与其时代精神的折射，其中比较新颖的是对戎昱律诗的缺陷及其成因进行了浅析。可惜并没有对诗人的入幕及幕府创作进行考证和研究。

（四）卢纶研究

王述尧〈卢纶的行旅诗与边塞诗〉、吴玲玲〈略论卢纶与李益边塞诗取材角度的不同〉和霍有明〈试论卢纶的边塞诗〉，这三篇文献都是对卢纶的边塞诗进行研究，其中吴玲玲的文章对于笔者的论文具有启发作用。除此之外，史广超〈卢纶家世生平补考〉、卞孝萱〈卢纶的生平与创作〉、乔长阜〈卢纶事迹考辨〉、傅璇琮〈唐代诗人从考·卢纶考〉、储仲君〈论卢纶的交游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和蒋寅〈论卢纶诗及其对中唐诗歌的影响〉等资料，都对卢纶的家世生平、创作过程和事迹进行了详实地考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让笔者能够从整体上对卢纶的一生进行把握。

刘初棠校注的《卢纶诗集校注》，是一部对卢纶诗歌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的成果。另外，对于“大历十才子”整体研究的论著中也有少许涉及。总体上，前人较少关注卢纶诗歌本身的艺术风格及其心理成因，仅局限于对其边塞诗的论述以及生平的考证。

有关卢纶研究的学位论文有四篇：

2007年河北大学赵林涛的博士论文《卢纶研究》，从卢纶的生平及思想、卢纶的交游考、卢纶的题材和内容、卢纶的风格及成就、诗集版本源流这五个大的方面对卢纶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有利于笔者从宏观上对卢纶进行把握。

2008年西南大学熊炬艺的《卢纶诗歌的心态研究》，则从卢纶诗歌创作心态地形成、表现来探析卢纶的矛盾人格。

2009年山东大学徐涛的《卢纶交游研究》，主要在卢纶生平及其诗歌所作考证的基础上，通过材料的爬梳、分析，以及新材料的发现，对卢纶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考证，即有关卢纶的交游及行年考证。

2011年广西民族大学张爱琴的《诗意的栖息和中和之美——卢纶唱和诗的审

美研究》，则另辟蹊径从卢纶唱和诗的审美形式、审美内容和艺术审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卢纶诗歌的新内涵。

（五）李益研究

李益的研究相较之前的三位诗人而言，则是学者们研究最多的，其文献研究资料颇丰。但这些文献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考证李益的生平、诗歌创作（尤其是边塞诗）、诗集整理等方面。这些考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益的研究做了新的探索，主要围绕在以下四个方面：

1、生平研究

卞孝萱的《李益年谱稿》在前人的考证基础上，辅以李益诗文和友人作品的分析比照，对李益的行迹作了详细考订，认为李益为“陇西姑臧人”，此外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之李益考颇有分量，内容多有创见。此后的诸多论文都以这两部力作作为底本。较有影响的论文，如畚正松、王胜明《李益生平及诗歌研究辨证》一文，则认为李益为“陇西狄道人”、非“大历十才子”成员。

2、边塞诗研究

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李益边塞诗的研究论著不断涌现，由此对李益之探讨更为广泛、深入。此类文分别从以下三方面来探讨：

（1）、内容上的阐释：王冠英《浅谈李益的边塞诗》、赵伯陶《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王胜明《论李益的边塞诗》、李海莉《苍凉悲怆的边塞新声——李益边塞诗浅论》、谈悠《论李益边塞诗新意》等，这些论文着眼点在强调李益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建功立业的抱负。

（2）、艺术上的赏析：计有祝德纯的《李益边塞诗格调新论》、葛培岭《苍凉悲怆的边塞新声——李益《从军北征》读感》、石克鸿《李益边塞绝句的意象组合》、

赵谨〈李益边塞诗语言艺术探析〉皆是主要以李益边塞诗在抒情、语言等艺术特色上的赏析。

(3)、继承影响和比较研究：罗时进〈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分析〉、王宇可〈王昌龄、李益边塞诗作异同论〉、刘波〈试论李益、王昌龄边塞诗的不同思想趋向〉等，这些论文对李益边塞诗的研究多有裨益。

3、绝句艺术及其他题材的诗歌研究

李益七绝一体，前人认为其可与李白、王昌龄并驾齐驱。但今人研究其绝句的论文却不多。有张国伟〈李益的绝句初探〉、龙建国〈浅论李益的七言绝句〉、郭弘〈色、音、情的完美组合——析李益七绝〈从军北征〉艺术特色〉等。对其他题材诗歌的研究仅有送别诗，如高少传〈李益送别诗论〉。

4、李益诗歌意象的研究

计之有石克鸿〈论李益边塞绝句的意象组合〉和肖希凤〈论李益诗歌的意象构筑〉等等。

研究李益之学位论文有 5 篇：其中吉林大学张巍的《李益边塞诗歌论稿》和宁夏大学赵谨的《论李益对盛唐边塞诗在接受》都是从边塞诗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前者通过对李益的生平事迹和诗作中引出对边塞诗的研究，探讨李益边塞诗中的七言绝句和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后者则从李益边塞诗的概述中引出李益对盛唐边塞诗精神内涵和艺术的接受。

此外，新疆师范大学任南玲的《李益诗歌意象意蕴研究》，则从李益诗歌中前人较少涉足的意象及其所蕴涵的精神文化意蕴入手，以李益在不同时期创作诗歌时，所选择的不同意象为研究对象，并在把握李益整个生命历程的基础上，对意象进行系统的阐述和深入的挖掘，以揭示李益内心世界的精神文化内涵。

河北大学杨柳的《李益诗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贺同赏的《李益诗歌与中唐诗坛》，都是从李益整个人生和诗歌创作为研究对象，而前者则是从李益的生平和诗歌题材的内容、艺术风格、绝句和意象展开研究；后者则是将中唐诗史切分为大历、贞元、元和三个阶段，在划分的相应时段中对李益诗歌与中唐诗坛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梳理。

在对文献整理与爬梳的过程中，笔者对诗人的生平形象越来越清晰，在整体把握诗人一生之同时却也显出了本文的主旨，四位大历诗人之多风多雨的入幕生活皆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甚至并未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其结果则是诗人在幕府生涯中快乐抑或苦闷之生活、不为人知的遭遇、复杂多变的情感及其诗歌创作难以观其梗概。因此，在掌握上述资料的基础之上，本文选取大历时期的幕府诗人的创作进行研究，以此作为大历幕府诗研究的突破口，在中唐时期充满多变的大环境下和诗人从幕际遇的冷暖背景之下，力求更为全面，客观、深入地了解大历时期幕府诗人及幕府诗的创作。

五、撰写方法及架构

本文从唐代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通过对诗人的家世生平、入幕经历和幕府环境的全面细致地梳理，并结合诗人的诗歌文本，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和解读，探讨大历入幕诗人幕府诗创作的内涵和情感体现。本文拟选用文献分析法、文本研究法、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法和文学心理研究法等相关理论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²是指对历史的研究文献进行广泛地搜集，并对其进行有效地鉴

² 文献分析法，又称文献研究法，是通过文献研究反映科学知识产生的程序，是一切方法的方法。文献的现代定义为“已发表过的、或虽未发表但已被整理、报道过的那些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别和整理,通过对文献的系统研究和分析,从而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一种方法。如第一章中即用“文献梳理法”分析前人学者对诗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与成果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把握诗人的研究状态。

(二) 文本研究法

诗歌文本是研究文学的根本所在,同时亦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内容。诗歌文本是诗人通过高度凝练的文字配以诗歌特有的韵律,来向读者表达和诠释诗人对外在事物独特的情感接受。只有通过对文本细致的分析与解读,才能深入地了解诗人透过诗歌所要向读者所传达的诗情、诗意和诗境。如第三章对大历幕府诗的艺术特色进行探讨时,更是大量地运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在第四章、第五章的大历幕府诗创作之内容论析中也是采取此类方法。但是在研究诗歌文本所要表达的情感时容易受笔者个人主观感受的影响,因此,笔者在对诗歌文本进行解读时,尽量参酌权威学者的诠释和评论意见,力求态度之客观,以提高文本解读的客观有效性。

(三) 社会历史研究法

社会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胡经之、王岳川,1994:24)的传统研究方法。作品虽是作者主观体验的展现,但是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总是会在一程度上深受当时所处社会的环境、时代、宗教和风俗状况的影响。因此,那些不属于现在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需要我们回到作品创作的时代和文化中去,否则那些作品就是不可理解的和奇怪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1958:59)因此我们在解读大历幕府诗人的诗作时,同样需要将诗人及创作的诗歌置身于其所产生的时代和文化中,才能对大历幕府诗的创作进行有效的解读。如第一章中横向的论述了大历幕府诗所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

加深对诗人文本创作背景地理解。

（四）传记研究法

圣伯甫云：“艺术的价值依存于艺术家的价值。”（勃兰兑斯，1982，380）传记研究，即是悉心寻找作品与作者之间的联系，通过搜集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传记资料”³，来探寻诗人的家世渊源、人生经历和人格心理等等，并以此作为解读诗人作品的依据。孟子曾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焦循，1987：726）这其中所包含的“知人论世”正是对传记研究法的准确阐释。诗人是诗歌生命的赋予者，诗人的人格特征、生活经历、时代环境和创作动机，皆是影响诗人创作诗歌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精准而正确的解读诗歌中所蕴含的意义，则必须对诗歌的创作者进行深入的了解。

（五）文学心理研究法

宋人朱熹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朱熹，2002:350）一切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将生活中的事物通过自己的审美心理，将其心所领略的美感经验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心理活动是极其特殊的，然而作品所要表达的也就是这种特殊的心理活动。诗歌是诗人心灵的表达，是诗人创作和读者接受的中介。读者可以透过诗歌去窥探诗人创作时的心理，并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等各要素进行分析，深层次的揭示诗人的心理蕴涵。（钱谷融，2003：285）因此，在第四、五章对大历幕府诗的内容论析中，通过对诗人作品内容的详细分析，以掌握诗人创作时的心理活动，这对于作品创作的深入

³ 传记的种类很多。例如，研究对象自述生平是自传和由他人代述经历的他传；记述一个人生活经历的专传和记述多人生平事迹的总传；根据第一手资料编写的“原始性传记”和根据二手资料写成的“研究性传记”；史传和传记文学；等等。

各种传记大都以社会生活为背景，叙述人物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生活历程和行为表现，记载人物的姓名、性别、生卒年代、时代背景、籍贯、家族、婚姻、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工作成就、生平事迹、人际交往、嗜好、特长、闲暇活动、疾病史等。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人物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各类传记的撰写人员、编写目的、资料运用、记述手法、文体形式和公开程度均有差异，因而在研究中必须认真考察其真实性。

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在上述研究方法基础之上，还要配以地理学方面知识的研究方法，诗人的作品中常常涉及到很多历史上的地理知识，如唐代具体的州名、地名、风景名胜等等，现代社会的地理知识对古代地理知识有继承也有不同，因此需要在作品分析与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仔细爬梳古代的历史地理知识，力求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准确的分析，充分掌握诗歌的创作时间与地点，借此理清诗人的创作脉络，这对于笔者理解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论文撰写方面，首先说明论文选题的确定及意义、研究范围的划定和对象的界定。第一章是交代大历幕府诗创作发展的背景。拟以中唐大历时期科举入仕的艰难、幕府林立的局面和由幕入仕的风气等方面，以求在宏观上为理解幕府诗人的入幕及其幕府创作提供合理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则是详细地交代四诗人的幕府生活和自然、地理、人文环境。诗歌的创作是诗人心境的表现，因此，要准确地理解诗歌中所透露出的意境，就要了解诗人作诗时所处的环境，这样不但可以了解幕府所在之地的风俗习惯，而且可以进一步的了解诗人远处异地他乡的感受，以便能尽可能的揣摩诗人的创作心境。第三章则是大历幕府诗的艺术特色，以诗歌的语言表达、情景呈现和审美风格来进行综合的探讨。第四章和第五章则是对大历幕府诗内容的综合分析，以求在对其内容的分析中对大历幕府诗的总体创作风貌进行把握。结论部分，则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在结论中归结本文的研究心得。

第一章 中唐幕府诗盛行的时代背景

法国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里云：“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丹纳，1986:7）为了正确地理解幕府诗的创作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因此有必要对幕府诗的创作背景进行爬梳。

幕府诗的形成，是当时人在仕途困顿和科举入仕艰难之时，面对日益窘迫的现实生活，将自己的理想和生活，主动或者被动地托付于幕府之中。在唐代政治大环境的转变下，作为幕府诗作发展温床的幕府，因为有了唐中央的支持而得到全面的发展。幕府政治地位日益上升，以致最后其地位甚至可与中央政府一较高下。客观的环境可以说是影响人们思想最深远的因素，而诗歌创作又是人们思想观念下的产物。因此，在文人们的笔下，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生活、对理想，对影响自己人生痕迹的深刻感悟。通过对文人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思想内涵，我们不难得知唐代文人对幕府生活的真实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互为表里的文学创作和幕府生活是彼此相互交融的。因此在幕府盛行的时代潮流中，唐人不论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难免受到幕府文化的感染，并且涵盖的范围十分深广，当然也为幕府诗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力的条件。以下试以中唐时期幕府的大环境为主线，通过下列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些促成幕府诗创作的时代因素。

第一节 科举入仕的艰难

“学而优则仕”（李学勤，1999：259）。这句话虽然简短，但却强而有力，总是不断地激励着历朝的读书文人，同样也回荡在唐代文人心中。唐代初期，文人们入仕的方法有很多，如科举、杂色入流和门荫入仕等途径。随着唐朝社会的发展，逐渐以科举取士之途最受文人们所器重。《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由天子自诏者曰制举”（宋祁、欧阳修，1975：1159）。三者之中生徒和乡贡的考试是定期举行的，而制举则是皇帝根据当时政治时局的需要，而特别召集知人名士所进行的考试，并没有固定的时间。因此，唐代的科举主要指的是乡贡。乡贡的科目有很多，而其中最令文人们趋之如鹜的则是明经与进士科。明经一科因主要重视经典的熟记和注疏，而忽视了经书中的义理旨趣，因此明经一科渐渐不被考生所重视，而进士科及第后位居显位者的人数比重，却在逐渐增加⁵。加之唐朝政府对文学的厚宠，自高宗永徽年间以后，进士科开始独树一帜，成为士人趋之如狂的对象。科举取士之途是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将开放政权给社会（钱穆，1996：426），此法的确为唐朝选拔了不少优秀杰出的人才，也给唐代广大社会中出身不同的文人提供了仕进的道路。

开放荣耀的科举入仕之途看似为一条光明大道，但其中的艰难困苦却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也许我们可以从《唐摭言》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王定保，1959：4）一语中，窥见进士之途的艰难。有的文人屡次参加考试却一次次的接连落榜。沈千运，盛唐天宝年间人，自幼聪慧过人，苦读诗书，数次应举而

⁵ 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有 29 人，其中只有房玄龄和侯君集两人为进士；而高宗时期宰相为 41 人，其中出身进士的宰相所占比例为四分之一，即 9 人；武则天时期由明经和进士及第的宰相人数为 20 人，占到了宰相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及至唐朝全胜时期的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27 位宰相中的 18 位宰相为科举出身，所占比重又增加至三分之二。

不第，年龄老大，失意归隐汝州，赋诗自嘲：“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衰落当捐弃，贫贱招谤讟。壮年失宜尽，老大无筋力。始觉前计非，将贻后生福。”

（傅璇琮，1996:302）高蟾，河朔寒士，历时十年考试，“累举不第”，终在马侍郎的同情与极力推荐之下才得以中举。韩愈，七岁读书，十三岁能文，却三次应举不第，“四举而后有成”；有的甚至为科举考试，奋斗了好几十年而才中举。

孟棻，出入考场三十余年亦无所成；留下“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彭定求等编，1999：8318）的曹松，为科举考试奋斗一生，直到70岁时才因年老而特放中举。

文人们为科举考试如痴如狂，但科举取士的人数却显得僧多粥少。每年科举取士人数不过数十人，录取之数仅占应试报考人数的百分之一二。杜佑在《通典》卷十五记之曰：“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杜佑，1988:357）由此可知唐代文人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者极少。虽然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年）到永淳二年癸未（683年）增加了进士录取人数，其“每年平均录取二十四人，比高宗初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吴国宗，1992:167），但是及第进士录取增加的人数相比参加考试之人，数量仍然是非常少的。继之而来的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参加科举考试之人则更多，有时甚至有上万人。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记曰：“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封演，2005:16）；《通典》卷十七选举五中也云：“举人大常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杜佑，1988:420）。由此可知，唐代文人参加科举考试要及第的困难程度，异乎寻常。

即使中举及第，士人们也仅仅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而已，还需要经过吏部的铨选、鸿词试、拔萃试，通过之后才由朝廷授以九品县尉之类的官职，正如诗

人欧阳詹《及第后酬故园亲故》中所云：“犹着褐衣何足羨。”（彭定求等编，1999:3918）高适，解褐为汴州封丘尉；许景先，进士及第释褐为夏阳尉；皇甫冉，玄宗天宝十五年登进士第，释褐无锡尉；也有参加吏部考试却始终未能通过的，如韩愈曾四次应试，方才中举，后又三试博学鸿词科考试，却都被挡在了大门之外，始终都未能成功释褐入仕。

就算成功释褐入仕，亦有“仕者非累资序。积劳考。则二十许年。不离一尉”（元结，1975:139）的情况，更有“六十尚不离一尉，有才能者，始得如此，稍敦朴者，遂以终身”（王溥，2006:1597）之现象。如此艰难险阻的科举入仕之途，使得唐代的一些文人们开始绞尽脑汁以觅投机取巧之法⁶，寻求快速仕进之法。

仕途之路布满荆棘与拥塞不公，唐代文人们发出了何以“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天”（李商隐〈商於新开路〉，2004:654）的呐喊，这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彭定求等编，1999:1686）。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正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1987:13），中唐时期幕府林立的局面为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士人，打开了另一扇通往实现自我理想的大门。

第二节 幕府林立的局面

“幕府”作为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载：“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

⁶ 一、或行卷干谒，为了增加考官对自己的印象，而将自己生平所作之最好文章送到权贵公卿之手，以求得赏识，以期社会名贤向主考官举荐自己及第；
二、或通过座主与门生之便的裙带关系结成朋党，以期求得引荐；
三、或直接向权贵献谄奉承之辞，来求得仕进。

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司马迁，2005:1905）说明在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经常发生军事战争，而李牧作为赵国的大将军，常在雁门关驻扎，以防备其匈奴的进犯。李牧在其驻扎之地“便宜置吏”可以自行辟署官员，而其地方之租税也要运送到“莫府”之中，以作为支撑“莫府”正常运作的费用。其下集解注亦谓之将军征战行军之时没有固定的常驻之地，且以其行军所在为其治所。

随着幕府的设置，为了维持幕府正常的政治管理及其正常地发挥幕府运转功能，一种有别于其他制度的办事规则和行动准则也伴随着幕府的产生而建立，即幕府制度。“幕府制度是一种行政长官自主行政(包括军政和民政)的制度。”（郭润涛，1997:3—14）从这项制度可知，在幕府之中，幕主拥有绝对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是主宰着幕府中的一切。

幕府是随着军事行动出现的，因此存在于军事系统之内，事实上指的是军府。幕府内的府主和僚属的关系是上级和下属的关系，而非平等的关系。僚属是府主自相辟用的，随着其职权范围的扩大，逐渐演化为幕府自辟用人的幕府制度。

唐朝，自建立之初至灭亡，幕府在唐朝历史的洪流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幕府中，武将和文吏皆是幕府府主所需招纳的对象，武将用以应付战事和突发的事变，文吏则帮助府主处理军务，出谋划策，两者分工不同，需各司其职。

随着唐朝政府地建立和国家政权地巩固，临时性的行军幕府开始渐次废除，既而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军镇幕府，同时行军统帅也由战争时的行军大总管，变为地方军镇幕府的常任最高长官。唐初之时，于关内设置二百六十一府，同时为了保卫边防，防御敌寇，缘边也必须置兵，因此缘边地区也多置府。此时的府还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幕府，因唐朝初期实行的兵制是因袭于隋朝的府兵制。府兵制的军官和士兵是分开的，分别由唐朝政府直接统领。府兵之府，是有别于州县行政区域之外的专用军事区域的名称，只是政府军队驻扎之地，而军官则属于中央直辖的十六个卫，十六卫都设置大将军。大将军于在打仗时统军出征，战事结束后，兵还归于府，将军则归于卫（钱穆，1989:67），各不相涉。

府兵起源于西魏，唐代因而继之。府兵之实行在太宗高宗时效果较好。高宗、武则天之时，天下战乱较少，久不用兵，日久承平，府兵之法开始遭到破坏，以致“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宋祁 欧阳修，1975：1326）开元十一年（七二三年）时宰相张说上奏书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同时将所募到的十二万人称为长从宿卫。开元十三年，又将其更名为彍骑。后来直到天宝时期，彍骑之法又考试废弛。天宝八年，折冲诸府已无兵可交，以致其府仅保留兵额、官吏之名而已。世无久远不弊之制，是在乎随时的刷新。（岑仲勉，2000:214）伴随着府兵制度的日渐浸耗，作为府兵制补充手段的募兵制，开始成为唐朝政府兵制的主要来源。京城上番宿卫与缘边的戍兵渐由也募兵制招募充之。自此，兵民关系由合一变成了分离，士兵逐渐脱离农业生产而成为职业雇佣兵。

唐朝初期政局稳定，在缘边地区的对外战争均保持胜利进攻的状态，先破东突厥，薛延陀；后败西突厥，皆于战胜之后于其地新设州县，并以都督府管辖治理；接着又在新疆西部和波斯东部地区相继设置州县，以十六都督府统领。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朝廷在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皇帝时期经历数次的变乱，唐中央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边防开始松懈，西北和东北的突厥、吐蕃、契丹部落势力强盛，连连寇边，边疆战事紧张，频繁冲突。为了防御异族，保卫疆土，睿

宗唐于景云年间开始设置节度使，“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司马光，1956:6656），后又于景云二年（七一一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宋祁、欧阳修，1975:1329）。自此，节度使开始成为固定的正式官职。

后至玄宗开元初至天宝初年，先后于沿边要地广设八个节度使，至此加上睿宗时期设置的两个节度使，一共十个节度使。节度使成为固定的军事地区，统领其属下的州、军、镇、城、守捉等。节度使设置之初本只为防戍之职，是纯军事的性质，但此后战事的持久性使得本是临时统领兵马的节度使，不得不在边防设置重镇，镇守边防。此时的节度使不仅掌管驻扎边地的军事权力，且受命之时又得赐双旌节，掌握了地方的军事生杀大权，而且开始兼任设置于景元年间的度支使、营田使和具有监察权利的采访使，权力范围日益扩大，而且边将任期时间也颇长。《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上云：“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袁枢，2005:2004）。这种带有军事性质的节度使逐渐成为统领道的最高长官后，“幕府也就成为节度使府的代名词了”（杨国宜、陈慧群，1991:332—340）。安史之乱时，玄宗为了尽快弭平战乱，在内地也增置不少兵镇，设置观察处置使，由节度使兼任统兵。为了加强作战区域将领的作战和防御能力，玄宗准许与安史叛军抵抗的朔方军和在要冲之地扼守的节帅皆可以自行招募兵马，自备甲仗和器械，自调士兵粮食，其下属的官署及其本道内的郡县官皆有节度使自行辟署。此时节度使的性质由纯军事开始变成了暂时的军事和地方行政长官合一。于是，节度使手中便有大量的日常公务需要有人处理，因此相应的机构也随之建立起来。据《新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三十九下》中所载：

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馆驿巡官四人，府院法直官、要籍、逐要亲事各一人，随军四人。节度使封郡王，则有奏记一人；兼观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抚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兼支度、营田、招讨、经略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复有遣运判官、巡官各一人。

（宋祁、欧阳修、1975:1309）

上述的职务大多数是由文人来充任的，就连武职性质的“掌弼戎政。居则习搜狩，有役则申战守之法”（宋祁、欧阳修、1975:1309）的行军司马也是由文人来充任，李翰在《淮南节度行军司马厅壁记》中云：“行军司马之职，弼戎政，掌武事，居常习狩之礼，有役申战阵之法。凡军之攻，战之备，列于器械者，辨其贤良；凡军之材，食之用，颁于卒乘，均其赐予。合其军书契之要，比其军符籍之伍，赏罚得议，号令得闻。三军以之声气行之哉。虽主武，盖文之职也。”（董诰，1983:4380）幕府中大量文职的设置，皆是吸引大量文人入幕就职的客观原因所在。

安史之乱以后，政局混乱，经济萧条，唐中央无力消灭安史乱后残余的势力，对于安史残余势力采取了“悉原其罪，一切不问”的安抚政策，并且对河朔之地受降的安史旧部和西北边境地区采取重兵屯守，其首领皆赐予节度使之名。原本因战争便利所置的临时军、政长官为一体的制度也就被保留下来，而后更是将其普遍推行至全国，成为中央与州级政府的一个行政实体。安史之乱后的节度使经过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的建设，打破了原有地方建制的格局。节度使的设置地

点由原来的缘边地区渐至扩大到内地，数量由唐玄宗时代的十几个增加至四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节度使使府星罗棋布，遍及全国。《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指出：“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司马光，1956：7647）。德宗之时，“凡今三十一节度，十一观察，与防御经略以守臣称使府者，共五十”（董诰，1983：5030）。幕府进一步增置五十个。至此，幕府林立的格局完全形成，节度使的设置地区由缘边转向中原内地，其节度使使府的职能亦开始发生转变，由以前的治理军戎开始更多的转向行政管理，其职能的转变也使文士的需求量日趋增多。

第三节 入幕风气的形成

幕府林立局面的形成，给那些在科举考试中陷入穷途末路的文人们以希望，也让文人们在动乱的社会迷雾中找到新的出路。权德舆在《送李十弟侍御赴岭南序》中云：

士君子之发令名，沽善价，鲜不由四征从事进者，翔集翰飞，盖视其府之轻重耳。则侍御之今日，犹鄙夫之昔时也。因想昔与今徐方连帅、王仆射德素、盛府主公、杨尚书达夫同登龙门于钟陵，尔来二十年矣。二贤以大僚硕望，当明天子注意分阃之重，鄙夫顾无所用，亦五叨中台，俯仰印绶，以过量自愧，追怀旧恩，敢忘其所自耶？

（董诰，1983：5019）

这段话足以代表当时社会对士人入幕风气的看法。文人入幕风气的形成，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唐朝初期，社会普遍重视进士，思想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1959:4）的观念，读书人亦将不能由科举及第作为人生第一大恨事。《太平广记》就有：“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李昉，1961:1322）之记载。在这样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唐初的文人对由幕入仕的方法是不积极的。士人们选择入幕的方法来实现理想抱负，只是在仕途不得意、久居卑职之时的无赖之举。岑参，二十岁到洛阳，开始献书拜官。此后十年，经常出入京洛，后漫游河朔，奔波于求仕之途，却往往无功而返，终在三十而立之年，中举及第。胸怀报国豪志的岑参，却被吏部授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卑职且不得升迁，这对岑参来说是相当大地打击。后终因“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山碛西馆〉，2004:386）之心，去位入幕。与岑参并称为“高岑”的高适，也是在仕途不得意之时入幕。《旧唐书·高适传》云：

高适者，渤海蓼人也。……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

（刘昫，1975：3328）

作为盛唐入幕标杆的高适和岑参，为中后唐时期的文人们树立了榜样，两者皆是先入幕后入朝。岑参先后入高仙芝幕和封常清，后官至嘉州刺史；高适先入陇右

哥舒翰幕府，后迁“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宋祁、欧阳修，1975：4681）这种仕进之路为后来的文人们解放了思想，打开了思维，若前路不顺，则可退而求其次，采取迂回之法来达成心中所愿。

开元天宝以后，科举之弊愈加严重。“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造俊，十弃六七”（刘昫，1975：4278），仕途偃蹇，越来越多的士人们开始将自己的前途托付于幕府。安史乱后，幕府大开，其用人标准，不拘一格。刘贡甫曾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是以号称得人，盖必自许其辟置，则可破拘挛，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见遗于科目者，亦未尝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广也。”

（马端临，1986：368）幕府用人的权利也很大，只要幕主根据幕职的需要物色好所用之人，将其上报等待中央批准就好了。大量的人才⁷皆因“皆元戎自辟，然后命于天子”（韩愈，1987：85）而进入幕府。在入幕潮流地带动下，文人入幕的动机主要为以下两种：

一、心怀理想 一展抱负

唐初时期，天下初定。国力强盛，在唐太宗精明的政治领导下使得唐朝的对外之战捷报连连，战罢回朝即是将军士兵们论功刑赏之时。不少文人在这种高昂的情绪下，心怀谋取功勋、报效国家的理想“投笔事戎杆”而进入幕府。沈佺期诗云：“秘略三军动，妖氛百战摧。何言投笔去，终作勒铭回。”（沈佺期、宋

⁷ 据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中有关唐文士进入方镇人次表的统计，唐肃宗至德年间入幕的人数达到了高潮，计1012人次；而后在抽样调查的495名文学家，有223人曾入仕幕府；又据唐诸科登第者进入方镇幕府表的统计，于肃宗后入幕的登第者有1021人。中唐后期入幕人数之多，且其中还没有包括未登第之人。

之间撰〈塞北二首〉，2001:253）、“归来拜天子，凯乐助南熏。”（沈佺期、宋之间撰〈塞北二首〉，2001:251）；杨炯的《从军行》诗中亦云：“宁为百夫长，胜过一书生”（彭定求等编，1999:615），这些诗歌皆强烈地表达了个人投笔从戎，立功报国的决心。

盛唐开元天宝之时，国家统一，开放清明的政治、空前繁荣的经济和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使得整个社会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唐代边境战争的频繁胜利，节度使都护府的建立，普遍募兵制的推行，皆让有志之文人欣然向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2004:369）的幕府生涯。王昌龄，“早年贫贱，困于农耕”，虽诗名早著，但屡次被贬，曾长期游幕边塞，以期寻求展现雄心抱负的机会。正如其诗《从军行七首》中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彭定求等编，1999:1444）。高适，喜言霸王之业，但“常日好读书，晚年学垂纶。吏道顿羁束，生涯难重陈”（高适〈答侯少府〉，1981:223）。纵然“州县才难适，云山道欲穷。”（高适〈封丘作〉，1981:29）却仍旧理想不灭，怀有远大志向，决然去位游燕赵，入幕从军。其诗《塞下曲》云“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1981:269）与高适同为盛唐边塞诗开创者的岑参，少时读书，但是“读书千卷未有名”。岑参心生失落，常自讽曰“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虽在“圣朝正用武，诸将皆承恩。”（岑参〈银山碛西馆〉，2004:82）之时“偶逐干禄徒”，但“十年皆小官”（岑参〈太一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2004:205），志在从军报国的岑参怎能安于现实，在“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岑参〈行军诗二首〉，2004:277）的心理之下，欲从戎马中开拓前程，毅然入幕，发出了“功名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

军》，2004：369）的呐喊。就连终身隐士孟浩然，在得知亲友王宣和告八两人入幕从军之时，也分别作诗以资勉励。其诗《送王宣从事》云：“才有幕中士，宁无塞上勋。汉兵将灭虏，王粲始从军。旌旆边庭去，山川地脉分。平生一匕首，感激赠夫君”（孟浩然，2000：349）、其《送告八从军》之诗云“运筹将入幕，养拙就闲居。正待功名遂，从君继两疏。”（孟浩然，2000：385）从上可知，心怀理想而去幕府一展抱负的途径，在盛唐之后文人的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二、现实和生计的需求

中唐时期，国势衰微，政治腐败，权臣擅权，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安史乱后的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萧条，人们居无定所，贫困交迫。唐朝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也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科举入仕的途径变得越来越艰难，很多的进士及第之后，仍无法通过释褐。地方幕府大开，节度使权力日益增大，残酷的现实使得大部分的文人们，不得不放弃由科举考试直接入仕的显途，而被迫选择迂回的幕府入仕之途。可是随着唐朝政治局势的发展，人们对于入幕之途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明显地改变：

（一）将幕府作为自己入仕朝廷的中转站。自中唐时期开始，不少节度使幕府中的文人，在入幕之后升入朝廷高位的人不在少数。如齐映，先“滑亳节度使令狐彰辟为掌书记”，后“累授监察御史”（刘昫，1975：3750）。柳并，“大历中，辟河东府掌书记，迁殿中侍御史”（宋祁、欧阳修，1975：5771）。郑云逵，“客游两河，以画干朱泚，泚悦，表为判官，授大理评事，累谏议大夫”（王钦若，2006：8395）。高郢，“李怀光节制邠宁，奏为从事，累迁副元帅判官，

检校礼部郎中”（刘昫，1975：3975）。赵昌，“李承昭为昭义节度使，辟昌在幕府。贞元七年，为虔州刺史”（刘昫，1975：4063）。除此之外，还有许孟容、陆少游、段平仲、于敖、卢简能、窦巩等等，皆是从军入幕而后入朝升为显官。甚至唐代后期的宰相之中，有三分之二有过入幕经历的，如李石、裴度、柳公绰、杜佑、令狐楚等（戴伟华，2007：86）。这些比比皆是的现象，极大地激发了文人们的入幕热情。

（二）. 为生计而追求幕府优渥的薪酬。唐朝前期，中央政府机构重内官而轻视外流官员，京官的俸禄相对于“外官降京官一等”（宋祁、欧阳修，1975：1395）的标准而言，京官的俸禄一直显得优厚稳定。中晚唐时期，中央权力萎缩，官员冗塞，官僚机构恶性膨胀⁸，财政逐渐入不敷出，沈传师之父既济在德宗即位之初就上疏云：

臣尝计天下财赋耗斲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

（刘昫，1975：4036）

但此时官员虽多，但仍然每月发俸。直到肃宗时期，元载因“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司马光，1956：7243），于是造成“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司马光，1956：7243）的奇特现象。后来虽然对京官俸禄有所增加，但不久之后，外官的俸禄也随之增加。外厚内轻的俸禄情况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据《新唐书》卷五十五《食货五》中记载可知，都防御使、

⁸ 据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统计，玄宗开元末京官由2620人增至5718人；外官由16000余人增加至宪宗元和六年时的260023人。

副使为十五万，京官中正三品的太子宾客和从三品的大都督长史却只有八万，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都团练使、副使的八万要比正四品上官的太常和宗正少卿要高一万；节度推官、支使，防御判官的的俸钱也比其相应的官吏还要多。由此将京、州、县官和节度使以下官员的俸钱进行对比，可见幕府僚佐的待遇是很优厚的。特别是在“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陈寅恪，2001:76）。由此可以知道，在幕府任职的薪酬之不菲。

除以上文人入幕的主观原因外，还有就是幕府主人对入幕文人的求贤若渴。幕府主聘请文人入幕，最初是为了借助文人的才能，帮助其处理大量的文书案牒的工作。随着唐代幕府格局的形成，各个幕府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实力，皆积极储备人才，招贤纳士，以求天下之名士皆入我府中。亦如赵憬所云：“诸府辟吏，各自求精，务于得人，将重府望”（刘昫，1975：3778）。由此可知，以文人来增加幕府的威望，是当时幕府辟署文士的普遍做法。幕府主与所辟文人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恰如韩愈所云之：

“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助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董诰，1983:5598）。

“相须”“相资”的关系，使得府主与文人之间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宾主关系，因此府主对待文人的态度多为以礼相待。郭子仪，其所开“幕府之盛，近代无比。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刘昫，1975：3467）。乌重

胤，“善待宾僚，礼分同至，当时名士，咸愿依之”（刘昫，1975：4224）。又如张建封，在任徐泗濠节度使时“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文人如许孟容、韩愈诸公，皆为之从事”（刘昫，1975：3832）。幕府此种“以礼义相推，以宾佐相高”（董诰，1983：7070）的方式和态度十分符合文人的心意，也使得很多当时之士云集于幕府之中。

综而言之，唐代文人的入幕之举，是一个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幕府的存在及其制度的发展，都是在唐代政府的支持下发展壮大，即使幕府发展的最后结果违背了唐朝政府的最初意愿。幕府作为唐代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对唐朝中后期甚至是往后的朝代，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唐代幕府及幕府制度，对其入幕文人思想观念影响也很深，而文学创作的观念深扎于文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因此，作为唐代创作背景的幕府，其和唐代文人们的创造精神和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唐代文人的入幕，无可否认存在着个人政治抱负和其他的一面，但是幕府可以以其独有的条件吸引着唐代大众靠近，获得诗人文士们的青睐，竞相奔走入幕，与有权势的府主们交往，借以满足自我的内心需求。

其次，科举考试的困顿、仕途的偃蹇，由幕入仕过程的实现皆极大的改变着唐代人们对入幕的观念，而幕府格局的大开则直接为唐代的文人提供了一个新颖和波澜壮阔的生活体验环境，使得诗人的创作环境大大的增加，也促进了唐代新出现的入幕诗人的有关的创作。俗语说政治是当权的历史，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史学家的视角。诗人的创作极大地还原了诗人所处时代的现实环境，可让人了解唐代社会更真实的一面。

第二章 诗人的幕府环境和生活

白居易《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云：“今之俊义，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而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白居易，1979:1033）。从中可以看出，幕府在中唐文人的心中是进入仕途和官场升迁的重要途径。文人从军入幕，必然会前往幕府的治所之地。幕府治所之地的自然环境、幕府内部的文化环境与人际关系，甚至是幕府府主的喜厌好恶，都是深深影响幕府文人创作的重要因素。《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带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班固，1962:1640）。说明了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表现，会因为水土风气和“君上情欲”之异而不同，从而影响文人在幕府之中的文学创作。职是之故，通过对诗人的幕府生活和幕府环境的分析，可以了解诗人在幕府的生存状况及其思想上的变化，这将有利于笔者对四位幕府诗人的创作动机、诗歌主题的倾向性表达，作深入地理解和阐释。

第一节 诗人入幕原因探讨

中唐时期的文人，在艰难的科举入仕和社会入幕风气地影响下，文人们或因为胸怀慷慨的报国理想，或由于在动乱的社会现实中，因自己实际生存的需要，将自己生存和仕进的方向，转向了安史之乱后格局林立的幕府。就本文所选取的四位诗人而论，通过对其生平经历的爬梳和相关文本资料的整理，将诗人的入幕

原因进行分析如下：

韩翃，河南南阳人。古时即有“舟车秦楚，襟带南国咽喉”之称。风物繁华，自古英才辈出，南阳之地风俗“尚忠朴，……士习朴敦诗书，不事浮华”之语（潘守廉、张嘉谋，1976：238）。春秋时期的名相百里奚、越大夫范蠡、汉代光武帝刘秀、诸葛亮等，是出自这人杰地灵的地方。开元时期，李白盛赞“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李白〈南都行〉，1977:372）。韩翃就生长在这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徜徉在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养成了韩翃“意气清华，才情俱发”（转引自乔亿《唐诗品 徐献忠》，2008:252）的翩翩才调。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年），韩翃赴京城应举。同年与元结、乔潭、房白、郾载、魏颢、尹征、刘太真等同登进士科及第（徐松，1984:331）。可及第之后却并未释褐授官，以致穷困潦倒而“华门圭窞，室唯四壁。”但韩翃才情卓犖，所作诗歌“兴致繁富，如芙蓉出水，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宋祁、欧阳修，1975:5786），颇受当时之人所称誉。出众的诗学才艺，让韩翃赢得了皇帝的赏识召为翰林待诏，这样的身份为韩翃赢得了与当时名士结交的资本，再加上韩翃生性磊落不羁，侠气傍身，喜欢结交少年侠客，仗剑轻裘。韩翃在淹留京城之时，过了一段颇让他回味的“结客平陵下，当年倚侠游。传看辘轳剑，醉脱骅骝裘”（彭定求等编，1999:2728）。的轻狂岁月。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司马光，1956:6934），挥军直逼长安。天宝十五载（七五六年）正月，哥舒翰加“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昫，1975：3214），奉命据守潼关，击退了叛军安庆绪的进攻。韩翃闻此喜讯，作《寄哥舒仆射》夸赞哥舒翰“腰垂紫文绶，手控黄金勒”的雄

发英姿，盛赞“杀将破军白日馀，回旃舞旆北风初”（彭定求等编，1999:2726）的胜利场景。在国家危难如斯之时，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起了韩翃心中的豪侠之气，愿意在国家危难之时随军奔赴前线，一展“走马为君飞羽书”的慷慨报国之志。这种壮志情怀，随后也在韩翃慷慨奔赴淄青幕府的举动中得到实现。随着淄青幕府主侯希逸的被逐，韩翃也因“府罢”而在长安闲居起来。

韩翃在长安期间，并不是真正的“闲居”，他也曾积极参加文人大夫或高官的游宴、赠答、酬唱之活动，奔走于权贵之间，希望求得援引而进入仕途。如曾作诗“他日感恩惭未报，举家犹似涸池鱼”（彭定求等编，1999:2745），寄给当时担任滑州刺史、亳魏博等六州节度使的令狐彰，希望得到朝人士的援引，可是却并未达成所愿。“无因得携手，东望转凄凄”（彭定求等编，1999:2732）的韩翃，无望于朝廷权贵的提携，为了仕进和生计，韩翃只有再次将目标投向了幕府。他给汴宋节度使田神功投去了“应念一身留阙下，阖门遥寄鲁西偏”（彭定求等编，1999:2744）的诗作，直抒心中渴望提拔之意，后田神功辟请韩翃为掌书记，韩翃得以再次入幕。

戎昱出身孤寒，没有显赫的家世，在政治仕途上，也没有贵人相助。就连本来美好的少年生活，也因遭逢安史之乱而流离颠沛，未到弱冠之年就要为衣食温饱而四处奔走。戎昱对于家贫的态度却是坦然的，作为大历诗人中唯一继承了杜甫衣钵的戎昱，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明显地追摹杜甫对诗歌的写实个风格，更继承了杜甫“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杜甫〈客至〉，1998:342）的坦诚人格和艺术精神（蒋寅，2007:96）。如：

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

（《长安秋夕》）

的戎昱在路过滑州、洛阳时，亲眼目睹了回纥士兵在洛阳时的残忍行径。肆意杀略、强虏妇人、掠夺财物、“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司马光，1956:7135），这血腥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的深重苦难，给戎昱造成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颤，“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膻腥逼绮罗，砖瓦杂珠玉。”“彼鼠”之乱还未平息，却又引来“纵狸”大掠，这真是“脱身落虎口，不及归黄泉。苦哉难重陈，暗哭苍苍天”（戎昱〈苦哉行五首〉，1982:3）。沉重的社会现实，并没有使戎昱的意志消沉，“怀刚本自天”（戎昱〈赋得铁马鞭〉，1982:36）的戎昱，在惨烈的现实面前，依然拥有“杀擒生黑山北，杀敌黄云西”（戎昱〈从军行〉，1982:19）的雄心壮志。永泰元年（七六五年），戎昱在泾州观郭子仪出师之时，威严肃穆的“金铙肃天外，玉帐静霜中”景象，激发了戎昱心中为挽救国难，愿从军入幕的志向，更作诗抒发了自己“燕然如可勒，万里愿从公”（戎昱〈泾州观元戎出师〉，1982:17）的辽阔胸怀。在内乱四起，外患频仍之时，对家境困难却急欲奔赴国难，思图杀敌之功的戎昱来说，只有幕府之地是既可解决温饱生计问题，又可实现心中所愿的地方。

卢纶，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人。蒲州民风质朴，人性敦厚，“好尚儒学”（魏征、令狐德棻，1973:859）。其先祖尚之，事魏至青州刺史，五世祖冯翊韩城令羽客，“以五言诗光荣当时”，四世祖茂礼官监察御史，三世祖钊官河中永乐令，祖父祥玉为济州司马，卢纶父卢之翰以明经及第，官魏郡临黄尉，纶之弟绶始谓邠州节度所辟，试太子通事舍人，后官宝鼎县尉（傅璇琮，2004:241）。从上可以知道，自唐代以来，卢纶家族虽历世官位不显，职位不高，但卢纶也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宦宦之家，有着悠久的家族文化。在家庭和父亲的影响下，卢纶少时即用功读书，“谕以诗礼义”（卢纶〈怀旧诗〉，1989:145），以“缵韩城

府君诗业，尤有显名”（傅璇琮，2004:241）。卢纶对家族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表现出卢纶心中强烈的入仕精神，但现实中的入仕之路却并没有卢纶所预想的那样简单。

天宝十载（七五五年），卢纶因遭逢安史之乱，而与双亲逃往鄱阳以躲避战乱，旧业荡尽，家境苦寒。唐代宗大历元年（七六六），卢纶长安应举，落第。第二年，再次应举，再次落第。卢纶的心情，深感“同作金门献赋人，二年悲见故园春。到阙不沾新雨露，还家空带旧风尘。”（卢纶〈与从弟瑾同下第后出关言别〉，1989:56）的悲伤。应举的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此时的卢纶年轻尚轻（二十岁），正值意气风发之时。毫不气馁的卢纶，在其后的几年里连续应举，但却终不能一遂心中所愿，一再的“数举进士不入第”（宋祁、欧阳修，1975:5785），连连失利。“十上不可待，三年竟无成”（卢纶〈怀旧诗〉，1989:145）的接连打击，让卢纶感到了无限的苦闷与惆怅。虽未能中举考取功名，但卢纶在长安应举的几年里，常常以文会友，善与社会各阶层交际，交游范围十分广泛。卢纶除了与达官显贵，如位居宰相职位的元载，王缙，常袞、李勉、齐映、浑瑊等交游，还与重要朝官和掌握着入仕、升迁大权的人物，如皇甫温、鲍防、李纾、吉中孚、位居等交往，相互吟咏唱和。同时，卢纶还“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李端皆能诗”（计有功，1985:466），共同相聚于长安，文咏唱和，齐号“大历十才子”。诗坛中的声名亦随着卢纶广泛的交游而鹊起。在当时，卢纶在十大才子中声名最高，“在大历十才子中号为翘楚”（吴师道，1983:612）。时“有诗名于世”的宰相元载对卢纶甚为赏识，因此献其诗于唐代宗。卢纶终于在元载的推荐下进入了仕途，补闕乡尉，此后其又接连任密县县令和昭应县令等职，接着卢纶又因王缙的“礼待逾厚”而“累迁监察御史”（宋祁、

欧阳修，1975：5785）。

可人生真是“祸近防难及，愁长事未分”（卢纶〈罪所送苗员外上都〉，1989:493），代宗大历十二年（七七七年），元载因位高权重而恣意放纵，长期贪赃枉法，极度奢侈，僭越无度，终因“长恶不悛”（刘昫，1975:3412）而获罪。元载被赐死，王缙被贬括州，而与元载、王缙所结交的党羽也因此坐累被贬。卢纶因与之往来密切也受到牵累，被停务处分并于虢州下狱。其后，卢纶虽洗清冤屈而平反昭雪，但却也因此丢掉了官职。所幸的是官职被停，但俸禄还在，生活还可以勉强应付。受累下狱之事的发生对正值壮年（当时三十岁）的卢纶来说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从“相逢空握手，往事不堪思。见少情难尽，愁深语自迟。……强得宽离恨，唯当说后期”（卢纶〈雪谤后逢李叔度〉，1989:366）、“览镜愁将老，扪心喜复惊。岂言沈族重，但觉杀身轻。有泪沾坟典，无家集弟兄。东西遭世难，流浪识交情。……应怜守贫贱，又欲事躬耕”（卢纶〈雪谤后书事上皇甫大夫〉，1989:294）等诗歌，可以看出诗人心中“壮志随年尽，谋身意未安”（卢纶〈春日书情赠别司空曙〉，1989:322）的理想破灭之感，生活中也多了“鸟动香轻发，人愁影屡移。”（卢纶，〈同耿漳、司空曙二拾遗题韦员外东斋花树〉1989:453）、“寂寥惊远语，幽闭望归云。亲戚如相见，唯应泣向君”（卢纶〈罪所送苗员外上都〉，1989:493）的悲愁情绪。

有言谓“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魏同贤，2007:4）。唐德宗建中四年（七八三）十月，以朱泚为首的泾原之师，在长安倒戈叛乱，德宗仓皇离开长安逃往奉天（今陕西干县）。长安陷入了“黄埃满市图书贱，黑雾连山虎豹尊”（卢纶〈春日卧病示赵季黄〉，1989:327）的叛乱之中。卢纶亦因“恍然（一作无钱）钱离阻”（卢纶〈送宁国夏侯丞〉，1989:490）而被困长安，病体沉重，

常觉“病中饶泪眼常昏，闻说花开亦闭门”（卢纶〈春日卧病示赵季黄〉，1989:327），生活也陷入了极度困窘之中。后浑瑊与李晟等人收复长安，德宗返回京城，长安遂定。唐德宗兴元元年（七八四年）七月，德宗因浑瑊平叛有功，而“充河中同陕虢节度及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咸宁郡王”（刘昫，1975:3707）。卢纶在陪浑瑊泛游渭河之时，作“应怜似萍者，空逐榜人回”（卢纶，1989:392）之诗句，透露出希望浑瑊提携之意。

卢纶没有什么大志，只有小小做官求安的“素志”，相对于李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1977:1220）和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1998:23）的大志而言，是非常渺小的。这种令人不屑的“素志”，也在人生接连不断的打击中遭到幻灭，造成了卢纶“往事不堪思”和“壮年随年尽”的理想破灭与心境衰老之感。“迹在是非端”的仕途生活，让卢纶饱尝政治生涯的恐怖可怕。多年以后，卢纶仍不时为这段“早阙教训，哀情纒迫，词不能文”（吴钢，2000:69—70）的经历，感到惴惴不安。历经坎坷的仕宦之途，命运多舛的苦难人生，让卢纶深谙“谁念为儒逢世艰，独将衰鬓客秦关”（卢纶〈长安春望〉，1989:427）的失意苦难之味，令人失望的现实终让卢纶将其人生的目标转向了幕府。

李益，少居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其“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隔绝西羌、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李吉甫，1983:1017）。姑臧之地跨越边塞，为连接东西交通的要道，是边防线上的军事重镇，也是风云变幻，群雄睥睨争夺之地。李益自小生长在这汉胡杂居之地，在“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班固，1964:2998）的风俗下，深受披坚执锐、跨马挺枪，为国从军效力的尚武任侠精神的影响。李益出身于“门族清华”（李益，1985:147）的家族，

其为凉武昭王李暠的十二代孙（王胜明，2009：130-133）。李暠，据《魏书·李暠传》中载：“李暠，字玄盛，……陇西狄道人也，汉前将军广之后”（魏收，1974：2202）。李益的十世祖李宝，为敦煌公，七世祖李瑾领尚书三公郎中，自此以后历代皆职位显贵，其祖父李成绩亦曾为虞部郎中，肃宗朝的宰相李揆也是其祖父辈。显赫的家世，让身为“关西将家子”（李益，1985：110）的李益，一直以自己为“飞将军”李广的后人而感到自豪，心中始终高昂着“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于”（李益〈从军诗序〉，1985:145）的英勇气概和“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李益〈赴邠宁留别〉，1985:72）的豪迈精神。

唐代宗广德二年（七六四年），吐蕃侵入中原，狼烟滚滚，烽火四起。唐朝尽失河西、陇右之地。李益（十七岁）随家人被迫迁居洛阳。在以后的日子里，李益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旧国不得归，风尘满阡陌”（李益〈华阴东泉同张处士诣藏律师兼简县内同官因寄齐中书〉，1985:25）的思乡情绪，一直深藏在李益的心中。

大历三年（七六八年），李益在长安应举，不第。作“东门有行客，落日满前山。圣代谁知者，沧州今独还。片云归海暮，流水背城闲。余亦依嵩颖，松花深闭关”（李益〈送同落第者东归〉，1985:66），抒写了诗人心中落寞郁闷的失望心情。

大历四年（七六九年）李益再次赴东都应进士举，成功登第。后被授于华州（今陕西华县）调郑县尉之职。大历六年（七七一年），又再应制讽谏主文科，因“词藻清丽，入第三等”（徐松，1984:371）而制举授河南府参军。其后转华州郑县主簿。据《旧唐书·职官志》中所载，郑县尉、河南府参军和郑县主簿之职均为正第九品下阶或从第九品上阶（刘昫，1975:1802），皆为唐朝官场中的

卑末职位。

李益“诗名早著”（李肇，2000:179），少年成名，“二十挥篇翰，三十穷典坟”（彭定求等编，1999:1942）。可是，李益虽然才华出众，但却是“出身二十年，三授末秩”（李益，1985:145）。在同辈之人皆位居显位之时，李益却始终沉迹于县尉、县簿之类的“末秩”。作为“将家子”的李益，在面对“何必若蜉蝣，然后为局促”（李益〈入华山访隐者经仙人石坛〉，1985:23）的困蹇仕宦之途，身体与心灵皆陷入了“鄙哉宦游子，身志俱降辱”的疲惫状态。“群材既兼畅，顾我在草泽”（李益〈华阴东泉同张处士诣藏律师兼简县内同官因寄齐中书〉，1985:25）的苦闷愁绪，“贵无身外名，贱有区中役”的自我审视，“忽忽百龄内，殷殷千虑迫。人生已如寄，在寄复为客”的人生焦灼之感，时时煎熬着李益那不安平庸的心灵。

出身官僚世族之家，“生长边城旁，出身事弓马”（李益〈城傍少年〉，1985:38）的李益，文武兼备，在陇西弓马骑射、娴习攻战风气的影响下，心中激荡着“行当收汉垒，直可取蒲泥”（李益〈送常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1985:60）的雄心壮志，李益在这种碌碌无为的薄尉生涯中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当仕途不得其志之时，李益将寻找机会和急欲改变现状的期待目光，投向了“选辟多出词人”的幕府。身负祖辈的荣耀，李益怀着“平生报国愤”（李益，1985:7）的心态，开始了“儒生幸持斧，可以佐功勋。无言羽书急，坐阙相思文。”（韦应物〈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1998:260）数次从军边塞的幕府生活。

综上所述可知，诗人们在安史之乱中，亲历了“血流纷在眼，涕洒乱交颐。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杜甫〈夔府书怀四十韵〉，1998:707）的流离惨状，也在安史之乱以后的社会中，目睹了“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迁。山东征战苦，

几处有人烟。”（彭定求等编，1999:1503）和“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彭定求等编，1999:1493）的荒凉与萧条。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诗人们也曾积极地参加唐代文人入仕的光明大道——科举考试，但是科举考试的结果却让诗人们大失所望。戎昱、卢纶在科举考试中一再失利落第；韩翃中举及第之后却并未释褐授官；李益及第授官却皆是卑微之职。对于心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1984:380）的文人而言，这绝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文人不仅不能一展抱负，而且还要在兵荒马乱的社会中艰难求生。在这样无奈又无助的现实条件下，文人将生存和入仕的眼光投向了幕府。

文人心怀着昂扬的报国壮志进入幕府，但是幕府之中的形势却没有文人所预想的那样单纯。通过对四位诗人幕府生活的爬梳，可以发现投身于幕府之中的诗人，不仅很难实现自身的报国壮志，而且还经常在不同的幕府之中辗转流寓。深究其中之原因，可以发现幕府的节度使大多是由武人出身的将领担任，而军幕中的将士也多是急功近利、佞宠贪功、纵情声色的跋扈蛮横之徒，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冲突不断，而使得军幕之中叛乱难止⁹。文人生活在这暗流汹涌、充满危机的幕府之中，就连自己的生命也难以自我掌控。这种悲哀的心情，即使在面对自然中的山水也难以释怀。入幕文人的生活，其艰难的程度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幕府的治所之地，多在偏鄙荒凉之处，诗人们离乡背井，在陌生的自然环境中与“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朱彬撰 饶钦农点校，1996:191）的风俗习惯下，过着并不安稳的生活。在极其苦闷的幕府环境中，幕府文人难以施展心中的壮志豪情，并且还要在黑暗的幕府环境中压抑自我内心真实的情感，陪幕主游宴，与幕僚同乐。这些皆深深地影响着幕府诗的创作。幕府诗人

⁹ 据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中的考证，从广德元年（763）到乾符元年（874），幕府军中的动乱总共发生 171 起。其中割据型幕府中动乱 65 起、防遏型幕府动乱 52 起、御边型幕府发生动乱 42 起，财源型幕府发生动乱 12 起。

心中那深刻的悲哀与痛苦的情感体验，已然注定了幕府诗的创作是以悲伤的感情基调为主。

第二节 诗人的幕府生活

韩翃，字君平，其生卒年不详，南阳（今河南南阳）人。韩翃声名卓著，但却一生困顿，为了仕进与生活，长期辗转淹留于幕府之中。韩翃的幕府生活如下：

韩翃的初次入幕，是在宝应元年（七六二）五月。是年，代宗任命当时的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司马光，1956:7126）。侯希逸素重韩翃的诗学才名，因而聘韩翃为掌书记，“表佐淄青幕府”。淄青幕府治所之地在郓州（今山东东平），即今黄河以南的山东地区。黄河地区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发源之地，并在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下，不断地吸收来自各地的文化养分，形成了自身丰富深厚的文化积淀，养成了“硕学通儒无绝，今古家尚质直”（乐史，2007:248）的文化风气。山东之地，土地肥沃，属于物产丰富的富庶之地。在安史之乱期间，因为受到战争的波及，导致城乡人口急剧减少而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土地荒芜，同时因水利设施的毁坏而降低了农业的抗灾能力，水运不通，城市萧条不堪。（孙涛、张晋光，2012：101—105。）

侯希逸作为淄青节度使，在初领淄青之时，辛勤治理兵务，并积极致力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史书载其“甚着声称，理兵务农，远近美之”（刘昫，1975:3534），颇有成绩。侯希逸是武人出身，本为平卢军中的裨将，其后为被军人共推为平度节度使，因不愿叛唐而受困于驻地，又时常受“奚虜所侵”，因此率平卢将士两万余人离开平卢，转战山东。当时跟随侯希逸南下的平卢军，主要是以

营州地区“尚武事农”的高丽人为主，据《旧唐书·李正己传》中所载：“李正己，高丽人也。本名怀玉，生于平卢。……希逸母即其姑也。与希逸同至青州，……侯希逸为即其外兄，用为兵马使”（刘昫，1975：3534—3535）。可以看出，幕主侯希逸与其部将李正己都含有胡人的血统，淄青幕府中的将士们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丽武人集团。”（苑汝杰，2011：139—142）高丽，“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范晔，1965：2813）。由此可知，侯希逸所率领的淄青节度使幕府，其实就是一个以武人为主的胡人军幕。幕府之中仍然强烈地留存着胡人勇健善战、重武轻文和桀骜难驯的风俗习气，而此时与韩翃同在侯希逸淄青幕府中的文人很少，仅有高员外和崔过二人而已（戴伟华，1994：107）。后来，侯希逸逐渐骄纵，荒废政事，“尤崇奉释教，且好畋游，兴功创寺宇，军州苦之”（刘昫，1975：3534）。终在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七月，侯希逸被幕府将士以城门“闭之不纳”，被部下所逐而狼狈回朝。韩翃的第一次幕府生活也因随侯希逸的返朝而结束。

韩翃再次入幕，是在田神功于大历六年（七七一年）之前来朝之时，被田神功辟为汴宋幕府的掌书记。汴宋幕府，治所在汴州（今河南），“为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班固，1962:2107）。汴州境内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具有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水运体系。汴州“自古东西路，舟车自此分”（彭定求等编，1999:8279）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具有“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董诰，1983：7649）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朝廷在此地多是派重兵驻扎，幕府府主亦多是由武将出任担当，因此难免有骄兵蛮帅的出

现。韩翃在汴宋幕府期间经历了五位幕主¹⁰，其中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在大历九年（七七四）年正月因疾而卒。朝廷此后以田神功之弟田神玉为汴宋留后，韩翃此时继续留在汴宋幕中担任掌书记。田神功和田神玉两人，皆干练果敢，忠勇朴实，对朝廷无二心，对幕中将士的治理也颇为严格。因此此时的汴州幕府政治环境极为轻松，军政清明，并且从韩翃所留存的《田仓曹东亭夏夜饮得春字》、《梁城赠一二同幕》等诗作来看，韩翃与田神功和田神玉两位幕府府主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大历十一年（七七六），田神玉去世。此后汴宋幕府的形势开始动荡不安，幕府之中的局势也变得仓皇艰险。朝廷本打算在田神玉卒后，以永平军节度使李勉为汴州刺史，任汴、宋等八州的节度观察留后。李勉还未出发，汴州幕中的将领李灵曜就擅自杀害濮州刺史孟鉴，并向北勾结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发动兵变，打算效仿河北的藩镇，独占汴宋之地。同年六月，朝廷无奈之下任李灵曜为汴州刺史，充汴宋节度留后。八月之时，李灵曜却因不安其位而据汴州再次叛乱，此时的朝廷任命滑州李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和河阳节度使马燧三镇，共同出兵征讨，终大败并生擒李灵曜。

大历十一年十二月，唐朝廷“加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平章事、领汴州刺史，治汴州”（司马光，1956：7241）。李忠臣年少从军，因“材力冠异”在军幕多次建立功勋。但李忠臣生“性贪残好色，将吏妻女多被诱胁以通之。又军无纪纲，所至纵暴，人不堪命。而以妹婿张惠光为衙将，恃势凶虐，军中苦之；数有言于忠臣，不之信也”（刘昫，1975：3942）。加之李忠臣因自己“木强率直，不识书，（亦）不喜儒生”（刘昫，1975：3942），此后李忠臣被部下李希烈的威逼

¹⁰ 四位幕主分别为：田神功、田神玉、李忠臣、李希烈和李勉五位。

驱逐。据《全唐文》卷四四四中所载韩翃的《为李希烈谢留后表》一文，可以得知韩翃在李忠臣被驱逐之后，曾经流落于李希烈的幕府之中。从史书中对李希烈的记载来看，李希烈与李忠臣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李希烈也是少小从军，屡立军功，但是李希烈的秉性却更加的残忍刻毒，“慄悍阴祸”，每次在敌我军队交战之时，李希烈任鲜血布满前身。自己在谈笑吃喝之时，仍旧身着血衣而面容不改。又，李希烈在李勉任汴州节度使时，曾率军攻打汴州，“驱百姓，令运木土筑垒道，又怒其未就，乃驱以填之，谓之湿梢”（刘昫，1975:3942）。这些事迹皆说明了李希烈为人凶狠暴虐和其性格中的残酷无情。由以上的材料，可以推知，在这些武人幕主统帅之下的幕府环境，对韩翃这样的入幕文人来说是何其的艰难。韩翃在这些如狼似虎，屡易主人的幕府之中，为幕主撰写着言不符实的表奏，过着俯仰不由己，言不由衷的陪宴侍从生活。

大历十四年（七七九）三月，在李忠臣被逐之后，唐朝廷鉴于汴州长久混乱的局势，再次以永平节度使李勉为汴州刺史。李勉勤学经史，为皇帝的亲属陪位，向来忠于朝廷。其人生性“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简易。善鼓琴，好属诗，有巧思”（刘昫，1975:3636）。此时的汴宋幕府在李勉的统帅下暂时恢复了平静。此时已到迟暮之年的韩翃，在颠沛流离的幕府生活之中，早已经失去了年轻时那意气风发、仗剑轻裘的豪气，但素有诗名的韩翃仍被喜好作诗的李勉辟为幕吏。可是“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举目为恶诗”（孟棻，1957:9）。这样的幕府文化环境使韩翃“邑邑殊不得意”，无人理解的凄凉与寂寞，使得韩翃经常以病为由，“辞疾在家”。直到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年），韩翃终于苦尽甘来，因其所作之《寒食》诗得到唐德宗的御笔钦点，擢升为“驾部郎中，知制诰”，累迁中书舍人。随着韩翃的在朝为官，他的幕府生活也于此而结束了。

戎昱（七四〇—八〇〇），荆南（今湖北江陵）人，出身低微，乃一介“贫士”。年少时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却未能中举及第，遂遍游名都山川。戎昱一生为官之路颇为艰辛，多托己于幕府之中，久任幕府从事等卑职，其先后至少四次进入幕参佐。戎昱的幕府历程如下：

第一次入幕：乾元二年（七五九）六月——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之初。被浙西节度使颜真卿辟为属吏。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之初，戎昱随颜真卿自浙西入京。七月，颜真卿因率领百官询问皇上的起居日常而被李辅国所忌恨，贬为蓬州长史。就这样，戎昱还未来得及展露自己的雄心抱负的第一次入幕生涯，也就因颜真卿的被贬而匆忙的结束了。

第二次入幕：大历二年（七六七）秋——大历四年（七六九）九月。戎昱在夏秋之际，沿大江舟行东下，来到江陵（荆南幕府的辖地）。在戎昱抵达江陵之时，正值卫伯玉镇守荆南（今湖北）幕府。卫伯玉，其人有“膂力”，年幼时就修习武艺，参军入幕。天宝年间“仗剑安西，以边功累迁至员外诸卫将军”（刘昫，1975:3378）。戎昱在卫伯玉的邀请之下，心怀着强烈“忠臣思报国，更欲取关西”（戎昱〈观卫尚书九日对中使射破的〉，1982:38）的鸿鹄之志，进入荆南幕府。荆南幕府虽有重要“东连吴会，南有洞庭，南通五岭，北绕颖泗，控扼巴蜀，可出三川，下瞰京洛。楚有七泽，熊绎所封，国之西门为吴蜀之门户，有西陲之号，据江湖之会，即西川江南广南都会之冲，甲兵所聚”（祝穆，2003:479—480）的军事战略地位，但是唐王朝有鉴于该地历来的“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杜佑，1988:4892）的历史教训，因此唐王朝对担任此地幕府的节度使的选取是极为慎重的，“必详择其人焉”。节度使的候选人多是“儒帅”，甚少以武将出身之人为幕主，同时为了防止幕主在其管辖的地区

培植自己的势力，唐王朝对该地幕府节度使的任期时间，也是进行了严格地控制。据张国刚考证，截至干符元年（八七四），荆南幕府节度使的任期平均为 2.8 年，其所屯之兵力也不过万人（吴廷燮，1980:1288）而已。在武将跋扈，拥兵自重的年代里，这里也是甚少发生幕府举兵叛唐之事。戎昱在荆南幕府中待了近两年的时间，并没有受到幕府主卫伯玉的赏识，每天无所事事，度日如年，心中空怀满腔的抱负却无处施展。幕府主卫伯玉虽然屡立战功，但其人却极其贪恋权位，甚至为母守丧期间里，仍然不忘“讽将吏留己”（宋祁、欧阳修，1975:4657），实属“丁忧冒宠，终是武夫”（刘昫，1975:3380）。正因此如此，没有受到府主重视的戎昱，只能在幕府之中过着“万事无成空过日，十年多难不还乡”（戎昱〈江城秋霁〉，1982:42）的苦闷日子。有才不遇的情绪，在这远离京师的贬官谪吏之地，也难以得到纾解。荆州距离京师一千七百三十里，远离中原地区，虽疆域辽阔，山环水绕，但“邻桂岭炎瘴之乡”（范祖禹，2004:183），各郡民獠错居，养成了该地“俭而野，畚丁洞猿，喜惊而嗜斗，羈州縻邑，惮严而乐宽”（许有壬，2003:243）的风俗习惯。这里的语言环境也与中原有着很大的差异，《唐国史补》曾载：

**今荆襄人呼提为堤，晋绛人呼梭为莖，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
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李肇，2000：196）**

特别但却难以令人理解的语言，使得刘长卿也曾发出了“方言楚俗讹”（彭定求等编，1999:1532）的感叹。言语不同导致交流出现困难，中原的文化也难以在此地广泛地传播，使得此地的文化发展起步也比较晚。荆州地区，在唐宣宗以前

“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孙光宪，1981:26）。在这语言难解，文化落后，地僻民贫的边荒蛮夷之地，戎昱常常生出“不知何处销兹恨，转觉愁随夜夜长”（戎昱〈江城秋霁〉，1982:42）的悲凉感慨。大历四年（七六九年）九月，在卫伯玉幕中始终未受重用的戎昱，怅然地离开了荆南幕府。

第三次入幕：大历四年（七六九年）七月——大历五年（七七〇年）四月。离开卫伯玉的荆南幕府后，辗转来到湖南。湖南时正“以澧州刺史崔瓘为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刘昫，1975:293）。崔瓘延请戎昱为幕僚，在卫伯玉幕中备受冷落的戎昱，在湖南幕中却颇受幕主崔瓘的器重。戎昱感动之际，作《上湖南崔中丞》诗，以“举世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戎昱〈上湖南崔中丞〉，1982:43）之句，表达了自己对幕主崔瓘的感激之情。可是此时的湖南幕府内部却是祸端暗藏，幕中的局势甚为不稳。幕主崔瓘为人品行端正，“以士行闻，莅职清谨”（刘昫，1975:3375），在湖南之地大行风化之举，力求政务简约严明，“恭守礼法”。当时湖南幕府的将吏们，却早已习惯了以前幕府主那种宽缓松弛的领导方式，并不喜欢奉公守法。崔瓘任湖南观察处置使时，将吏们对崔瓘以“礼法绳裁”的做法，怀有诸多不满的情绪，怨怼之情日益积累，导致幕府之中军心难平。大历五年（七七〇）四月，兵马使臧玠和判官达奚观因粮饷之事发生争吵，臧玠便以此为由借机发动兵变，以杀达奚观之名，侵占潭州城。幕主崔瓘也在逃亡之中被臧玠杀害。臧玠由此而据潭州大肆作乱，“烈火发中夜，高烟焦上苍。”（杜甫〈入衡州〉，1998:1020），城中的百姓们夜半惊起，纷纷夺路而逃。为了逃避战火，此时已经三十一岁的戎昱真是“悔学秦人南避地，武陵原上又征师”（戎昱〈寄梁淑〉，1982:57）。大历五年（七七〇）冬，戎昱满怀“出门迷辙迹，云水白浩浩”（戎昱〈湖南雪中留别〉，1982:15）的迷茫，黯

然地离开了湖南幕府。

第四次入幕：大历八年（七七四年）——建中二年（七八一年）二月。戎昱离开湖南幕府后，流落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桂州之地是一个山岭峻恶、江河纵横、滩多险急、地理环境十分恶劣的地方。高温多雨的气候，使得桂州的山川之间瘴疠弥漫。“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柳宗元〈寄韦珩〉，1979:1142）和“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韩愈〈泷吏〉，1996:768）的险恶自然环境、落后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产力，使其成为唐人心中瘴雾炎毒，鲜有人迹的魑魅之乡。唐代的仕宦之人，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存在“重内轻外”的观念，再加上此地历来就是唐代官员被贬的首选之地，因此桂州成了唐人“非贬不去”的瘴疠蛮荒之地。此地离京城有数千里的距离，是唐朝时期西南面的边陲之地，也是“南蛮”生活的聚居之所，存在着壮族、侗族、瑶族、苗族、仡佬族、毛南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此地辽远偏鄙，音信难通，风俗异于中原地区，从李商隐在岭南幕府之时，所作之《异俗》诗中的“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未惊雷破柱，不报水齐檐。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铗”（李商隐〈异俗〉，2004:790），就可见该地与中原之地习俗的不同，并且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如买卖奴隶、质身为奴、蓄养奴隶，甚至是存在着强行掠夺人口作为奴隶的野蛮现象（钟文典，1999:175—176）。这种现象直到唐朝元和年间柳宗元贬谪广西，任官之时才被逐渐废除。广西之地因为位于蛮夷地带，语言也与中原是大不相同，元稹谓其：“夷音啼似笑，蛮语谜相呼。”（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1982:136），李商隐亦云：“鸟言成谍诉，多是恨彤檐。”（李商隐〈异俗〉，2004:790）山川旷远，人烟稀少，山中的少数民族仍旧过着巢居崖处的生活，并“依山险各治生业”，（宋祁、欧阳修，1975:6330）农业上依旧是极为原始的“刀耕火种”，

这种落后的耕作方式，使得广西的大部分地方仍旧处于一片荒凉景象。即便就在如此原始荒凉“一郡不当浙郡一县”（周去非，1936:2）的地方，在安史之乱后，也是战乱不断，频繁地发生农民武装起义。

桂管幕府位于岭南西道的管辖范围，距离长安的路途遥远。桂管幕府虽有“奠五岭之表，联两越之交，屏蔽荆、衡，镇慑交、海，枕山带江，控制数千里，诚西南之会府，用兵遣将之枢机也。”（顾祖禹，2005:4813）的重要战略地位，是唐朝军事上不可小觑的戍守重地，但是随着唐朝政府对该地征税地加重和贪官污吏地盘剥压榨，广西地区的社会矛盾亦日益激化，愈趋严重。唐中央派到岭南之地的官员也“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司马光，1956:7787）。特别是在大历十二载（七七七年），西原蛮酋长潘长安自称安南王而举兵造反，规模之大，“连跨州邑”，各蛮族也是积极地响应，影响涉及的范围“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弥亘万□”（广西民族研究所，1982:135）。虽然后来，叛军被桂管节度使李昌巖率大军镇压，潘长安亦被俘杀害，但此事却给了唐朝极大的震动。为了安抚战败的俘虏和缓和社会矛盾，朝唐廷并给俘虏耕牛和种粮，并放其还家。桂管幕府节度使李昌巖在其任职期间（773—781年）也积极大力的推动当地的文化发展。李昌巖首“立学宫于独秀山下”，（汪森，2003:15）修孔庙，兴学府，并且积极动员地方乡绅捐钱办学，开启了桂管之地公学和私塾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推进了该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戎昱也正是在李昌巖这种重道爱才，积极发展教育事业的情况下，被夜闻戎昱清畅的吟咏之声的李昌巖应邀至幕府为幕僚。李昌巖，陇西（今甘肃）人，从其在桂管幕府之地的“俾戍作和，化戎为农。三军卧鼓，四鄙罢柝”（董诰，1983:4500）、兴学校、建孔庙、重修虞山舜庙和平叛乱军的事

迹等，可以得知李昌巖也是一位文治武功且有作为的官员。

戎昱入桂州李昌巖幕后，很受器重。在戎昱跟随李昌巖“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戎昱〈桂州腊夜〉，1982:24）的幕府生涯中，戎昱因性格“耿介不阿”（邵逢，1982:62）和府主李昌巖的“待之甚厚”，幕府中有人开始对戎昱心怀不满，终遭人谗毁，戎昱被迫离开幕府。其后，桂州幕府李昌巖自知其失，于后悔之际再次延请戎昱入幕。于是戎昱在大历十一年（七七六年）时再次回到桂州幕，但此后戎昱在桂州的数年时间里，待遇已大不如前。代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年），朝廷命桂管观察使的李昌巖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和荆南节度使（吴廷燮，1980:1094），随着李昌巖离任赴荆南，重阳之后，戎昱也于此年离开桂州幕府北赴长安。戎昱的四次入幕经历短暂而又匆忙，他的幕府生活到这里已划上了句号。

卢纶（748—799），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人。卢纶的幕府生活是在唐德宗兴元元年（七八四年）十月至贞元十三年（七九七年）年间。德宗兴元元年（七八四年）七月，德宗因浑瑊平叛有功“以瑊兼河中尹、河中绛慈隰节度使，仍充河中同陕虢节度及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咸宁郡王”（刘昫，1975:3707）。卢纶在陪浑瑊泛游渭河之时，作《奉陪浑侍中上巳日泛渭河》诗，其诗尾联“应怜似萍者，空逐榜人回”（卢纶，1989:392）颇有祈求浑瑊提携之意。十月之时，充任京城西面副元帅的咸宁王浑瑊真“乃拔纶为元帅判官、检校金部郎中”（刘昫，1975:4268），卢纶对浑瑊的提拔之情充满了感激，其赋诗云“悄悄失途子，分将秋草并。百年甘守素，一顾乃拾青”（卢纶〈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1989:188）这是卢纶人生的第一次入幕，也是唯一的一次入幕。河中节度使幕府，治所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济蒲州）。蒲州之地依

山傍水，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冶铁、酿酒和造纸等手工业和盐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其地介于长安、洛阳和太原之间，具有易守难攻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此州之地，尧舜所都。表里山河，古称天险。……扼秦、晋之喉，抚幽、并之背”（颜真卿，1983:3403）。河中为唐时长安城东部的重
要屏障，其“东连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汧洛，北阻晋阳”（顾祖禹，2005:1872）的通达道路，亦使其成为唐代时期重要的交通要地。在浑瑊担任河中府节度使之前，河中之地相继出现了仆固怀恩和李怀光的反叛唐中央之事。因此，在平定叛乱之后，唐朝对河中节度使的选用皆颇为慎重，极重节度使人选对朝廷的忠诚度，因此选取了生性谦虚谨慎、忠武赤诚的浑瑊为河中府的节度使。卢纶在浑瑊幕府中生活的时间，相对于中唐时期其他辗转旅居不同幕府的诗人来说，其滞留的时间很长。卢纶在浑瑊幕府中甚受浑瑊的眷顾和重用。卢纶入幕后，其所带朝职从检校御史迁为检校金部郎中，这是任判官之职所带的最高虚衔了。卢纶经常陪浑瑊游宴，从其集中所留存的《九日奉陪令公登白楼同咏菊》、《九日奉陪侍中宴后亭》、《春日喜雨奉和侍中宴白楼》、《九日奉陪浑侍中登白楼》、《奉陪侍中登白楼》、《奉陪侍中春日过武安君庙》、《奉陪侍中游石笋溪十二韵》等一系列的陪宴诗，可以看出卢纶在浑瑊的幕中绝非平常之辈（蒋寅，2007：237）。又从卢纶所作的《送浑别驾赴舒州》、《浑赞善东斋戏赠陈归》、《孤松吟酬浑赞善》、《秋晚河西县楼送浑中允赴朝阙》等诗中亦可看出卢纶与浑瑊子弟交情也都不错，在浑瑊的河中幕府，卢纶的生活是相当的安稳舒服适。幕主浑瑊虽为铁勒九姓部落之后，但少年之时就武艺高强，善于骑马射箭，后入驻守边塞的朔方军中，屡立战功。浑瑊虽为武将，但是却为人忠勤谨慎，“功高不伐”，在担任河中节度使的十六年时间不但能很好的处理府中要务，而且能恪守朝廷中的君

臣礼仪，始终为唐德宗所信任和倚重，史臣谓“浑咸宁之忠尽，……为时名臣。”

（刘昫，1975:3711）同时在浑瑊的幕中亦聚集了不少的文人雅士，据戴伟华在《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中考证有陈翊、卢纶、赵植、胡证、常仲儒、路泌、韩旻、畅当、畅诸等人同在幕府之中。

河中因其地处中原之地，距长安城仅为三百里，周围亦有河东、泽潞、同州、陕虢等地与之相毗邻，幕府之间相互往来频繁，河中虽为军事雄镇，但其中亦有不少风景名胜，如白楼、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中条山、华山、黄河、伯夷庙、后土祠、栖岩寺等等，优美壮丽的自然风景，自然吸引了不少的文人游历其中，相互之间题词赋诗，吟咏风物，蔚然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人文景观。卢纶在浑瑊幕府中时，常与同幕僚友陪同幕主共同游历山水，壮写河中之地的山川之美，亦常与幕友之间互相诗酒唱和，吟咏风月，这些都为卢纶提供了丰富的抒写题材，从而使卢纶的诗集中留下了丰富的诗文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卢纶在浑瑊幕府中的生活和交际情况。贞元十三年（七九七年）卢纶因其舅韦渠牟荐之于德宗，离开浑瑊幕府，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幕府生活。

李益（748—829），祖籍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李益虽然才华出众，但却一直郁郁不得志，沉沦下僚，遂将眼光投向了“选辟多出词人”的幕府。

李益的第一次入幕，是在大历九年（七七四年）。唐代宗之时。当时，唐朝苦于吐蕃的数次寇边，因而调集二十余万兵马在渭北进行大规模的防秋。是年，李益以三辅属吏的身份“腰悬锦带佩吴钩”（李益〈边思〉，1985:110）秉笔参戎，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幕府，慷慨从军，随臧希让北征备边，转战千里。从此李益开始了“五在兵间”的长期幕府生活。幕府主臧希让是“以太子詹事，充任鄜坊节度使”（吴廷燮，1980:82）。在这位儒帅统领之下的幕府中，李益的幕府生

活充实而满怀豪情。或于夜间跟随军队出发征战，或如出山猛虎般挥剑杀敌，或于战事停息之际拔剑秉笔，作文抒发心中情怀，其后李益于大历十三年（七七八年）返回郑县。

李益的第二次入幕，是在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年）秋，德宗加封李怀光为检校左仆射，兼任灵州大都督和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在任节度使后召李益入幕。此时的征召，对于李益来说实在是前途迷雾中的一道曙光，李益在大历十三年返回郑县之后，就随即罢去郑县主簿的职务，其后一直在长安赋闲家居了三年。其间也曾在唐德宗宣布大赦之时，作《大礼毕皇帝御丹凤门改元建中大赦》诗，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重视，但是却未能如愿，因此李益对李怀光的此次聘用是甚为感激的。其后在应召前往朔方之时，作“问我此为何，平生重一顾。去矣勿复言，所酬知音遇”（李益《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1985:37），表达对李怀光知遇的感激之情。李怀光虽为渤海靺鞨人，但“少(小)从军，以武艺壮勇称”，性情廉洁、勤勉、严厉、勇猛，而且善于治军，“敢诛杀”，铁面无私。即使是亲戚犯法，也绝不枉法宽恕，在军中很有威望。此次入幕随李怀光巡行朔野时间很短，后李益于建中三年初夏之时即因事返回长安，入李怀光幕时间未及一年。其后欲入“司徒拥精甲，誓将除国氛”的朱滔幽州幕而“持斧”“佐功勋”（李益，1985:162），但还未至幽州就听闻朱滔叛唐之事而中途折返长安。

李益的第三次入幕，是在建中五年（七八四年）。十月，泾源之乱爆发，德宗仓惶出奔奉天。朱泚在宫外贴出告示云：“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禄食者，悉诣行在；不能往者，即诣本司。若出三日，检勘彼此名者，皆斩。于是百官出见泚，或劝迎乘舆；泚不悦，百官稍稍遁去。”（司马光，1956:7353—7354）时局动荡，纷烦扰乱，李益虽为侍御史，但此时的李益也不得不因形势的遽变而

被迫离开长安，遁去洛阳闲居将近两年的时间。仕途处于蹇碍之态，整日无所事事，困顿不已。贞元元年（七八五年）八月正当三十八岁的李益思索自己是否就此沉沦之时，却意外的接到了朔方军节度使杜希全幕府的辟召。杜希全其人，“少从军”，军令严肃，士兵皆悦服。在朱泚之乱时曾率部下与盐州刺史戴休颜和夏州刺史时常春的兵力，联合救赴国难。后皇帝因杜希全救难有功，于返回京城之时而升任杜希全为检校右仆射，兼任灵州大都督、御史大夫，受降定远城天德军灵、盐、丰、夏等州的节度使。（刘昫，1975:3921）杜希全在授命之后即辟李益入幕，李益慨然跟随。可是在杜希全的幕中，“年华已从书剑老”（李益〈上黄堆烽〉，1985:136）的李益，但却仍然“贵无身外名，贱有区中役”，没有得到杜希全重用的李益以致“忽忽百龄内，殷殷千虑迫”（李益〈华阴东泉同张处士诣藏律师兼简县内同官因寄齐中书〉，1985:25）。虽曾寄书于齐映，希望得到汲引，但是却没有回音，这怅然若失、无处宣泄的复杂而颓废的心情使得李益最终离开了杜希全幕府。

李益的第四次入幕，是在贞元五年（七八九年）冬。当时不安于“无名”的李益，带着强烈“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李益〈赴邠宁留别〉，1985:72）的希望，踌躇满志地进入邠宁节度使张献甫的幕府。张献甫，武将幕主，“少小随诸兄从军”。唐德宗贞元四年七月庚戌，张献甫被授为邠宁节度使，但张献甫还未到邠宁之时，军中就“因韩游瑰受代，惮张献甫之严，乘其无帅，纵兵大掠，仍胁监军杨明义奏请范希朝为帅”（刘昫，1975:365）而发生兵变，足见当时邠宁幕府之中将士们的骄纵不法。其后张献甫镇守邠宁之时，“乃于彭原置义仓，方渠、马岭等县选险要之地以为烽堡。又上疏请复盐州及洪门、洛原等镇，各置兵防以备蕃寇”（刘昫，1975:3498。）贞元四年九月，吐蕃将领尚志董星、论

莽罗等率兵侵犯宁州，张献甫率众兵抵御，上下一心，斩杀一百多贼寇，吐蕃兵败而退。由上可知，张献甫具有严厉的治军之才和雄韬伟略。李益虽想借由在幕府之中的机会，来成就人生之事业，赢得身前身后之名声，但此时的李益却仍然没有得到幕府主张献甫的重用。“畏老”的李益眼看着年华渐渐老去，却仍然没有作为，无奈的现实和心中焦灼的理想使得李益心情很是愁苦，无处言语的李益只得“不堪身外悲前事，强向杯中觅旧春”（李益〈答许五端公马上口号〉，1985:109）。其后于贞元八年（七九二年）之时，因公务出使朔方河中浑瑊幕府，见到了与自己同沦为下僚的妻兄卢纶，虽与卢纶登楼游玩作诗酬答，但俱为“两衰翁”的李益和卢纶此时留下的却是更加深刻的惆怅。贞元十二年（七九六年）五月，张献甫卒，李益随之也离开了邠宁幕府。

以上李益四次分别所入的渭北幕府、朔方幕府、灵州大都督杜希全幕府、邠宁幕府皆属于长安都城北方的边地幕府¹¹。这些幕府均处于唐代的西北边地，“以黄河为带，金鸡如砺，峡口环抱东北，实北陲形胜之区也”（杨芳灿 郭楷，1968:33）。“西据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桂萼《天下图本论》）的军事优势地形，如李继迁所云之：“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塞，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吴广成，2002:349）。

《旧唐书·地理志》谓：“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说明西北边地是唐朝抵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军事重地，也是唐中央与各方势力持续争夺的战略要地，因此该地战争频繁，烽烟常燃，具有浓厚“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脱脱，1975:2877）的尚武风气。由于地处西北边塞，此地也是多民族相互混杂居住的

¹¹ 在历史上，这四个幕府之间还有一定的沿革性，朔方节度使是唐玄宗在开元九年（七二一年）所置，为天宝所设十节度使之一，因其治所在灵州（今宁夏吴忠市），亦称为灵州、灵武节度使或灵州大都督。唐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年）六月，因郭子仪等九节度使联合讨伐叛军史思明失败，而从朔方节度使中分出邠（今陕西彬县）、宁（今甘肃宁县）等九州岛置邠宁节度使。乾元三年（七六〇年），因党项、羌侵略边地，迫近京畿之地，又分邠宁而置鄜坊节度使，下辖鄜州、坊州、丹州、延州等州。

地方，“五方错杂，风俗不一”（杜佑，1988:4560），开放的风俗和文化氛围，使得胡汉民族的文化也在相互交流，彼此渗透和融合。四通八达的道路也使得西北之地成为中原地区与外族往来的交通枢纽。其中充满独特异域风情的羌笛胡笳和西北边地特有的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蜿蜒的黄河、绵延的阴山、无边的沙碛、拂云堆上的神祠、饮马泉（亦鹑鹑泉）、关山、戍楼烽火、苍劲浑厚的胡笳、羌笛、琵琶之声等无不构成了游历塞北和从军入幕文人笔下独具特色的西北文化。西北边地与李益的家乡陇西姑臧，有着极为相似的地理环境和社会风气，熟悉的一切使得李益在这样的地方环境中如鱼得水，写下了大量有关西北边塞的诗作。如《观回军三韵》、《从军北征》、《回军行》、《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夜上受降城闻笛》、《石楼山见月》、《暖川》、《边思》、《拂云堆》、《观石将军舞》、《统汉峰下》和《塞下曲四首》等等，其中被当时人写为歌词的“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1985:124），被人画为屏障的《征人行》、《早行篇》皆是李益在入西北边幕时的得意所作，由此可见李益在西北边幕从军时所作诗歌的巨大影响力。

李益的第五次入幕，是在贞元十三年（七九七年）。李益在离开邠宁节度使幕府之后，游历河东与河北之地，后至幽州，被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并由从事进职为营田副使。幽州（范阳郡，今北京西南）地处于河北平原的北面，为唐朝领土范围的边陲之地。幽州虽距内地的路途遥远，人口稀少，但是却疆域辽阔，土肥地美，农业发达，北魏时就有“魏之资储，唯借河北”的说法，加之汉魏时期修建的白沟、泉州等渠沟和隋唐时期兴建的永济等河渠的灌溉，更是让河北平原的农业生产在唐朝的发展达到顶峰，成为唐代不可或缺的粮食主产区。随着发达农业生产而来的就是人口数量的增加，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幽州作为唐时

北部边境线上最大的城镇，便利的交通使其成为连接外部游牧民族和内地农耕民族的要冲之地。

唐玄宗先天二年（七一三年），因东北游牧民族势力的崛起，而在幽州设置节度使以控防奚、契丹等少数民族地侵扰。幽州之地关山险峻，川泽流通，为“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河朔，驻蹕之所”（顾祖禹，2005:440），历来皆为控扼胡族进犯的军事重镇，诚如贾至所谓之“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彭定求等编，1999:2590）。高度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自成一隅的险要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冀朝鼎所言的“农业基本经济区”¹²，其重要的程度“以致于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冀朝鼎，1981:10）这也正是后来幽州藩镇割据势力能在此地存在上百年的根本所在。该地处胡汉杂糅之所，自古以来就民族冲突不断。因长期受战争的影响，此地的人们熟知兵戎之事，惯见刀兵，擅长骑射，因而民风彪悍尚气，性情耿烈。幽州节度幕府在其存在将近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内部军乱，始终不断，对朝廷亦存时顺时叛的反复无常之态度。这一切皆是因幽州幕府内部军心不稳，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的原因。刘昫所谓其“彼幽州者，……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刘昫，1975:4683）。

李益入该幕府之时的幽州已幕府成割据之态。当时幽州幕府以刘济为节度使。刘济曾“游学京师，第进士”（欧阳修、宋祁，1975:5974），并不全然是一个武夫，其在位二十五年，为幽州幕府二十九位节度使中担任时间最长的。刘

¹² 冀朝鼎所言的农业基本经济区应该满足：农业处于高度自给自足的状态，不仅农业生产比其它地区优越，而且政治上处在同一中央集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并成为国家政治强而有力的支柱的地区。

济在位时对朝廷的态度是颇为恭顺的，不仅每年都向朝廷进献贡品，而且积极协助唐王朝镇压内乱，因此深得唐朝当政者的好感与信任。李益在入幽州幕后，被刘济提拔为营田副使。面对着刘济对自己的重用，李益回想起自己多年以来，一直对朝廷忠心耿耿，但却依旧过着“向日葵偏落，驰年水自流”（李益〈献刘济〉，1985:71）的落寞生活。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李益感激若狂，李益这种感动心情皆在《献刘济》诗之“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中得到淋漓体现。此时的李益已经五十多岁，面对着“胡为劳我形，已须还复白……无然坐衰老，惭叹东陵柏”（李益〈相和歌辞·置酒行〉，1985:15）的岁月消逝，让长期离家在外而久居幕府的李益，思乡之情日益浓厚，心中时常有“征戍在桑干，年年蓟水寒。殷勤驿西路，北去向长安”（李益〈幽州赋诗见意时佐刘幕〉，1985:94）的怀归之思。其次李益从军多年，对河朔之地深怀狡诈，罔闻忠义的“以暴乱为事业，以专杀为雄豪，或父子弟兄，或将帅卒伍，迭相屠灭”（刘昫，1975:3908）之风俗亦深有耳闻。再者，李益在幽州幕府之时，幕府之中的环境也是暗流汹涌，极不平静。刘济的次子刘总，为人阴险诡诈，与其兄刘缙不和，常与刘济的心腹唐弘实密谋，欲夺其父之位。后果然趁刘济病重，与幕中判官张玘和孔目官成国宝以及账内的小将等密谋，鸩杀刘济，并假传其父之令，杖杀其兄。当时与李益同在刘济幕中的文人有王叔平、韦稔、监察御史王永、判官张玘、孔目官成国宝、任公叔、王建等人与之为僚友，而此时李益在刘济幕中的诗作多是以壮志未酬、思乡怀归为主要抒写内容。

贞元十六年（八〇〇年），李益离开幽州幕府，漫游江淮扬州。李益的幕府生涯也随之结束。

第三章 大历幕府诗的内容论析（一）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彻天动地，犹如唐朝历史上的一道界碑，一座分水岭，将唐朝青春桀骜、肆无忌惮、壮阔前进的步伐截然遏制，唐朝从发展的顶峰，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安史乱后的唐朝社会，国运衰微，战乱频仍。“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杜甫〈垂老别〉，1998:223）的惨烈现实，可见战乱的余波亦并未随着战争的停止而消弭殆尽，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战乱平定之后的生活。“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刘昫，1975:3457）全国颓垣破壁，一片荒凉，入眼皆是满目的疮痍景象。贫寒士人们入仕的唯一途径——科举，也在门荫和科举的激烈斗争中，使得大批的落第文人穷困潦倒，困守京城（葛晓英，1994:43—49）。世道的艰难，也让秉持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焦循，1987:891）的文人们，从对理想地追求转入了现实生活，同时也对人民的苦难也有了更为深层次的体会。从军入幕，既可以一展不堪失败，奋发图强的抱负，又可以在立足于现实之上，将志在用世却谋身不忘许国的进取精神中，实现自身生命的价值，这是唐朝文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整体精神面貌的体现。文人们通过在幕府中的生活体悟，以特有的敏感观察力，将边塞幕府中或慷慨激昂、纵横驰骋；或金戈铁马，雄浑壮烈；或群贤毕集、尽欢而散，或患难相惜、依依不舍的生活，以诗歌的形式“展现了一种殊异于一般人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样相与生活形态，一方面扩展了人们对于生活空

间的体验与意识，一方面则于反映着特殊的生活寻求之余，表现了对于人的真实的生命情境的某些深切的体验。”（柯庆明，1985:120）文人们怀揣着或慷慨、或不屈，或入仕、或兼济天下的从军心态，毅然奔赴幕府。戍守边疆的雄心壮志，别样的幕府生活，确实实在在的开阔了诗人的视角，亦给了诗人们独特的全新感受，这些都为唐朝诗人的写作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第一节 报国壮志之作

在文人们的幕府创作中，最令人振奋，同时也是唐朝入幕文人心中，永恒不竭的动力源泉，就是投身幕府，荡涤心中为国建功的慷慨报国情怀。秦汉之时，班固在《后汉书》中就曾言“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之语。李益就出生在属于“山西出将”之地的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汉书》载：“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地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班固，1964:2998）。李益在自古而然的风气习俗之下，从小便文武皆习，且为飞将军李广的后裔，因此常以“飞将军”李广为榜样，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李益所作之《赴邠宁留别》，诗中云：

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侠少何相问，从来事不平。黄云断朔吹，
白雪拥沙城。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李益，1985:72）

“汉飞将”即指李广。“身承汉飞将”的李益心中，时常洋溢着“侠少何相问，从来事不平”的任使侠气的胆气。李益在诗中直抒胸臆，以“应边募”为幸，以

“横戈”、“取名”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其中所流露的气概豪情，直追盛唐诗人岑参气贯长虹之“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2004:369）的壮语，显出一种令人振奋的豪迈精神，充满了李益的爱国情怀。

李益的家乡凉州在唐代宗广德二载（七六四年）陷没于吐蕃的铁蹄之下，李益为躲避战乱，被迫远离家乡定居洛阳。随着李益年龄地增长，“凉王宫殿尽，芜没陇云西”（李益《送常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1985:60）的国仇家恨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李益的心中愈加的清晰和深刻起来。欲报国愤家仇之“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李益《送辽阳使还军》，1985:7）的情感，在李益“从军十八载，五在兵间”中所作之诗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如《塞下曲》其四，就深刻地表达了诗人欲建功立业的豪壮情感：

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李益，1987:106）

诗中用勒石燕然的东汉车骑将军窦宪的千秋功业的事迹，来表达自己心中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报”、“莫”、“请”、“愿”四个字的运用，皆凸显出了诗人心中豪迈的情感和杀敌报国的凌云壮志，其高昂的声调、奋发的精神直逼盛唐诗人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彭定求等编，1999:1444）

卢纶的《送刘判官赴丰州》则是借着对友人的送别，表达了自己欲从军报国，杀敌平虏的激越心情。其诗云：

衔杯吹急管，满眼起风砂。大漠山沈雪，长城草发花。策行须耻战，
虏在莫言家。余亦祈勋者，如何别左车。（卢纶，1989:108）

送人离去，才刚“衔杯”就听管急吹，风沙弥漫，遮断去路。诗人思绪却生双翼，随人远去，辽阔苍茫的大漠，积雪满山，蜿蜒曲折的长城，草幽花开，在期盼友人锐意进取，建功报国的同时，援用了西汉霍去病“莫言家”¹³的典故，借以抒发诗人回荡心中“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司马迁，1963:2939）的理想抱负和爱国情感。

戎昱的心中也是一直洋溢着昂扬奋发的气概，如在入幕之前所作之《泾州观元戎出师》，诗云：

寒日征西将，萧萧万马丛。吹笳覆楼雪，祝纛满旗风。遮虏黄云断，烧
羌白草空。金铙肃天外，玉帐静霜中。朔野长城闭，河源旧路通。卫青师
自老，魏绛赏何功。枪垒依沙迥，辕门压塞雄。燕然如可勒，万里愿从公。
（戎昱，1982:17）

面对国家的深重灾难，戎昱在诗中表达的是作者希冀慷慨从幕，不惧万里路途的遥远，而愿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豪壮气概。戎昱在进入荆南幕府之后，戎昱在面对幕府主时，更是直抒心中“忠臣思报国，更欲取关西”（戎昱〈观卫尚书九日对中使射破的〉，1982:38）的情感，表达了诗人勃勃遒劲的慷慨报国之志。

13

韩翃虽生卒年不详，但其在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就已经赴京城应举，说明其至少是出生在天宝年间。在面对国家的危难，诗人的心中少了其他诗人那深重哀婉的苦难悲叹，韩翃的心中仍然是昂扬着盛唐人心强烈的豪迈精神。如其所作的《送孙泼赴云中》：

黄骢少年舞双戟，目视旁人皆辟易。百战能夸陇上儿，一身复作云中客。寒风动地气苍茫，横吹先悲出塞长。敲石军中传夜火，斧水河畔汲朝浆。前锋直指阴山外，虏骑纷纷胆应碎。匈奴破尽人看归，金印酬功如斗大。

（彭定求等编，1999:2721）

诗中洋溢着韩翃心中独特的进取精神，散发着诗中少年勃发的英气和高亢昂扬的报国壮志。“寒风动地气苍茫”的凄寒景物描写和“斧水河畔汲朝浆”艰苦的军中生活，为“横吹先悲出塞长”作下铺垫，更是直接突显了诗中“前锋直指阴山外，虏骑纷纷胆应碎”的凌云壮志。

除上述之诗句外，李益《送柳判官赴振武》中：“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李益，1985:66）也是借友人的离开，表达了诗人心中建功报国的宏伟壮志。《塞下曲四首》中“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李益，1985:106）则用勒石燕然的东汉车骑将军窦宪的千秋功业的事迹，表达了自己心中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即便是在自画像诗的描绘中也表达了诗人在幕府从军生活中昂扬激越的报国心情。《边思》云：“腰垂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李益，1985:110）。诗中散发着作者身为“关西将家子”的乐观自信，锦带腰间垂，吴钩身边佩，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位将家子文武双全、英姿焕发的形象。俞陛云在《诗境浅说续编》一书中评曰：此诗“后

二句言，莫笑其豪健，为关西将种，能载满怀诗思，西入凉州。听风听水，谱绝域霓裳之调，更能防秋走马，独着边功。随陆能武，绛灌能文，此君兼擅之”（俞陛云，2008:173）。清人乔亿也称此诗表现了李益的“本色，有风调”。自信乐观，慷慨从容，以身报国的豪迈心情一直在诗人的幕府创作中有所体现。

由上述所举分析可知，幕府中所作的诗歌，在中唐时面临外有边疆不稳，吐蕃、回纥相继持续的侵扰，内有君权旁落，宦官侍宠专权，社会经济状况一片混乱，士人们在心中“临患不忘国”的忠贞爱国之情推动下，高昂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逯钦立辑校，1983:433）的豪迈气概而投身幕府，这是在唐朝安史之乱后，黑暗衰败社会中的一抹耀眼的亮光，而这抹亮光的色彩，亦正体现在了诗人那慷慨激昂、建功报国的雄心壮志之中。

第二节 军旅写照之作

文人幕府从军，多从事于文职工作，很少亲自随军在战场之中冲锋陷阵。刀光剑影，风雷激荡的军营生活，对久居象牙之塔，苦读四书五经和研习孔孟之道的儒士文人来说，具有强烈新鲜的感官刺激和独具特色的异域风情。真实的切身感受，亦使得文人们对戎马弓刀，豪情四溢的军旅生活有了壮美的发现，激动翻腾的思绪连翩接踵，全都化作了诗人心中精彩纷呈的审美意象。诗人大笔挥洒，将眼中所见之有声有色的幕府生活全部都奔注于笔端，化为精彩激扬的文字呈现在我们眼前。

《腊日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是卢纶捕捉军中狩猎活动时所见而加以细致生动的描写：

山头曈曈日将出，山下猎围照初日。前林有兽未识名，将军促骑无人声，潜形踞伏草不动，双雕旋转群鸦鸣。阴方质子才三十，译语受词蕃语揖。舍鞍解甲疾如风，人忽虎蹲兽人立。欻然扼颡批其颐，爪牙委地涎淋漓。既苏复吼拗仍怒，果协英谋生致之。拖自深丛目如电，万夫失容千马战。传呼贺拜声相连，杀气腾凌阴满川。始知缚虎如缚鼠，败虏降羌生眼前。祝尔嘉词尔无苦，献尔将随犀象舞。苑中流水禁中山，期尔攫搏开天颜。非熊之兆庆无极，愿纪雄名传百蛮。（卢纶，1989:237）

腊日，据《荆楚岁时记》中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月。”（宗懔著，1986:53）每年腊日猎兽是唐人的习俗之一。这是卢纶进入浑瑊幕府不久之后，对军中狩猎生活的一次描写。卢纶在入幕之前，曾是豪门权贵的“朱门坐中客”，也曾因受到宰相元载的赏识而“累迁监察御史”（宋祁、欧阳修，1975:5785）。老子曾云“福兮，祸之所伏。”（老子，1984:235），卢纶的成功因为元载，失败也是因为元载。卢纶在经历元载的牵累而获罪下狱的事情之后，整个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彷徨状态，心中充满了“愁深语自迟”、“人愁影屡移”的极度愁苦。生活、理想、壮志似乎皆已烟消云散。在卢纶的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幕府的生活却为卢纶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幕府生活的新鲜气息，将卢纶从趋炎权贵的褊狭范围中，带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因此诗中所述内容虽然只是军中循例的狩猎活动，但却被卢纶写的激情洋溢，豪兴遄飞。天色未明，日头将出，山头已被探头的红霞染红，光亮温暖。旭日破晓，奔迸而出，霞光散漫开来，围猎之地被霞光照亮。这起始两句不仅点明

了时空的变化，而且写出了诗人随军猎兽时激动不已的心情。从日未出而到太阳的升起，气势磅礴，为后面的猎兽场面诗句的描写叙事打下雄浑的基调，令人精神振奋。

围猎开始，猛兽出现。猛兽“潜形踞伏草不动”，但已被搜寻猎物的“双雕”发现踪迹，在空中盘旋的大雕惊得树林中的群鸦四散逃窜，叫声不止。将士“无人声”、猛兽静、乌鸦惊，捕猎的紧张气氛骤然在这动静之间被渲染得淋漓尽致。“阴方质子”娑勒去擒猛兽，“舍鞍解甲”行动如风；“人忽虎蹲兽人立”，沈德潜注曰“人虎互形，毛发生动”（沈德潜，1979:235）。娑勒捕虎“欬然扼颡批其颐，爪牙委地涎淋漓。既苏复吼拗仍怒，果协英谋生致之”，寥寥数句，将擒虎的全过程描写得极其逼真，绘声绘色而扣人心弦。人兽相搏的关键动作，“蹲”、“立”、“扼”、“批”、“委”、“吼”、“怒”被诗人准确捕捉，真字字精彩，笔笔传神。正如《唐诗镜》卷三二评云：“中数语写得有色”（陆时雍，2003:632），娑勒矫健的身手和勇武无比的形象在诗人的笔下跃然于纸上，而该诗篇遒劲有力的风格，亦正如《重订唐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言：“中间搏兽数语，何减太史公鉅鹿之战”（沈德潜，1979:236）。

李益的《观骑射》一诗，则描述了将军射雕时的飒爽英姿：

边头射雕将，走马出军中。远见平原上，翻身向暮云。

（李益，1985:94）

辽阔苍茫的平原之上，“射雕将”跃马而骑，风驰云走。驰骋远处，诗人未能清楚的看清其射雕的动作，只一个“翻”字便写出了将军身段的灵巧。诗中并未使

用藻饰性的语言，对射雕将军的英雄气概进行装饰，仅用了“走”“翻”两个动态性的字就极简明的写出了射雕将军身手的矫健，其勇武的形象栩栩如生，如在目前而极为传神。

幕府诗人所作诗歌，除了对将士们军营生活的直接描绘和抒写之外，亦有对将士们行军征战场面的真实描写。如李益《度破讷沙二首》其二：

破讷沙头雁正飞，鹄鹳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

(李益，1985:100)

此诗是诗人描写军队战罢凯旋归来，度过破讷沙漠的情形。诗中截取的场景十分独特，摒弃了传统对战斗场面的描写，而是选择了战争之后归来的场景来讴歌边疆战士的英雄气概，正如清人吴乔《围炉诗话》中云：“七绝乃偏师，非必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有或斗山上，或斗地下者”（郭绍虞，1983：531）。诗中所写之破讷沙，此时天色未明，浩瀚无边的沙漠中万籁俱寂，蓦然间雁群腾空惊飞，原来是战斗之后凯旋归来的军队，在沙漠中整齐划一的趁夜行进，“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欧阳修，2001:256）。日出来临，一轮闪着金光的红日从地平线上奔迸而出，气势宏阔。黄色的沙砾与霜华在红日光辉的照耀下，闪烁着绚丽夺目的光芒，战士们的银色甲冑也在日光的照射下寒光闪闪，金光与寒光交相辉映，形成了光彩璀璨的壮观景象，此等景象“诚非身亲其景，不能为此言”（陈伯海，1995:1482）？画面壮美开阔，雄奇瑰丽，客观的景色与作者的情感在此刻已然混成一体，情景交融，强烈的表达出了作者对征战军人慷慨卫国，而又悲壮情怀的高歌。

李益的《夜发军中》则直写战事来临，战前的征兆：“边马枥上惊，雄剑匣中鸣”被诗人敏锐的触觉所捕获，诗人将战争的紧张氛围：“半夜军书至，匈奴寇六城”与将军战士们勇猛无畏的精神通过寓情于物的描写方式烘托而出，“中坚分暗阵，太乙起神兵。出没风云合，苍黄豺虎争”四句则对将士们的勇猛神武和战斗的激烈程度进行了概述，将将士们驰骋疆场，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高昂飞扬的诗调，雄壮浑厚的气势，使人读之深感幕府军营生活的波澜壮阔。

军罢休整，军中的生活亦是粗狂而豪迈的，将士们的情感是炽热而真切的。《暮过回乐烽》中抒写得便是这样一群豪放俊爽的边防将士，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对战争勇猛无畏的精神面貌：

烽火高飞百尺台，黄昏遥自磧西来。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

(李益，1985:114)

诗人以轻快灵动的笔调写出了巡边归途中的感受。落日的余晖洒满了广阔的沙漠，熊熊燃烧的烽火在回乐烽的高台之上灵动跳跃。这凄清落寞的景象，似乎要为抒发作者的寂寞哀愁作下铺垫。但诗人在最后两句反转诗意，以“昔日”和“今日”之时空作对比，以前的军人征战以“回应乐”，而今日的征人从军则“乐未回”。古今的对照，强而有力地颂扬了边军将士们慷慨从戎，豪迈乐观的精神，军士们置生死于度外而视死如归的勇气，直追盛唐时人“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彭定求，1999:1609）的坦荡胸襟。铿锵有力的语言，同时亦是盛唐诗人王昌龄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誓不还”（彭定求，1999:1444）的豪爽气魄的传承，强而有力地表现了将士们保边卫国的雄心壮志和热烈爱国情怀。

李益有着“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李益〈从军诗序〉，1985:145）的军幕生活，因此对军中的生活体会极其深刻。唐朝社会的强盛在安史乱后繁华消熄，一去难返，文人们慷慨高昂的从军热情，也在荆棘载途的现实中得到冷却。诗人在其幕府的创作之中，也体现出了唐朝社会这种衰微的国势。如《从军北征》，其诗云：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李益，1985:113）

此诗是李益在进入朔方节度使幕府，跟随幕主巡行朔野之时，深感国力已强盛不再的感念之作。诗人虽在诗中截取了军旅生涯中一个雄壮而又悲凉的行军场景，但钟惺评此诗“全是龙标气调”。李益以“天山”、“雪后”和“风寒”精练地点明了这次行军地点、季节和天气情况，成功衬托出了行军的环境和气氛。天山，雪后，霜雪严寒，海风刺骨，雪后寒冷的空气也越发逼人。此时，却听见笛声悠扬婉转，吹奏的偏是凄凉哀怨的《行路难》。一种悲伤又兼壮美的境界，在诗人笔下油然而生。通读全诗，会发觉李益似乎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用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捕捉到的一个行军画面。但其实不然，正如清人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说：“《从军北征》妙在不说自己，而已在其中”（转引自陈伯海，1995:1484）。最末两句的“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中的“碛里”“月中”也为诗人的抒情加重了笔墨。此时，将画面停驻，可以想见北征的军队，在辽远壮阔的

天山中，军人冒着冷酷严峻的风雪，听着凄婉悲凉的笛声，趁着凄清的月色在一片荒芜沙漠中行进，这使人深感环境的荒凉和气氛的凄怆。陈伯海引《唐诗摘抄》卷四云其：“回首，望乡也，却藏一‘乡’字。闻笛思乡，诗中常意，硬说三十万人一时回首，便使常意变新”（陈伯海，1995:1484），而达到“境界全出”（王国维，1998:2）的动人效果。诗人巧妙地通过以“静”环境气氛的渲染，再配以“动”的乐声来进行烘托，感染力极强，难怪乎郭弘谓此诗是一幅色、音、情完美有机组合的图画（郭弘，2007:105—106）。动静之间，远戍征人深沉酸楚的心理被描写的惟妙惟肖，无法言说的痛苦，都含蓄而深沉的借由景物的描写奔涌而出。这既是对征人远戍边疆无法还家的深刻描写，也是对唐朝国力衰微的一种间接的表达，蕴藉深沉。

中唐之时，入幕戍边的兵士本有一定的轮休期限。但是随着兵制地破坏，边战的频繁和边防战线的延长，轮休的期限被取消，许多的戍边士兵被迫留在边塞而致久戍不归。李益的《五城道中》：“五城鸣斥堠，三秦新召募。天寒白登道，塞浊阴山雾。仍闻旧兵老，尚在乌兰戍”（李益，1985:41）。就是征人欲还家却遥遥无还家之日的悲苦心情的真实写照。世道艰难，边疆外敌侵扰不断，人民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将士们“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沙皆赤”（李益〈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1985:44）的伤亡惨重的征战，朝廷却腐败无能。“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李益〈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1985:125），就是对朝廷这种无能行径进行了有强烈的讽刺。愁肠百结，忧心如焚的李益发出了悲愤哀怨的“麟阁何人定战功”的呐喊，以激烈、直抒胸臆的方式讽刺了朝廷政治局面的混乱，深沉地表达了诗人对朝廷中既无治国良将，国家又无良将可以戍边御敌的忧患之思。这种“几处吹笳明月夜，

何人倚剑白云天”（李益〈盐州过胡儿饮马泉〉，1985:78）的备边无人，忧时伤世的情绪，也体现在诗人的其他幕府创作之中。纵使战争胜利，面对战后留下的十室九空，百孔千疮的社会，李益也感到了锥心的茫然之感。《统汉烽下》：“只今已勒燕然石，北地无人空月明”（李益，1985:119）。“燕然石”与“空月明”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巨大的意象反差所形成的孤寂悲凉和茫然无措的情绪，长久的萦绕在诗人心间挥之不去。诗止，情却未止。

第三节 幕宴陪游之作

文人进入幕府的动力，不仅仅是那在心中激荡的爱国主义理想的热情，立足现实的中唐文人们，更器重的是将幕府视为入仕朝廷或向官场迅速升迁的中转站，亦如戴伟华所谓：“朝廷非闲地，幕府为文士入朝升迁之津梁”（戴伟华，2007:11）。幕府的生活不似朝廷生活那样墨守成规，升迁也不像在朝廷之中那样严格拘谨，相对而言幕府之中的氛围是比较轻松的、自由的。文人们的来去亦颇为便利，常常为了更好的发展，入幕的文人可以根据自身和幕府的情况来选择幕府。幕府对入幕文人也没有严格的人身约束力，进入幕府中的文人的生活也是比较自在的，幕府之中的文职工作，基本上是由幕主辟属的有才之士来胜任的。幕主所聘请的文人要不是进士出身，要不就是享有当时才名之人。因此，能进入幕府之中的文人皆是具备真才实学的文人。唐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唐社会在“玄宗开元中，宰相十数人，皆文学之士”和“古之词人之达，莫盛此时”（胡应麟，1958:168）的时代精神影响下，文人们皆将其精力主要放在了诗歌的创作之上，因此在中唐的社会中，文人亦即是诗人。幕府之中，除了行军打仗，

御边敌寇之外，文人们则是经常参加在幕府之中所举办的大大小的宴会。文人们在宴会上畅饮交谈，孔子曾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李学勤，1999:237）。在诗“可以群”所体现的社会交际方面功能下，文人们饮酒赋诗，借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其不仅能增进感情，又可与同幕文人切磋诗艺，驰骋才情，在同道之人的赞美之声中，获得自我的成就感与集体的认同感。诚如吴在庆所言：“集会宴游是文明社会人们常有的生活内容，它是人们进行交往、交流感情的一种常见的重要方式。而且越是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这种活动也越是频繁，越具有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作用与意义”（吴在庆，2006:118）。特别是在幕府，这样一个以幕主为尊的小环境中，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就更加的凸显出来。幕主就是这个小环境中的主宰者，文人在幕府中能否升迁沉浮全凭府主之意志，因此在幕府的宴会，文人幕僚都会借机向幕主赋诗献诗，以表明自己的忠贞心意和远大的抱负，而求得幕主欣赏和重视。虽然在这样的游宴诗中难免有着应酬的习气和流于世俗的奉承之意，但其中亦不免的包含着诗人对自己功业思想的真诚抒发，和对幕主的真挚的感激之情。

农历九月九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在重阳之日，古人皆要外出游览赏秋。据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载，在此日子里佩戴茱萸、登高、饮菊花酒可以避免灾祸（吴均，1999:1007）。后世沿袭而成风俗，到了唐朝，已经成为正式的民间节日了。大历二年（七六七年），戎昱入荆南卫伯玉幕府。戎昱参加了九日重阳节时幕中所设的宴会，其时所作的《观卫尚书九日对中使射破的》中，就极力地表达了对幕主射箭技巧、英姿的赞美，诗云：

盛宴倾黄菊，殊私降紫泥。月营开射圃，霜旆拂晴霓。出将三朝贵，弯

弓五善齐。腕回金镞满，的破绿弦低。勇气干牛斗，欢声震鼓鼙。忠臣思
报国，更欲取关西。（戎昱，1982:17）

幕中设宴赏菊，饮菊花酒，又恰逢皇帝的“殊私降紫泥”，真可谓双喜临门。诗人因此在这样的时机里，向幕主献诗，既可以露才扬己，又可以趁机向幕主陈述自己的情意。诗中的“出将三朝贵，弯弓五善齐”，直谓卫伯玉乃是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而爵位显贵，从而表达出幕府主人出身的不平凡。而后的“勇气干牛斗”，则对卫伯玉在靶场射箭时之英勇的气势极力称赞，称其气势可穿过天际，直达天上的星宿，后更一步的抒发了自己愿随卫伯玉“忠臣思报国，更欲取关西”的豪言壮念。此诗中多是对幕主卫伯玉的极力赞誉之词，奉承之意甚浓。此后戎昱在进入湖南崔瓘幕中时亦有《上湖南崔中丞》的献诗，诗中的言语之间充满了对崔中丞的感恩之情，诗云：

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举世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
贫。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

(戎昱，1982:43)

诗中首开即以山上苍劲挺拔的“青松”和天上洁白无瑕的“云”来比喻崔瓘，而将自己比作陌上那微不足道的“尘”和“泥”，不言而喻的表明了幕主崔瓘和自己身份地位的悬殊差别。其中所用的比拟手法，虽不免夸大而含有奉承之嫌。诗人虽在诗中对崔瓘“举世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的提拔赏识，充满了感激之情，但在这“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的感恩的言语中，却是

“透出（诗人）刚直和自尊”（蒋寅，1990:73—78）的人格操守，而其中所表达的态度，颇有战国士大夫的“（君）以国士遇臣，臣以国士报之”（缪文远，2007:241）的骨气。难怪乎蒋寅在《大历诗人研究》中，激赏其诗作“通篇皆洋溢着激昂慷慨之气”（蒋寅，2007:107），在肯定戎昱对崔瓘表示感恩的同时，其诗中也透露着诗人那潜藏于内的刚直和自尊，称赞“戎昱是真正得到盛唐精神遗传的唯一诗人”（蒋寅，2007:107）。

卢纶在幕府之中深受幕府主浑瑊的重用，经常跟随浑瑊宴饮游赏，因此卢纶在幕府中有不少的奉陪游宴时所作的诗歌。如其所作之《九日奉陪令公登白楼同咏菊》，诗云：

**琼尊犹有菊，可以献留侯。愿比三花秀，非同百卉秋。金英分蕊细，
玉露结房稠。黄雀知恩在，衔飞亦上楼。（卢纶，1989:390）**

卢纶进入浑瑊幕，是卢纶在遭受元载、王缙之罪的牵连而入狱失官，其后又遭逢泾源兵变而被困长安，极度困顿潦倒之时，被浑瑊聘为河中幕府的元帅判官，才结束了在长安“病中饶泪眼常昏，闻说花开亦闭门”（卢纶〈春日卧病示赵季黄〉，1989:327）的艰难生活，由此卢纶对浑瑊是非常感激的。因此在卢纶幕府陪宴所作的诗中，卢纶常常在诗中表达自己对幕府主浑瑊的感激之情。卢纶在九日奉陪令公登楼，在共同观赏“金英分蕊细，玉露结房稠”的烂漫菊花之外，诗人也在诗中以“黄雀知恩在，衔飞亦上楼”之语，来表达自己对浑瑊的感恩报德之心。

春回大地，一切事物在经冬之后万象更新，如《春日喜雨奉和侍中宴白楼》云：

鹤鹤相呼绿野宽，鼎臣闲倚玉栏杆。洪河拥沫流仍急，苍岭和云色更寒。艳艳风光呈瑞岁，泠泠歌颂振琯盘。今朝醉舞共乡老，不觉倾欹獬豸冠。（卢纶，1989:382）

春日雨水纷落，雨后空气焕然一新，清新而凉爽。诗人陪侍中和众人登上白楼，倚栏眺望，春日雨后的景色尽收眼底。水草中的“鹤鹤”因雨水的到来，而相互鸣叫欣喜；草木亦因雨水滋润而愈发青翠欲滴，迸发出勃勃生机；极目远眺，翠绿的颜色，无尽蔓延而越显宽广。“洪河”即黄河，黄河的水流在雨后汹涌奔腾，激起重重白沫，白沫未消，水又复至，愈加湍急；苍翠的山岭中，云在其中穿梭游停，相互映衬，趣味盎然。绿野山川因雨水而光彩动人，呈现一片丰年的气象，诗人的心也为这喜雨而作歌，声如珠走琯盘，音节泠泠，娓娓动听。老子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老子，1984:79）。诗人在诗中对景色清新的着力描写，不仅是春日生机盎然的实写，更是诗人心中安逸闲适的幕府生活，心情舒畅畅快的淋漓体现。美景当前，友人相伴，共享此时，把酒共舞，不觉已酒酣耳热。这春日雨后的宴会，在卢纶的笔下这是一场闲情自适，不甚欢喜的欢乐楼宴。

韩翃所作之《陪孟都督祭岳途中有赠》和《祭岳回重赠孟都督》，诗云：

封疆七百里，禄秩二千石。拥节祠太山，寒天霜草白。

（彭定求等编，1999:2748）

封作天齐王，清祠太山下。鲁公秋赛毕，晓日回高驾。

从骑尽幽并，同人皆沈谢。自矜文武足，一醉寒溪夜。

(彭定求等编，1999:2719)

从诗题和诗意即可以得知，这两首诗都是韩翃在入淄青（今山东省）节度使幕府时，陪兖州孟都督秋日祭祀泰山之时所作。诗中极简练的描写孟都督在泰山“清祠”所进行的酬神祭祀活动。“鲁公”指伯禽，《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云：“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司马迁，1959:1518）。后因以作典，来比喻统领鲁地的长官。孟氏此时为兖州都督，因此以鲁公伯禽作比。祭祀活动结束后，清晨勒马回行，韩翃所观之骑马的随从，精神振奋，皆具豪侠之气，“同人”则借“沈谢”的典故，指出孟都督的幕宾多为有文才之士。孟都督幕中僚属人才济济，文武皆备，诗人那难掩的钦慕之心与艳羡之情，流沛于诗句之间，以致多年以后诗人在送人祭祀泰山之时，作诗对曾经亲随孟都督祭祀泰山进行了回想，诗中云：“东岳昔有事，两臣朝望归。驿亭开岁酒，斋舍着新衣。上客钟大理，主人陶武威。仍随御史马，山路满光辉”（彭定求等编，1999:2738）。诗中尾联中的一个“仍”字，既实写了卢大理和赵侍御祭东岳的光辉盛事，也将自己曾随孟兖州祭岳的美好回忆，巧妙地融进了此次祭岳之中，含蓄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亲陪孟都督，祭祀泰山之行的怀念与感慨之情。

安史之乱后，幕府蓬勃发展。随着节度使权限的扩大，幕府所辟署的人员也随之增加，各幕府僚属之间因公因私亦纷繁交往。幕府中常有因公务往来而需设宴款待来访宾客，宴会之中亦会赋诗以传达情谊。唐德宗贞元八年（七八三年）

间，李益时在邠宁节度使幕府中，因公务出使河中幕府，恰逢卢纶正在河中幕府任职。夜幕降临，设宴款待，本是旧识亦是亲戚关系的两人，在久别重逢之时，本因有他乡遇故知的激动欣喜和喜极而泣的感情，但两人相见，脑中浮现历历往事，却是不禁悲从中来，万般言语皆化作卢纶的《酬李益公夜宴见赠》和李益的《赠内兄卢纶》两首五言绝句，诗云：

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歌酒夜，相对两衰翁。

《酬李益公夜宴见赠》（卢纶，1989：167）

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悲与病，来对朗陵翁。

《赠内兄卢纶》（李益，1985：91）

十年之前卢纶与李益皆因战乱而致东西分别，十年之后的今天命运竟也是如此相同，尽同为淹滞于幕府的失意之人。在这觥筹交错、歌舞齐鸣的喧嚣之夜，彼此相对久望，卢纶此处借用《诗·大雅·行苇》：“戚戚兄弟，莫远具尔”中的“戚戚”一词，既点出了兄弟之情，又写出了彼此内心的“戚戚”之色，亦写出了此刻心中的“戚戚”之情。面对年华的老去，竟无语凝噎，心中充满了无限“悲凄含蓄”（邢昉，2008：307）的伤感之情。李益在诗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体会。中年之时被迫离散的酸楚，残余之生还能再次相见的欢喜，艰难相见却是悲病相侵，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不胜唏嘘。由两首诗的感情基调和内容相似程度，可知两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在此次宴会中得到了激荡的碰撞，彼此相互交融。纳兰性德在《渌水亭杂识》所评：“句律凄婉，如出一口”（纳兰性德，1983：385）。语调平淡质朴却情意真切，亦如宋人洪迈在《容斋诗话》中所评：“纶于益为内

兄，尝秋夜同宿，益赠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愁与病，独对朗陵翁。’纶和曰：‘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问两衰翁。’二诗虽绝句，读之使人凄然，皆奇作也”（洪迈，2004:519）。两篇诗作虽情意凄婉，却足见两人之间情感的共鸣，彼此的距离也在幕府诗歌的创作之中缩短，情感得到升华。李益虽“五在兵间”，但其在幕府之中的陪游宴会诗作却不多。新旧《唐书》中皆云李益长为歌诗，但他却在唐宪宗诏他入朝为官之时，自负有才而恃才傲物，为众人所不容。这在其幕府中所作的《奉酬崔员外副使〈携琴宿使院〉见示》诗亦可以略窥一二，其诗云：

忽闻此夜携琴宿，遂叹常时尘吏喧。庭木已衰空月亮，城砧自急对霜繁。

犹持副节留军府，未荐高词直掖垣。谁问南飞长绕树，官微同在谢公门。

（李益，1985：75）

这首诗是李益在幕府之中少有的奉陪之作。诗一开头诗人就以“忽闻此夜携琴宿，遂叹常时尘吏喧”的怨怼之意，可以看出诗人不喜交际应酬的心理。月色皎洁，在诗人看来却是如此空旷无趣，院庭之中，树木衰落萧索，城中“自急”地捣衣之声，这些景象的描写表现出了诗人奉陪时沉闷烦躁的心理。接着诗语陡然突变，“犹持副节留军府，未荐高词直掖垣”表现出了诗人情绪的波动变化，言语颇为激烈，直言对方现在仍是“持副节留军府”，还并未得到崔员外的推荐而“直掖垣”。诗末的“官微同在谢公门”语气颇为讥讽，表达了对对方与自己的命运是一样的，皆只是军府中官小职微之人而已。这种语带激烈、情绪不快的幕府奉陪诗，明显地违背了幕府宾主相亲、以极尽齐欢的规则。在这个升迁全靠幕府主意志的

环境中，显得是那么不和时宜。再据李观所作之《邠宁庆三州节度饷军记》中所载：“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恶群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书，命观书之”（董诰，1983:5424）。亦可知李益有才，但其性格刚直，极恶趋炎附势之人。刚直的性格，不阿谀奉迎的态度，使得李益与幕中其他人的关系不谐。因此在现存李益诗集中，在幕府奉陪交游诗创作甚少，这也是李益从军十八载中，几次辗转不同幕府的原因之一。

小 结

文人们满怀爱国精神和豪迈情怀进入幕府。幕府之中金戈铁马，慷慨激昂、纵横驰骋的军旅环境；与幕府中人饮宴赋诗、游历山水和诗歌交流，这些都让入幕的文人，感受到了不同于往日生活的感官体验。文人们以特有的敏感观察力，将这种“展现了一种殊异于一般人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样相与生活形态，一方面扩展了人们对于生活空间的体验与意识，一方面则于反映着特殊的生活寻求之余，表现了对于人的真实的生命情境的某些深切的体验”（柯庆明，1985:120），通过报国壮志、军旅写照和幕宴陪游的主题形式表达出来，为我们状写下了幕府之中风雷激荡的生活体验。

第四章 大历幕府诗内容论析（二）

第一节 送别亲友之作

幕府，是文人作为仕宦之途上的跳板，并不是文人最终向往留恋之地。幕府对从幕文人之来去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文人可以自由来去。幕府中也常因职位调任、罢免和公务来往，不可避免的产生迎来送往，因此幕府中人员的往来很频繁。身为幕府中的文人，难免要面临着这些令人难以预料的短暂相聚和长久的离别。时局动荡，世事险恶，渺茫未知的前路和“悠悠远离别，分此欢会难”（彭定求等编，1999:1911）的情感体验，如屈原之“悲莫悲兮生别离”（朱熹，2001:40）的深沉感伤。临行将别，聚散依依，离别是人生旅途中经常发生且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聚散之际和离别之时生成的惆怅情绪，皆化作了诗人笔下情真意挚，悱恻动人的送别诗。幕府中的送别诗作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应酬交际为主的送别诗，一种是对知己好友间的送别诗。

一、以应酬交际为主的送别诗

这种送别诗因对象的特殊性，如幕府府主、高官大员或是往来幕府办公的使者等，有着较强的应酬意味。诗中少了离别之时的忧愁和痛苦，多是对送别之时壮观场面的描写之语、或是对他人的鼓励赞叹之意、或是对被送之人的溢美夸耀之词。这种为“为文而造情”的习气，使之缺乏了真实情感的润色变得“繁采寡情”，令人“味之必厌”（刘勰，1962:538），而成为文人点缀风雅之物和官场

中的交际手段。卢纶在浑瑊幕府时，所作之《陈翊郎中北亭送侯钊侍御赋得带冰流歌》，诗云：

溪中鸟鸣春景旦，一派寒冰忽开散。壁方镜员流不断，白云鳞鳞满河汉。叠处浅，旋处深。撇捩寒鱼上复沉，群鹅鼓舞扬清音。主人有客簪白笔，玉壶贮水光如一。持此赠君君饮之，圣君识君冰玉姿。

（卢纶，1989：231）

送别之作，多从眼前景物描写入手，借景生情来抒发惜别之意。前三句皆为送别时的景物描写。旭日东升，溪水潺潺，鸟儿在树林间休闲鸣叫，好一幅春日的美景。春日气温回暖，溪中寒冰碎裂，断冰兜兜转转，随水而走。层见叠出的冰雪，仿若银河之中飘动的鳞鳞白云，浅叠，深旋；冰流之中，鱼儿沉浮；溪边，白鹅鼓翼而舞，发出清亮的叫声。其后转景入情，切入题中送别之意。“玉壶”取意《代白头吟》中的“清如玉壶冰”，卢纶用“冰玉姿”来称赞侯钊志向远大和品行清廉。卢纶送拾遗崔邠离开幕府之时，也有“皎洁无瑕清玉壶，晓乘华幘向天衢”（卢纶〈送崔邠拾遗〉，1989：71）的赞美之言。

贞元七年（七九一），尹枢和令狐楚及第后归覲太原。经过河中时，卢纶作《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覲》送别二人：“佳人比香草，君子即芳兰。宝器金罍重，清音玉佩寒。贡文齐受宠，献礼两承欢。鞍马并汾地，争迎陆与潘。”（卢纶，1989：76）；《送张郎中还蜀歌》：“秦家御史汉家郎，亲专两印征殊方。功成走马朝天子，伏槛论边若流水。晓离仙署趋紫微，夜接高儒读青史。泸南五将望君还，愿以天书示百蛮”（卢纶，1989：224）和“早晚登麟阁，慈门欲付

公”（卢纶〈宝泉寺送李益端公归邠宁幕〉，1989：502）等诗，诗中多是诗人对送别之人的赞誉溢美之词，缺乏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戎昱在幕府中时亦有《送李参军》，其诗云：

好住好住王司户，珍重珍重李参军。一东一西如别鹤，一南一北似浮云。月照疏林千片影，风吹寒水万里纹。别易会难今古事，非是余今独与君。（戎昱，1982:72）

此诗的语言白话，诗意浅显易懂。诗中用“别鹤”、“浮云”、“疏林”、“寒水”的景物状写离别之情，但诗中之情与景却似松散无联系，未能达到以景状情的效果。戎昱虽想在诗末将离别之情表达得洒脱自然，但其拙劣的笔力和对诗歌语言驾驭能力的缺乏（蒋寅，2007:102），使得诗歌表达并没有达到尽如人意的效果。反如蒋寅在《大历诗人研究》中所指出的：“‘别易会难今古事，非是余今独与君。’这一联意思本不错，只因衬贴了‘是’、‘今’两个闲字，遂致臃肿可恶。”（蒋寅，2007:101）

又，戎昱《赠别张驸马》一诗。戎昱在诗的前半段，极力描写了张清归宅之时“飞龙骑马三十匹，玉勒雕鞍照初日。数里衣香遥扑人，长衢雨歇无纤尘。从奴斜抱敕赐锦，双双蹙出金麒麟”的铺张奢侈生活，“一身扈跸承殊泽，甲第朱门耸高戟。凤凰楼上伴吹箫，鹦鹉杯中醉留客”（戎昱〈赠别张驸马〉，1982:15）的权势。宝应元年（七六二）四月，肃宗死。张皇后与越王系谋杀李辅国及宦官程元振，事不成，反被杀。张清亦因此“一朝负谴辞丹阙，五年待罪湘江源”。张清虽处于“冠冕凄凉几迁改”和“华堂金屋别赐人”的悲惨之地，戎昱却对他

心存“看君风骨殊未歇，不用愁来双泪垂”劝勉宽慰之情。

韩翃半生都在幕府之中辗转，作为幕府“军中之书记，节度之喉舌”（令狐楚，1983:5506）的掌书记，是幕府中以文笔事人的高级文职人员。这样的职位，使得韩翃在幕府生活中少不了对往来之人的迎来送往。因此韩翃所作的送别诗亦多作颂扬和夸赞之语。如韩翃的《别李明府》，其诗云：

宠光五世腰青组，出入珠宫引箫鼓。醉舞雄王玳瑁床，娇嘶骏马珊瑚柱。
胡儿夹鼓越婢随，行捧玉盘尝荔枝。罗山道士请人送，林邑使臣调象骑。爱君一身游上国，阙下名公如旧识。万里初怀印绶归，湘江过尽岭花飞。五侯焦石烹江笋，千户沉香染客衣。别后想君难可见，苍梧云里空山县。汉苑芳菲入夏阑，待君障日蒲葵扇。（彭定求等编，1999：2723）

这是韩翃在送人离别时的应景之作。诗中句句词藻华丽，通篇皆是对李明府的夸赞之词。诗题中虽指明为别离之作，但诗中却并无离别之意，更无离别时的不舍和忧思，反而多了一些轻快明朗的味道。正如蒋寅先生所云之“这类应景之作……没有真切的感受……只能玩弄一些形式上的技巧，以外表的鲜丽来掩饰内容的贫乏苍白”（蒋寅，2007:221）。拨开诗人这些华美的藻饰之词，我们可以发现诗中内容空泛，并无诗人的真情实感，显得“淡乎寡味”（钟嵘，1994:24）。又其所作《送端州冯使君》，诗云：“白皙风流似有须，一门豪贵领苍梧。三峰亭暗橘边宿，八桂林香节下趋。玉树群儿争翠羽，金盘少妾拣明珠。怀君乐事不可见，鬃马翩翩新虎符”（彭定求等编，1999：2745）。诗中也满是铺锦列绣，内容之中却无丝毫作者感情地流露。在韩翃幕府中所作的送别诗中，这样流于形式

而内容空洞的还有不少。

如：

春草东江外，翩翩北路归。官齐魏公子，身逐谢玄晖。

（彭定求等编，1999：2735）

孤舟行远近，一路过湘东。官属张廷尉，身随杜幼公。

（彭定求等编，1999：2731）

又如：

上客佩双剑，东城喜再游。旧从张博望，新事郑长秋。

（彭定求等编，1999：2728）

东门送远客，车马正纷纷。旧识张京兆，新随刘领军。

（彭定求等编，1999：2734）

这些诗句对仗工整，形式精美，读之有行云流水般的顺畅之感。仔细观察却能发现诗中具有严重模式化的倾向，有些赞誉之词竟是直接套用而不加变化：如《送张丞归使幕》中的“独受主恩归，当朝似者稀”（彭定求等编，1999：2733）、《送刘评事赴广州使幕》中的“征南官属似君稀，才子当今刘孝威”（彭定求等编，1999：2743）、《送李舍人携家归江东覲省》中的“二十青官吏，成名似者稀”（彭定求等编，1999：2736）等。在这样“工整的形式下既无情感的热流，也无实质性的内涵”（蒋寅，2007:221）的诗句中，是韩翃在长久的“忆昨陪行乐，常时结献酬”（彭定求等编，1999：2747）的幕府饯酬生涯之中，所形成的一种习惯性的标准写作模式，即像是在幕府送别时已经准备好赠送礼物的盒子，

在临别时，再根据当时所送之人的身份和环境，将一些信手拈来的典故、人名和地名放入精美的礼盒中一样，虽然包装精美，却因违背了诗歌是诗人内心想象和激情语言的艺术表现（赫士列特，1961:61）而显得生趣全无，缺乏动人之处。因被送之人所担任官府职位的相同或是因姓氏才华的相同，就托古人比附，这种为“后人应酬活套做俑”（叶燮，1979:65）的“廉价的赞美”（蒋寅，2007:219）显得鄙陋不堪，以致被幕府中的后生幕僚“举目为恶诗”，正如胡震亨《唐音癸签》中所评之：“君平高华之句，几夺右丞之席，无奈其使事堆垛堪憎，见珍朝士以此，见侮后进亦如此”（胡震亨，1981:63）。可知韩翃这类应酬送别诗内容的单调乏味和情感的虚无空洞。

而作为亲自随军驰骋沙场的“关西将家子”李益，心中始终昂扬着建功扬名、捐躯报国的壮烈情怀。这种强烈的情怀毫无掩饰地体现在他的应酬送别诗中，李益在送人离别之时也多是勉励对方报国建功，而缺少了离别诗中应有的悲伤情怀。如李益在送人归幕时所作的《送辽阳使还军》一诗中，其诗云：

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城。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青山出塞断，
代地入云平。昔者匈奴战，多闻杀汉兵。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勉君
万里去，勿使虏尘惊。（李益，1985:7）

远行之人即将要离去，诗人有由眼前之“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的景物描写入手，连绵不断的悠悠绿草，生机盎然，表达了诗人心中乐观的精神。镜头有近处伸向远处，诗人极目远眺之时忆及“昔者匈奴战，多闻杀汉兵”的暴行。借助虚写，扩大诗的表现意境，升华思想内容，“勉君万里去，勿使虏尘惊”的勉励

劝慰之情也极其自然的表明自己的“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的心迹。此诗落笔而成，充满了诗人奋发高昂的精神。又如其所作的《送常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一诗中：

**凉王宫殿尽，芜没陇云西。今日闻君使，雄心逐鼓鼙。行当收汉垒，
直可取蒲泥。旧国无由到，烦君下马题。（李益，1985:60）**

诗中李益提笔便直写“凉王宫殿尽，芜没陇云西”的荒凉景象，曾经规模宏大，雄伟壮丽的凉王宫殿，被吐蕃毁灭殆尽，只剩下断垣残壁淹没在陇山萋萋的荒草之中。接着诗人诗笔宕开，不言离别的悲苦凄切之情，而是从大处着眼，充满豪情的激励友人说，若能“逐鼓鼙”，驰骋沙场，定然能收复失地，杀敌立功，间接的表达了诗人慷慨激扬的雄心壮志。纵使有客远赴“万里”之外的振武，其治所在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李益亦是不言离别之意，仍旧是充满了“骏马事轻车，军行万里沙。……别离俱报主，路极不为赊”（李益〈送客归振武〉，1985:129）的拳拳勉励之情。

二、以个人缘情而作的送别诗

此类送别诗是幕府诗人与亲朋好友离别睽违之时所作，相比于幕府中应酬交际的送别诗而言，更多流露的是诗人与友人之间的真实情感，抒发离别之时心中凄苦悲哀的情调和对友人离去时难以离舍的情感。这种离别诗中的情感真挚，浓郁动容。大历、贞元年间，内外忧患不绝如缕，外有吐蕃频频攻扰，烽火不息；内亦有节度藩镇叛乱，将士杀帅，接连不断；回纥在京师亦不断有寻衅滋事之举，

这短短的三十多年间是唐朝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期。人们因社会战乱，仕宦、迁谪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离别。离别，不仅是造成离别双方即将在实际地理距离上产生“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沈德潜选，1963:88）的空间距离感，而且让分别之人对再会之时遥遥无期所产生“十年相见少，一岁又还乡”（彭定求等编，1999:2986）的时间焦灼之感，更重要的是离别之后音信断绝所产生“虽有明月期，离心若千里”（彭定求等编，1999:3108）的心理距离感（松浦友久，1996:68）。这些因离别而产生的实在距离感，使得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充满了对离别的凄苦悲叹。上述这些悲苦的悲叹对于身处军幕府中的文人们来说，更是在幕府诗人直面动荡社会中的心灵映照，也是幕府诗人精神无所寄托的孤独感受，亦是文化无所归依的悲凉感受（万春、杨敏，1999:20—24）。

戎昱在幕府中沉郁下僚，怀才不遇，生活愁苦，使得戎昱在幕府中送别友人时亦不免充满了悲苦的不平之音，如《送苏参军》诗中云：

忆昨青襟醉里分，酒醒回首怆离群。舟移极浦城初掩，山东长江日早曛。客来有恨空思德，别后谁人更议文。常叹苏生官太屈，应缘才似鲍参军。

（戎昱，1982:37）

这首诗是戎昱进入卫伯玉幕府之后，在友人即将离去，诗人作诗以送的悲苦感受。昨日不舍，借酒浇愁；今日酒醒，怆然离群，送人离去。戎昱独自伫立江边，望着船随流水而渐渐远去，风动，船行，江城很快遮住了远去行船的身影，在落日的余光中就连那蜿蜒流转的长江也似被两岸的山体所束缚而动弹不得。戎昱心怀

着“忠臣思报国，更欲取关西”的壮志进入幕府，但是戎昱却并没有受到幕主卫伯玉的赏识，徒然在幕府之中过着“闲暇”的生活。因此在戎昱看来这被束缚的不仅仅是眼前的景色，更是自己被现实生活束缚的忧愁写照。“常叹苏生官太屈，应缘才似鲍参军”，这不仅仅是对苏参军之遇的感慨，更是对自己在现实遭遇之中不平的深沉慨叹。待及自己离开，对朋友之间情谊的真挚戎昱也借临行离别时所作的诗将其表达，如《别公安贾明府》，其诗云：

叶县门前江水深，浅于羁客报恩心。把君诗卷西归去，一度相思一度吟。

（戎昱，1982:47）

这是一首离别时的赠友别诗，语言虽然浅显，但却使人感觉到了诗人对朋友的真切情意。叶县门前，缓缓而逝的江水，深不可测，但却再深却也比不上羁客这份报恩的心情，此句颇有些盛唐时李白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1977:645）的意味。最后诗人则直抒心中情意，随身带着你的诗卷，在分别以后的时间里，每次思念之时就会吟诵你的诗篇，以此来想念身在远方的你。戎昱在此将本无迹可循的深厚情谊转化成了缠绵悱恻的“把君诗卷西归去，一度相思一度吟”，显得空灵清新，自然却又情真。又“山霭生朝雨，江烟作夕岚。松醪能醉客，慎勿滞湘潭”（戎昱〈送张秀才之长沙〉，1982:57）、“乡泪正堪落，与君又解携。相思万里道，春去夕阳西”（戎昱〈江上柳送人〉，1982:50）等诗句中，也饱含着戎昱对友人离去时浓浓不舍的感伤深情。

卢纶交游广阔，在幕中亦有不少知己好久。对幕中好友的离去，卢纶的诗中同样是充满了不舍的惆怅情意。如《送颜推官游银夏谒韩大夫》一诗，其云：

丛篁叫寒笛，满眼塞山青。才子尊前画，将军石上铭。猎声云外响，
战血雨中腥。苦乐从来事，因君一涕零。（卢纶，1989:499）

朋友即将远赴他方，临别时分，竹笛之声凄清悠扬，抬眼触目之处，皆是满山苍翠浓郁的树木。云天之外的战斗，雷鼓轰鸣，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的程度似乎已透过“战血雨中腥”真实而直观地再现了。细细品味，混在雨中的血腥气息似乎已经雨水的扩散而进入鼻腔，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深深的触动了诗人的心弦。传神的细节描写，这皆要得益于卢纶在幕府生活中的深刻体会，才子的运筹帷幄，将军的传世功勋都已带上了血腥的色彩和气味（蒋寅，2007:244）。离别的忧苦与欢愉本为人生平常之事，但今日自己与颜推官的离别，也许会是此生永远的分别，卢纶感到了战争年代离别容易却不知何时能再见的痛苦，“因君一涕零”的情感流露，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离去时无限惆怅的伤感心情。南朝时江淹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1994:165）！前路渺茫，至交好友的离去，难以释怀的离愁别绪，深深地萦绕在卢纶《送畅当》的诗中，其云：

四望无极路，千里流大河。秋风满离袂，唯老事唯多。

（卢纶，1989:94）

畅当，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宦宦世家之子。卢纶与畅当是多年的相交好友，卢纶和畅当在贞元年间同为浑瑊幕府中的僚属。在这次离别之前，卢纶在幕府中就曾收到同为大历十才子耿漳的寄书，卢纶得书之时，好友崔峒远贬潞州（今山

西长治)，司空曙贬谪长林(今湖北荆门西北)；苗发和李端相继卒于贞元元年(七八五年)和贞元二年(七八六年)秋，就连寄书之人耿漳也被贬至许州(河南许昌)，各自流落他乡，不禁悲痛深叹而作“鬓似衰蓬心似灰，惊悲相集老相催。故友九泉留语别，逐臣千里寄书来。”(卢纶《得耿漳司法书因叙长安故友零落兵部苗员外发秘省李校书端相次倾逝潞府崔功曹峒长林司空丞曙俱谪远方余以摇落之时对书增叹因呈河中郑仓曹畅参军昆季》，1989:183)一诗，并与当时同在幕府的畅当一起哀悼故友的零落，诗中的“衰鬓”、“心灰”皆是卢纶心中无声的悲恸，催裂肝肺。九泉之下的话别，千里之外的寄书，死别与生离正如曹植“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曹植，1984:32)之语，都是如此的让人伤痛不已。而此时又要再次活生生地面对畅当的离去，卢纶的心情可想而知。萧瑟的秋风渐起，茫然环顾，四野皆苍茫。离情悲凉，视线所及之处，亦是道路崎岖而无尽头，河流蜿蜒流走千里，一去不复返。在这“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曹丕，2009:11)的凄冷情境之中，畅当亦作《别卢纶》一诗赠与卢纶，其言“故交君独在，又欲与君离。我有新秋泪，非关宋玉悲”(彭定求等编，1999:3280)。诗中的悲伤情调在诗中一览无余。离别在即，萧瑟而落寞的景象，映衬着卢纶“离言虽欲烦，离思终无绪”(何逊，1980:15)的惆怅和萧索心境，千言万语都化作“唯老事唯多”这衰飒怨极的一语。“平生故交在，白首远相怜”(彭定求，1999:3325)的愁郁感情，真挚却沉痛，读来不禁令人歔歔感慨。

韩翃在这类送别的诗中充满了对人生的诸多感慨之意，用饱含深情的笔调写出了对悠悠往事地怀念。如《梁城赠一二同幕》，诗云：

五营河畔列放旗，吹角鸣笳日暮时。曾是信陵门下客，两回相吊不胜悲。

(彭定求, 1999: 2751)

诗中的“两回相吊”是指汴州幕的田神功和田神玉相继卒于大历九年和十一年之事。田神玉卒后，韩翃虽然继续留在汴州幕府任事，但韩翃对旧时幕主的相继逝去，感到了难以承受的悲痛之情。遥想昔日五营河畔旌旗飘扬；日暮时分角吹鼙鸣的悲壮之声，无一不唤起自己“曾是信陵门下客，两回相吊不胜悲”的伤感之情。

又如《赠别太常李博士兼寄两省旧游》，诗云：

两年戴武弁，趋侍明光殿。一朝簪惠文，客事信陵君。简异当朝执，
香非寓直熏。差肩何记室，携手李将军。玉铎初回酸枣馆，金钿正舞石榴
裙。忽惊万事随流水，不见双旌逐塞云。感旧抚心多寂寂，与君相遇头初
白。暂夸五首军中诗，还忆万年枝下客。昨日留欢今送归，空披秋水暎斜
晖。闲吟佳句对孤鹤，惆怅寒霜落叶稀。（彭定求，1999：2726）

此诗娓娓叙述，颇有些自述生平之意。从诗中“与君相遇头初白”之语可知，这是韩翃在其晚年的幕府生活中所作。据唐人孟棻所撰《本事诗》中所云，韩翃在李勉幕中时，韩翃已是迟暮之年，“韩邑邑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孟棻，1957：9）。在这郁郁不得志的落寞生活之中，唯有借着对往昔之日的追思与回忆，才能冲淡郁积心中的愁闷和空虚。昔日“两年戴武弁，趋侍明光殿。一朝簪惠文，客事信陵君。简异当朝执，香非寓直熏。差肩何记室，携手李将军”的畅意生活，对此时的韩翃而言已经是昨日黄花，“感旧抚心多寂寂”的孤独无依，让韩翃对好友“昨日留欢今送归”的离别充满了惆怅，“空披”、“斜晖”、“孤鹤”、“寒

霜”、“落叶稀”的景物描写弥漫着韩翃对友人离去时的凄切悲凉，表达了韩翃心中难以释怀的惆怅萧索之感。

李益在这类的幕府送别诗中也始终昂扬着其内心创业报国的情思，如其所作之《送柳判官赴振武》，诗云：

边庭汉仪重，旌甲事云中。虏地山川壮，单于鼓角雄。关寒塞榆落，月白胡天风。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李益，1985：66）

此诗虽为送别诗，但这首诗并不落于送别诗悲苦凄切的窠臼，却显得意气昂扬，情感慷慨悲壮，言语古朴真挚。振武，振武节度使的简称，其治所在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振武距离邠宁（今陕西彬县）路途遥远，为边塞防线上重要的军事重镇。“虏地”虽山河壮丽，但边地的战事异常的频繁，“关寒塞榆落，月白胡天风”的苦寒景象，在李益充满炙热情怀的心中，这些凄凉的景色并不是男儿建功之路的苦难和障碍，却反而使得李益激起了心中汹涌澎湃的奋发精神，“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的雄壮结语既是对好友驰骋沙场，立功边塞的殷切希望，也是对自己欲杀敌立功的豪情表达。

综观文人们在幕府的送别之作，可以知道诗是作诗之人对其自我性情的直接抒写。诗是艺术，是缘情而生，是情意和志向的表达，正如叶燮所说的“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叶燮，1979：52）。倘若违心而出，就会出现像在应酬送别诗中那样程序化的书写，不仅会在内容上显得空洞，也会在情感上显得空白无力。幕府的送别诗，因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场所的特殊性，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文人们虽然或多或少都会有

流于幕府的酬酢之作，但我们同样也看到了诗人在幕府中对友人们隽永深刻的真挚感情，同时这些幕府中的创作也为我们了解幕府中文人们的真实生活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第二节 思乡情怀之作

怀土思亲是中国文人心中亘古不变的吟咏主题，亦是人们永荡心中的不变情愫。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主，而安土重迁的思想也就深深的扎根在作为农业民族的古人观念之中，《汉书·元帝纪》就曾载：“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班固，1997:278）。但人生在世，焉能有不离开故土家乡。人们或因征戍徭役，或为求仕求学，或因战乱(灾荒)流离，或为迁徙移民，或为经商远行，亦或是因为现实的坎坷而导致的失意无着等离开家乡，这是造成人们在生活中产生乡思的六大外部原因，其中亦多有交叉重叠(王立，2003:371)。人们从生到死，虽“并不总是在外在的旅途上，但他总是在内在的旅途”（陶东风、徐莉萍，1993:149）上，因为人生的本质就是一场内在的生命之旅，人人皆是人生的游子。因此人人皆心怀乡土，亦如王粲所谓之“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王粲，1980：19）。自《诗经》伊始，就有久戍士卒对家乡“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程俊英、蒋见元撰，1991：202）的思念，亦有“我徂东山，惓惓不归”（程俊英、蒋见元撰，1991：421）的感慨，《楚辞》亦有离乡之后“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朱熹，2001:85）度日如年的痛苦和忧伤。降及汉魏之时，亦有远游他处，久久不能归乡的游子在日落西山之时抒发心中悲苦的“离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复。日暮途且远，游子悲

故乡”（逯钦立辑校，1983:344）的思乡情怀，对故乡思念至极而发出“远望可以当归”（沈德潜，1963:80）的凄凉与酸楚。思乡的愁苦绵延不断的在文人们的诗歌中回旋，亦时时激荡着远离家乡之人的心绪与情感。

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伴着滚滚红尘而来，关东之地和长安地区接连陷入叛军的铁蹄之下，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沦陷之地的人们被迫远离故土家园，四散逃亡，流寓他乡。动荡的社会和混乱的环境，使得文人们在他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备尝乱离和辗转流寓的苦辛。在这艰辛的生活中，人们离开家乡的时间越长，只要“遇见不顺心的事，就难免重忆起亲戚在旁的便利、故土昔日的种种温馨，油然而发乡思怀旧之忱。且遥远的故乡离开愈久，愈易为思乡主体所诗意化、理想化，成为不如意的眼前、失意的官场与境遇的一个对立的空存在”（王立，2003:371）。对于大历时期长久羁宦于幕府的文人们来讲，这种久不能归家，望而不能还乡的“惆怅不能归，孤帆没云久”（彭定求等编，1999:1541）的心情更是深沉凝重，戎昱《江城秋霁》一诗中即充分体现了这种沉痛的心情，诗云：

霁后江城风景凉，岂堪登眺只堪伤。远天蟠踞收残雨，映水鸬鹚近夕阳。万事无成空过日，十年多难不还乡。不知何处销兹恨，转觉愁随夜夜长。（戎昱，1982:42）

此诗作于戎昱进入卫伯玉幕中的第二年，也就是大历三年（七六八年），此时距离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七五五年）已经有十多年了，戎昱在这段时间在各地流寓却不能还家，虽终在幕府求得暂时的安身之地，但卫伯玉却并没有重用自己，徒然在幕中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心中空怀着满腔的抱负却无处施展，怀才不遇

的苦闷情绪也无法得到纾解。带着这样的惆怅心情登高远眺，难免对远在他处的故乡怀有深切的思念之情。秋日的江城，在雨过之后凉意渐浓，登高临眺，也只是“岂堪登眺只堪伤”而已。远天的螭螭和残雨、近水的鸬鹚和夕阳，这些落寞而清冷的意象增添了诗人对自己“万事无成空过日，十年多难不还乡”的凄楚思绪。诗人常年奔波，十年未曾回乡的凄然并没有随着夜的到来而转入黑暗了无痕迹，却随着黑夜的来临而愈加显得漫长。“如何异乡县，日复怀亲故”（彭定求等编，1999:1538）的思念怅惘之情，始终如鬼魅般紧缚着诗人敏感的内心，不得解脱。

庄子曾在《知北游》中云：“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胡文英，2011:163）阴阳四时秩序井然的变化运行而呈现各有独特的景色，春光的明媚、夏日的酷炎、秋风送爽和冬雪皑皑的景色本是令诗人不胜欢喜的催诗好材料，但这对于久居他乡仕宦之途暗淡的幕府诗人来讲，却只能增添诗人对故乡“怅望遥天外，乡愁满目生”（彭定求等编，1999:2621）的愁苦思念之情罢了。

春日经过严冬的沉寂，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美好时节，绿树抽芽、花儿含苞、鸟儿欢快的鸣叫，一切都是欣欣然而充满了活泼的生机。但是在幕府诗人的心中却少了“春心荡兮如波”的情怀，而多了几番“春愁乱兮如雪，兼万情之悲欢”（李白《愁阳春赋》，1977:20）的苦涩滋味，且看戎昱的《湖南春日二首》，其诗云：

自怜春日客长沙，江上无人转忆家。光景却添乡思苦，檐前数片落梅花。（其一）

三湘漂寓若流萍，万里湘乡隔洞庭。羁客春来心欲碎，东风莫遣柳条

青。（其二）

（戎昱，1982:45）

这首诗是戎昱在进入湖南崔瓘幕府之时所作。每次春来，对流寓他乡，漂泊在外的戎昱来说，总是体验伤春的时候。春日光景融融，面对这春光烂漫的景色，客居长沙的戎昱漫步湖南江边，却无人可与之相伴。江上空无，唯有那漫漫无边的江水。戎昱入幕之时的湖南幕府局势很不稳定，幕府之中暗流汹涌，时时都有兵变的可能。这样不安的环境和孤单寂寞的他乡生活，增添了戎昱对家乡的苦苦思念。屋檐下，那随风而落的不仅是梅花，对诗人来说也是自己悠悠的寂寞和深深的哀愁。戎昱在三湘之间流寓，就像那水中的流萍一样无依无靠。“湘乡”之间远隔万里，回家的路是如此的遥远，以致戎昱“羁客春来心欲碎”，唯有期盼“东风莫遣柳条青”。这饱含“欲碎”的思乡却不能回乡的无奈和绝望心情跃然于纸上。又如李益的《邠宁春日》：

桃李年年上国新，风沙日日塞垣人。伤心更见庭前柳，忽有千条欲占春。

（李益，1985:117）

此诗具有浓厚的伤春情怀。此诗作于邠宁张献甫幕中。其时，据李观所作之《邠宁庆三州节度飨军记》中所载：“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从朗宁之军，恶群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书，命观书之”（董浩等编，1983:5424）。可知性格清高耿直的李益，既不愿行向上司谄媚之事，也不屑与幕府中溜须拍马之人为伍，对于“群小”的谄媚的行为，李益也是深恶痛觉。由此可知李益在张献甫的

幕中也是难以得志的，这样的幕府环境使得李益的心中充满了悲苦。诗中运用对仗，形成强烈的对比，凸显诗人心中难以排解的苦闷。“上国”与“塞垣”皆是春回大地，但在诗人的眼中景色却是如此的不同。“上国”年年都是桃红李绿，春景宜人，但是“塞垣”之处却是日日风吹沙飞，苍茫凄凉。边塞的春日似只有在这独占春色的依依庭前垂柳之中才能感受那难得的春日气息。郁郁不得志的苦闷，远离故乡久戍他方的凄凉感伤情调于散落在诗句的字里行间，强烈的感官对比则显露出诗人思乡怀归的落寞心理。

羁旅异乡中的愁苦本就惆怅难当，若遇上一岁之中的秋时节则更会加深了诗人酸楚悲戚的心理感受。一岁之中，秋是最令人悲伤不已的季节，刘禹锡就曾有“自古逢秋悲寂寞”（彭定求等编，1999:4120）之语。秋，主肃杀。战国时期的宋玉就曾在《九辩》中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朱熹，2001:116）。宋代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则进一步对宋玉的秋之所悲的具体内容和涵义进行了说明，其云“秋者，一岁之运盛极而衰，肃杀寒凉，阴气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时……是以忠臣之士，遭馋放逐者，感事兴怀，由切悲叹也”（朱熹，2001:116）。现代学者吴经熊亦在著作《唐诗四季》中对秋所蕴藏的特色进行了新的诠释，其曰：“秋，有两个方面，一是无限的感伤，一是成熟的智慧”（转引自颜进雄，1996:300）。在幕府诗人的笔下，则更多的是表现其忧愁感伤的一面。秋的悲情角色配合着诗人繁复纷乱的思绪，将诗人的悲戚心情映衬的更加凄切哀婉，随时随地的景物变化都会牵动诗人对家乡的缕缕愁思而低吟不止。戎昱的《客堂秋夕》诗云：“隔窗萤影灭复流，北风微雨虚堂秋。虫声竟夜引乡泪，蟋蟀何自知人愁。四时不得一日乐，以此方悲客游恶。寂寂江城无所闻，梧桐叶上偏萧索”（戎昱，1982:14）。秋日，昏暗的客堂，流

萤复去又来，悠悠的北风夹杂着微微雨丝，诗人在这寂寂无闻的江城中怅惘凝神，强烈的思乡愁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泛起阵阵波澜。无人能解的凄凉与酸楚在心中肆意翻腾。墙角蟋蟀的声声鸣叫惹的诗人双眼含泪，不禁深深叹到“虫声竟引乡泪，蟋蟀何自知人愁。”愤懑与孤独在诗人的心中来回激荡，无处安放的心灵与灵魂深处的孤寂，更是化作了对久客在外而“四时不得一日乐，以此方悲客游恶”的厌倦之语。又如其所作之《秋月》（题一作《江城秋夜》），诗云：

江干入夜杵声秋，百尺疏桐挂斗牛。思苦自看明月苦，人愁不是月华愁。（戎昱，1982:35）

夜黑如墨，江边捣衣的杵声随着秋风一声一声的传来，传入了本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诗人耳中，这声声的杵声似乎并不满足于萦绕在诗人的耳边，甚至穿过耳朵，直达诗人那忧愁敏感的心脏。皎洁明月挂在天边，高高的稀疏桐树上挂着北斗星和牵牛星，凝望着这秋夜之中的明月，戎昱竟觉得那永恒不变的明月也有了涩涩的愁苦之味。可明月何曾有过喜怒哀乐，明月何曾又为他人伤心落泪，正如钱钟书所言，这一切只是因为“节物本‘好’而人‘自惆怅’，风景因心境而改观。”（钱钟书，2001:384）罢了。戎昱对自己的“思苦自看明月苦”的“境由心造”亦是有很清楚的认识，正如其在诗中自嘲的“人愁不是月华愁”的辛酸之语，这“明月苦”只是自己心绪愁苦而导致，并不是月亮真的愁苦。仕宦之路的坎坷不顺，内心深处孤寂的流浪感，对家乡的苦苦思念却始终不得归的情怀深深的埋在戎昱的心中，情移于景，情亦因景的烘托而极赋渲染的表现了诗人心中不可遏制的忧伤心境。

和戎昱有着相同远离家乡，久居幕府经历的李益而言，心中也是充满对家乡深沉的思念。“人生已如寄，在寄复为客”（李益《华阴东泉同张处士诣藏律师兼简县内同官因寄齐中书》，1985:25）的李益，在其诗集中亦有不少悲秋情怀的诗作，如《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中：

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此时秋月满关山，何处关山无曲。

鸿雁新从北地来，闻声一半却飞回。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

（李益，1985:107）

深夜月明，诗人独上西城。夜空之中月色凄清寒冷，远处黑色的群山连绵不断，冷飒的秋风徐徐吹着此时独上西楼的征人。呜咽的管声划破夜的清冷，梁州曲调随着秋风屡屡而出。清冷的夜色并没有随着管乐之声的飘荡而显得缓和，却像是亲人的丝丝呼唤，唤起了征人无尽的思乡之情。“关山”在此处一语双关，既表明此时诗人所处的环境，也借以《关山月》的曲调，将诗人的乡思衬托的更加浓郁凄凉，亦如《唐诗笺注》所评：“‘此时’二句，不言关山明月，听《凉州曲》之哀惨，乃偏说何处无此，则此时此际，同一悲凉，不言自喻矣”（转引自陈伯海，1995:1483）。第二首则以第一首诗的意境为基调，萧瑟的秋风之中，独戍百尺孤台的征人，将自己的情感托于在天空自由高飞的鸿雁，想必鸿雁能带将征人的思念带给远在家乡的亲人吧。可未曾想，这茫茫的关山，这秋夜的萧索，这乐声的悲切哀怨，使北地新来的鸿雁也不能承受这份凄凉酸楚的乡愁。正如清人黄叔灿谓：“‘鸿雁’二句，起得陡兀。‘闻声一半却飞回’，‘一半’二字，妙不可说，物犹如此，人何以堪”（转引自陈伯海，1995:1483）？“金河戍客”

欲断肠，这深沉悲凉的孤独与愁情在鸿雁“闻声一半”就调转飞回的动作下表现的淋漓尽致。情思绪，使诗人的孤独和乡思之情更加的突出，更加的委婉和深邃。

冬日，万物俱寂，“北风其喟，雨雪其霏”（程俊英、蒋见元撰，1991:113）的凌冽风雪，呼啸肆虐。在这霜雪漫天，冷雪酷寒的“寒叶风摇尽，空林鸟宿稀。”（彭定求等编，1999:7383）的日子里，望着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茫茫归乡之路，诗人心中对家乡的思念也愈发的凝重幽怨。如戎昱的《桂州腊夜》（题一作《冬夜怀归》），诗云：

坐到三更尽，归仍万里赊。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晓角分残漏，孤灯落碎花。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戎昱，1982:24）

除夕守岁，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年俗，亦是一家团聚，促膝而谈的美好时光。但现实中的戎昱却是在离家万里之外的桂州独自寂夜守岁，三更已尽，悠长的情思却未尽，“归仍万里赊”的心中愁绪，更是道出了诗人心中“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彭定求等编，1999:3067）的无尽悲愁。纵然倦极而眠，却睡的极不安稳，意识在似醒非醒中辗转反侧，这时窗外之雪飘落竹林，簌簌作响，异常清晰的传入耳中，“偏”字写出了诗人颇有些烦恼却又无可奈何的怨怼情绪。清醒，无眠。诗人在这寂静的夜中静静的躺在床上，直到号角吹响，才惊觉一夜竟已过去。青灯照壁，孤单而昏黄的油灯，唯有燃烧殆尽的“碎花”相伴。人灯相对的静默之态写出了诗人孤独寂寞的心声。“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的结语并未直接抒发诗人心中之情，但诗中所构的诗境和凄凉的基调，如凄清的雪落之声、那清冷的难继寒梦、悲凉的号角之音、寥寂的孤灯之烬，都为诗人表达心中的怅

惘思乡愁绪作下层层铺垫，无声渲染了诗人心中迫切凄然的思乡怀归之情，读来令人倍感诗人久客异乡的思念之苦。

李益久在军幕生活，作为和边疆士兵们一样的征人，李益对将士们的思乡感情也是深有感触，因此在他的笔下，对久戍将士们的思乡之情也写的颇为精彩。

《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1985:113）一诗中，诗人将远戍苦寒边塞征人心中共有而郁积的“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望月有感〉，1979:267）。凄怆的思乡怀亲心情，以凄苦哀怨的笔调渲染而出，词意俱足的将征人痛苦煎熬的内心刻画地栩栩如生。

《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云：

何地可潸然，阳城烽树边。今朝望乡客，不饮北流泉。

（李益，1985：95）

诗中直抒胸臆，以“潸然”、“望乡”之语正面直接点出征人强烈而愁苦的思乡之情。北流而去的潺潺泉水并没有带走征人心里的忧伤，反而加重了将士们离家北戍的凄凉与悲伤。诗中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描绘了征人心中难以抑制的悲怆思乡之情。

相较于戎昱和李益在幕府中的“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彭定求等编，1999:3310）的苦涩生活而言，卢纶却是幸福的。卢纶祖籍为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其后卢纶虽随节度使浑瑊从军河中，但河中的治所亦在今山西省永济蒲州镇，因此卢纶的幕府从军之地近傍桑梓，所以

在卢纶的幕府诗中没有深沉凄苦的思乡怀归之作。

韩翃的思乡之情是特别的，其中所蕴涵的情感与戎昱、李益浓烈的凄楚羁旅乡愁不同，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云淡风轻般的洒脱之姿。韩翃的《和高平朱参军思归作》，诗云：

髯参军，髯参军，身为北州吏，心寄东山云。坐见萋萋芳草绿，遥思
往日晴江曲。刺船频向剡中回，捧被曾过越人宿。花里莺啼白日高，春楼
把酒送车螯。狂歌好爱陶彭泽，佳句唯称谢法曹。平生乐事多如此，忍为
浮名隔千里。一雁南飞动客心，思归何待秋风起。

（彭定求等编，1999:2720）

此诗语调轻松自得，用词清丽，虽谓思归，但诗中归思之意颇淡。诗中首句“髯参军，髯参军，身为北州吏，心寄东山云”中淳朴真切的口语化呼喊，如述家常般的语言令人倍感亲切。诗中对景物的取舍也如诗人的心情般“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曾，1983:627）。满眼青青的萋萋芳草，在朱参军“心寄东山云”的情思下，也唤起了诗人对昔日往事的屡屡追思，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不是凄凉和悲苦，韩翃曾在送人之时就有人生“自有从军乐，何须怨解携”（彭定求等编，1999:2735）、“不以殊方远，仍论赏地偏”（彭定求等编，1999:2746）的洒脱之语，加之韩翃对“平生乐事多如此，忍为浮名隔千里”之理的深谙，因此诗人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鞭策和勉励，而甚少悲苦忧思之词。韩翃的心中仍然保存着盛唐士人那“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1977:1244）的乐观豪迈的气概，这与其他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士人们截然不同的。

第三节 人生喟叹之作

孔子曾在《论语·子罕篇》中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学勤主编，1999：119）！这是孔子感念人生时间如流水般消逝，一去不复返时的深沉慨叹。时间本是作为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而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具有“不间断性、瞬逝性和不可逆性”（李浩，1993：11—31）的特性。亚里士多德曾对时间的特性进行了详细的阐明，其言：“至于时间，虽然它是可分的，但它的一部分已不存在，另一些部分尚未存在，就是没有一个部分正存在着”（亚里士多德，1982：121）。其后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亦对其特性进行了更加形象地描述，即“要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是不可能之事”（罗宾森英，2007：102）。而作为个体生命承载者的人，其在世间“人寿几何？逝如朝霜”的存在也具有与时间相似的“时无重至，华不再阳”（逯钦立辑校，1983：651）的特性。陶东风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强烈地突出时间与个体生命存在联系的是战国时代的庄子，庄子对时间“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胡文英，2011：121）的思考，“充分地揭示了生命的时间性，使‘时间’成为生命哲学的概念而不只是物理学的概念”（陶东风，1992：79—90）。至此，人生的短暂，生命的有限性，在“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胡文英，2011：166）的揭示下，自古就成为文人们对“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沈德潜，1963：89）、“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沈德潜，1963：103）时光倏然而逝的感慨和悲叹。降及唐代社会，亦有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不同”（彭定求等编，1999:884）的伤感之语，即使是在唐朝最美好，综合国力最强的盛唐时期，文人们亦有对人生无常和时间易逝的“风月长相知，世人何倏忽”（李白〈拟古十二首〉，1977:1100）、“人生能几何，毕竟归无形”（王维〈哭殷遥〉，1997:234）和“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孟浩然〈岁暮归南山〉，2000:332）的悲叹之声，但这些“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李泽厚，1981：129）。这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伤，其实并没有经过生活的残酷考验和沉重的灾难，只是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唐圭璋，1965:1920）的迷惘之语而已。降至大历时期，社会在疾风骤雨的沧桑巨变后，动荡不安，唐代社会的政治基础也没有以前那么的稳固，矛盾亦交错并发。人们的青春在苦难的现实中悄然而逝，等到人们大梦初醒般的意识到“老去光阴速可惊”（唐圭璋，1965:122）的时候，幡然而悟也只剩下“重见太平身已老”（彭定求等编，1999:1557）的悲凉与凄然感触。

卢纶的青春年华在“逢世难”之时，就已经开始悄然的消逝。卢纶在大历年间客居长安之时就有《长安春望》：“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家在梦中何日到，春生江上几人还。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卢纶，1989:427）。诗中直言自己作为文儒之士在这“世乱尚武”的年代的艰难之感。兵戈阻截，有家不能还的凄怨苦楚，过早地消磨了诗人的年少壮志，却在心头浮上了年华早衰的感觉。大历十二年（七七三），卢纶因元载，王缙的牵累而拘系虢州，昭雪之后虽停官留俸，过着闲散无事的生活，但卢纶却因“兴还江海上，迹在是非端”的是非未明，而深有“独失耕农业，同思弟侄欢”（卢纶〈虢州逢侯钊同寻南观因赠别〉，1989:114）出仕为官的悔意。当时卢纶正值三十岁，在人生的而立之年却遭逢仕途的飞来横祸，沉重地打击直

接将卢纶投入了无边的愁海之中。后在与朋友相见、别离之时亦多是对此次事件的凝重愁苦之思：“相见翻惆怅”（卢纶〈虢州逢侯钊同寻南观因赠别〉，1989:114）、“祸近防难及，愁长事未分”（卢纶〈罪所送苗员外上都〉，1989:493）、“见少情难尽，愁深语自迟”（卢纶〈雪谤后逢李叔度〉，1989:366），这种不断自我强化式的愁绪，使得卢纶深觉“壮志随年尽，谋身意未安”（卢纶〈春日书情赠别司空曙〉，1989:322），更深层次的加重了诗人心中的衰老感。心态上的老态龙钟让卢纶在揽镜自照时亦有“览镜愁将老，扣心喜复惊”（卢纶〈雪谤后书事上皇甫大夫〉，1989:294）的人身苍老感。惶恐不安的心理，无法言语的痛苦和往事不堪回首的伤痕，深深的烙在了卢纶的心中，时间就在这忧伤惶恐之间快速的流走，这种对时间流逝的忧伤感觉亦伴随在卢纶的幕府生活之中。

卢纶在进入幕府之前经历了数次的落第，亦在宦海中沉浮过，看尽了世道的黑暗险恶，尝遍了世态的炎凉。进入幕府后的卢纶虽然受到幕府浑瑊的恩重礼遇，生活悠闲，与幕府友人的相处关系亦处理的很好。在这样颇为得意的环境中，卢纶的生活应该是很畅快舒心的，但其自身久治不愈的病痛始终是卢纶难以摆脱的折磨。其在幕府中时，有诗云：“蹇辞惭自寡，渴病老难痊。”（卢纶〈秋幕中夜独坐迟明因陪陈翊郎中晨谒上公因书即事兼呈同院诸公〉，1989:329），“渴病”者即消渴病，现代亦称为糖尿病。据熊烜艺粗略统计，卢纶所存诗中直接写到“病”字的就有20多处。其后又在自述回忆性长诗中又言“察命孤且贱，少为病所婴”（卢纶〈怀旧诗〉，1989:188），久病不愈，其造成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苦痛，更重要的是对卢纶精神的打击和心灵上的摧残。如其所作之《行药前轩呈董山人》，诗云：

不觉老将至，瘦来方自惊。朝昏多病色，起坐有劳声。膝暖苦肌痒，藏
虚唯耳鸣。桑公富灵术，一为保馀生。（卢纶，1989:341）

诗中对自己老来病相催的状况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抒写，刻画了一个“身与心俱病，容将力共衰”（白居易〈偶作寄朗之〉，1979:847）的老者形象。最后两句用带有颇为嘲戏的口吻道出“桑公富灵术，一为保馀生。”戏谑之语。诗中首句对“不觉老将至，瘦来方自惊”的惊恐感，其实质上也就是对人生时光倏然离去的强烈感受。

时间的消逝，在人身上所透露出的最直观的视觉效果就是头发颜色的改变，卢纶常用“白发”一词如“曲罢不相亲，深山头白人”（卢纶〈孤松吟酬浑赞善〉，1989:263）、“今日攀车复何者，辕门垂白一愚夫”（卢纶〈送崔邠拾遗〉，1989:71）、“尘容不在照，雪鬓那堪镊”（卢纶〈秋中野望寄舍弟绶兼令呈上西川尚书舅〉，1989:338）来表示对时间逝去的悲哀和忧伤感触。卢纶的《同李益伤秋》，诗云：“岁去人头白，秋来树叶黄。搔头向黄叶，与尔共悲伤”（卢纶，1989:202）。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黄、白两种色彩，树叶枯黄飘落坠地，人老头白零落他乡，极其相似的深刻对比，皆是卢纶对时间流走、生命凋落而无限悲伤的表述，亦有如恒温抚木而言“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余嘉锡，1983:114）的凄然感叹。卢纶对衰老的体验是如此的深刻以，致其在诗中毫不避讳的使用“老”和“衰”这样的字眼：

予悲方为老，君责一何空。（卢纶，1989:345）

蹇辞惭自寡，渴病老难痊。（卢纶，1989:329）

清冬和暖天，老钝昼多眠。 (卢纶，1989:325)
病老正相仍，忽逢张道陵。 (卢纶，1989:98)
衰蹇步难前，上山如上天。 (卢纶，1989:446)
捧君青松曲，自顾同衰木。 (卢纶，1989:263)
可怜歌酒夜，相对两衰翁。 (卢纶，1989:167)

这么深刻的体验不仅仅来自于生理上身体器官机能的下降，更重要是诗人心理上对岁月时日易逝的无力衰老之感。

戎昱有《桂州岁暮》诗，其云：“岁暮天涯客，寒窗欲晓时。君恩空自感，乡思梦先知。重谊人愁别，惊栖鹊恋枝。不堪楼上角，南向海风吹”（戎昱，1982:75）。诗中的“岁暮”一词，戎昱一词双关，既指一年将终之时，亦暗指诗人此时年岁老大。年岁老大，却仍旧在外四处漂泊流徙，成为了天涯流浪客。一个“寒”字，不仅实写出了身体的寒冷之感，也写出了永荡心中的悲凉之感。长期漂泊的身羁客处，无法解脱的生理与心理之苦，戎昱陷入了深深的“不堪楼上角，南向海风吹”痛苦之地。

从军入幕的文人们，长久的远离家乡和亲友而淹留于幕府，当心中壮志无法得到实现而沉寂于下僚之时，碌碌无为的在幕府中蹉跎岁月之时，忍受着孤独与寂寞，还要不时面对幕府这一环境所带来的烦恼和危险之时，生命的短促和岁月不待人的人生焦虑感与紧迫感，如影随形般的纠缠着诗人敏感的心灵，不断的侵蚀着他们脆弱的灵魂，而这种人生的焦虑感和紧迫感其实来自于人们心里对建立不朽的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丘明，1981:1088）。这对于从军幕府

的文人们来说，其实就是对“立功”而扬名的深层心理需要，也就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一种对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倾向，当这一需求无法满足之时，人就处于始终无法安静的状态。（亚伯拉罕·马斯洛，2007：29）李益《惜春伤同幕故人孟郎中兼呈去年看花友》，诗云：

畏老身全老，逢春解惜春。今年看花伴，已少去年人。

（李益，1985：89）

人生短促，流年似水，李益自嘲而言“畏老”，自己害怕老去而惴惴不安的思绪始终在心中挥之不去，但却仍旧抵挡不去逝去时光的力量而“身全老”，这即是李益在坎坷仕途中对功勋无法实现的心神不定的状态表现。对春天来临，本是应与好友在这花团锦簇，春意盎然的日子踏春游乐。但去年一同看花的好友却已不在身边，朋友的离散，纵有良辰美景，也再没有赏花惜春的逸兴了。这种具体的现实失落感相比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彭定求等编，1999：884）轻快的莫名惆怅伤感之语而言，情感的表达多了些沉重的基调。这“今年看花伴，已少去年人”的轻轻一语，使得诗人陷入了欲语还休的失意而感伤的愁绪之中，“语浅情真”地写出了诗人心中无限悲凉的色彩。同样是作于春天的伤时之作，但李益的《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却道出了诗人心中对人生老去，时光不再的惊惧之感，诗云：

绿杨着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

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

(李益, 1985:78)

饮马泉，在盐州（今陕西定边），春秋时期属戎狄之地，中唐之时，饮马泉是唐朝与吐蕃频繁争夺，发生战乱的边塞之地。诗人于春日随军而过饮马泉，此时的饮马泉景色明媚，绿草如茵，杨柳轻拂水面，呈现出春日特有的盎然景象。面对此等美景，诗人思绪翻腾，感慨颇多。此诗内涵丰富，亦如周启琦所谓之“此诗可谓探源昆仑，雄才浩气，更笼络千古”（转引自陈伯海，1995：1480）。既有对饮马泉今日旧时对比而生的感慨，亦有对边塞局势的紧张，防御并未巩固的忧虑，又有对边塞景物的刻写，这种将“何人倚剑”的叙事和“白云天”写景糅合在一起的两截锻句的新颖写法，使得诗中含义重重转折（黄永武，1976：48），亦如清沈德潜谓“‘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言备边无人，句特含蓄”（沈德潜，1979：483）。诗末两句由无边的思绪漫想转回对自身现实的审视，直抒诗人对年华逝去，容颜渐老却仍旧未能一酬壮志而忐忑不安的思想感情，正如《唐诗成法》所谓：“‘行人’即自己，容颜已衰，空有‘倚剑白云’之心，而日月逝矣，岁不与我”（转引自陈伯海，1995：1480）。李益借以“莫遣行人照容鬓”的畏老怕照镜之语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不胜伤感的沮丧心理。李益“从军十八载”的经历在其年过半百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心理上的负担，在饱尝了幕府从军的甘苦后，李益心中“横戈会取名”的精神支柱已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淡化，当李益心头爬上“衰飒一如此，清光难再复”（李益〈罢镜〉，1985:25）的衰老感觉之时，对人生时日无多却始终在幕府中滞留的忧患紧迫感使得李益的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悲伤。

李益的《答许五端公马上口号》，云：

晚逐旌旗俱白首，少游京洛共缁尘。不堪身外悲前事，强向杯中觅旧春。（李益，1985：109）

“许五端公”指许孟容，其生于天宝二年（七四三），入幕时年纪有五十了。诗人作此诗时，其年岁也近五十岁了。仕途蹭蹬的李益，虽有满腹才华，却始终坎坷不遇，虽踌躇满志却始终未能成就功名，徒让美好年华在军幕中蹉跎逝去而志业无成。“晚”“少”的时间跳跃而造成的今夕对比，强烈的表达出诗人心中对年华一去不返的悲怆心理，而“强”字则深沉的表达了诗人不胜其悲，唯有借杯中物来追逝昔日美好春光的无可奈何和苦涩的心情。《置酒行》也是李益以半百的年纪在刘济幕府时所作，诗云：

置酒命所欢，凭觞遂为戚。日往不再来，兹辰坐成昔。百龄非久长，五十将半百。胡为劳我形，已须还复白。西山鸾鹤群，矫矫烟雾翻。明霞发金丹，阴洞潜水碧。安得凌风羽，崦嵫驻灵魄。无然坐衰老，惭叹东陵柏。

（李益，1985:15）

明明是陈设酒宴而“命所欢”，但是李益却是在举杯之时就已心情凄然，“日往不再来，兹辰坐成昔”的往昔已逝，一去不返，即使是此时也即将流逝而成为过去的深刻体味，发鬓在转眼之间已变得苍白，生命的有限使得李益心中悲不自禁。如此悲伤乃至诗人将绝望的愁绪，转入对“金丹”之药和“崦嵫驻灵魄”生命长存的艳羡之中。壮志的消歇，无力改变的未来，李益对生命的逝去而功名难成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朱熹，2001:11）的感触，使得李益陷入

了“无然坐衰老”的颓败惆怅之中。

韩翃之《寄雍丘窦明府》，诗云：

少年结绶骋金羁，许下如看琼树枝。入里亲过朗陵伯，出门高视颍川儿。
西游太府东乘传，洒上诸侯谁不羨。时辈宁将白笔期，高流伫向丹青见。何
事翻飞不及群，虎班突骑来纷纷。吴江垂钓楚山醉，身寄沧波心白云。中岁
胡尘静如扫，一官又罢行将老。薛公荐士得君初，□领黄金千室馀。机尽独
亲沙上鸟，家贫唯向釜中鱼。□□□□□□□，□出重门烟树里。感物吟诗
对暮天，怀人倚杖临秋水。别离几日问前期，鸣雁亭边人去时。独坐不堪朝
与夕，高风萧索乱蝉悲。（彭定求编，1999：2733）

回首往事，年少之时“入里亲过朗陵伯，出门高视颍川儿”的春风得意，中岁之时，“虎班”纷纷、“胡尘”滚滚、“官罢”老去、薛公赏识、“机尽”、“家贫”的写照，韩翃在诗中道尽了自己人生之路的跌宕起伏。接连不断的人生打击和自我生命的沉沦，使得韩翃陷入了“独坐不堪朝与夕，高风萧索乱蝉悲”的凄楚沉痛。

小 结

幕府之地，远离家园。幕府的生活是残酷的，环境是无情的。文人的生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幕府诗人们在感情表达方面，都深深的思念着远在他方的家乡、对时局的变化和人生发出喟叹、对今日的离别和何日再相见的送别，发出委婉深切的悲叹。除上述外，更多的幕府诗是具备着诗人各自的特色。如李益，在他的心中始终昂扬着，身为“关西将家子”的奋进精神，因此在他的诗中更多的是体现他斗志昂扬、保家卫国的精神；而韩翃却不

断地在凶残嗜血，军乱频繁的武人军幕中辗转流落，过着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幕僚生活，为幕主撰写言不符实的章表，陪宴侍从。已年过中年，屡屡经历幕府变乱的韩翃，早年的豪气已在这些变乱中被消磨殆尽（蒋寅，2007:216）。心灰意懒的韩翃，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避祸保身、激流勇退。因此韩翃幕府诗作中，更多是对幕府应酬交际的描写。戎昱，远投边地幕府，环境险恶，时世混浊，沉沦的境遇让戎昱意气难振，举目四望，幕府之中难有意气相投之人。由此，戎昱在诗中表现出的是对家乡的极度向往与思念。卢纶，从军之幕就在其乡，与幕主及府中文人关系融洽，诗中少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更多的是对好友零落、逝去，和对年华已老的伤身悲时之感。

第五章 大历幕府诗的艺术特色

诗歌的创作，是缘于诗人当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生立场际遇的不同，以文字婉转细微的变化，将作用于心的感受所引起的思绪变化和情感体验，用凝炼精要的字、句，将充沛于心中的意趣表达出来。《诗经正义》中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亨，1999：6）。作为诗人内心的情感体现——诗，相同的诗歌，由于不同鉴赏者的遭际、感触、对诗歌地接受和领悟的不同，亦会有不一样地解读。正如董仲舒所云：“《诗》无达诂”（董仲舒，1975:106）。即指《诗经》的诠释会因人的不同而各有所得。其后的诗学评论家则将董仲舒评论《诗经》的方法扩大泛指，清人谭献《复堂词话》云：“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1959：19）皆有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论方法，现代学者陈良运更是将这种评论方法具体形象化，谓：“董仲舒首先提出‘《诗》无达诂’，本是一个很通达的接受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说，形象大于思想，蕴含于形象或意象中的思想意义，接受者因对象或意象体认、感受不同，可以作出各自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陈良运，1998：48）。笔者今尝试以诗歌的语言表达、诗歌的情景呈现、诗歌的审美意识来阐释大历幕府诗的艺术特色。

第一节 诗歌的语言表达

一、简洁凝练的白描写实

白描，本来是作为中国绘画中的一种展现方式，一般要求以笔墨线条的粗细，

而不假色彩的修饰与背景的渲染烘托，来勾勒出所绘物体的情态。诗歌与绘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袁行霈，1996:95）的诗画关系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宋代文人苏轼就有“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王文浩，1982:2630）之说。张禹民亦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1993：9670）。诗画之间的相互感应和互相渗透，使得绘画中的白描技法也被文学创作所借鉴，而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其特征是以“写实的描写逼真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形神”（蒋寅，2009:184）。这即是要求诗人用简洁凝练、真实可感、不加修饰的笔墨，描绘出形神兼备的鲜明形象。如鲁迅所谓之：“‘白描’没有秘诀。若要说有，也不过是合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撰，1973:212）。大历时期的幕府诗人们，对幕府之中的生活有着敏锐细腻感受。诗人们在日常细致入微的观察中，也深刻地体味着幕府之地真实而富有情趣的风土人情和生活场景。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和自然风物，皆被诗人以简洁凝练的白描手法所刻画，勾勒出一幅幅生动传神的艺术画面。

如卢纶的《赠李果毅》一诗中，诗人即以精准简练的白描语言，细腻传神地刻画出了一位将军勇猛果敢的形象，诗云：

向日磨金镞，当风着锦衣。上城邀贼语，走马截雕飞。（卢纶，1989:322）

这首诗从将军上阵杀敌前的准备片段描写着手，选取和捕捉其中最富表现力的场景，全诗在“磨”、“着”、“邀”、“截”四个动词的接连跳转下，意象连续不断的转换呈现，一气呵成。对仗工整的首尾两联，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字，

但已使全诗真实传神地再现了果毅将军的英勇气概。

而李益的《度破讷沙二首》其一，则是李益在行军征战的途中，对北方边幕生活的真实描摹：

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李益，1985:100）

此诗是李益以白描的手法直写自己在行军途中所遇到的一场沙尘暴。首句中的“风来”和“旋移”两词精准的抓住了西北边幕风沙的特点。狂风四起，黄沙漫天飞扬，遮天蔽日，凌厉的气势不禁让人为之侧目。在这广袤无边的黄沙中，气候条件如此恶劣，以致诗人不由的感慨到“经年不省草生时”。可念头未完，诗人就笔调突转自道“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此诗即兴寄情，既写出了北方天气的恶劣与征战行军的艰难，又以景传情地表达了诗人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奋发精神。

李益的《暖川》一诗，也是诗人以简洁凝练的白描手法，将冬季征行塞外之时的所见所感进行刻画，诗云：

胡风冻合鹑鹑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李益，1985:108）

首联的“胡风冻合鹑鹑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写边塞的冬日，寒风凛冽，冰雪满地，鹑鹑泉水冰封，成群结队的牧马也因寒冷而“逐暖川”，一幅独具边塞游牧

民族特色的生活画面，被诗人以精炼传神的笔触勾画而出。游牧民族年年逐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在诗人看来，却是与将士们“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的悲苦戍边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共通性，诗人以在尾联“无尽日”和“年年”两个表示时间的词，凝练含蓄地写出了边塞将士们征战行军的遥遥无期之感。诗人通过对生活中自然景物地描写，以简洁婉转的语言凸显边塞征戍之地的苦寒和戍边将士生活的艰苦，寓深于浅地透射出边塞征人久戍难归的不尽凄苦之情。

戎昱的《宿桂州江亭呈康端公》，诗云：

**独向东亭坐，三更待月开。萤光入竹去，水影过江来。露滴千家静，
年流一叶催。龙钟万里客，正合故人哀。（戎昱，1982：76）**

中唐时期的桂州，是广西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也是唐代文人眼中的蛮荒偏鄙之所，因此罕有中原文人的踪迹。首联以“独向东亭坐，三更待月开”之语，写出了诗人在深夜“三更”之时，独坐江亭，“待月开”的寂寞生活。幽幽月光，萤火微茫，向着幽暗的竹林飞去无踪；静谧的夜里，唯一可见的，仅有那对岸映水的影子。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只有夜露滴落发出细小的声响，其声虽微，却声声入心，滴滴入愁，这种以“动”衬“静”的效果，更加突出了诗人在桂州幕府时生活的孤寂与凄凉。幽静的时空，渺小的事物，与诗人自身沧桑悲凉的人生经历相契合，给离家万里、潦倒落魄的诗人带来了“年流一叶催”的忧时伤老之感。全诗通过细致入微地体察，以浅显写实的白描语言，真切地传达出诗人内心之中无尽的苍凉感受。大历幕府诗中这种以白描语言所作的诗歌还有不少，如：

卢纶所作之：“大漠山沈雪，长城草发花”（《送刘判官赴丰州》）、“鸛

鹤相呼绿野宽，鼎臣闲倚玉栏干。洪河拥沫流仍急，苍岭和云色更寒。”（《春日喜雨奉和马侍中宴白楼》）、“潭心乱雪卷，岩腹繁珠落。”（《奉陪侍中游石笋溪十二韵》）；

戎昱所作之：“远天蟠螭收残雨，映水鸬鹚近夕阳。”（《江城秋霁》）、“舟移极浦城初掩，山束长江日早曛。”（《送苏参军》）；

李益所作之：“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回军行》）、“边头射雕将，走马出军中。远见平原上，翻身向暮云。”（《观骑射》）、“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塞下曲四首》其一）；

韩翃所作之：“花里莺啼白日高，春楼把酒送车螯。”（《和高平朱参军思归作》）、“池畔花深斗鸭栏，桥边雨洗藏鸦柳。”（《送客还江东》）“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宿石邑山中》）等等，皆是大历幕府诗人以“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王克让，2006:66）的白描手法，简洁凝练地勾勒刻画幕府环境中那些生动传神而意趣盎然的形象。

二、意蕴丰富的典故运用

中国的古典诗歌，短小精干，字数有限。诗人们要在有限的字数内表达和抒发情志，诗人除了运用简洁凝练的白描写实手法之外，往往还要在诗歌中引入意蕴丰富的典故，借以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和思绪。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所云之：“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也”（刘勰，1968：614）典故一般指诗文中引用古代故事和前人用过的，有出处和来历的词语（范之麟、吴庚舜，1989:2）。典故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意蕴和深广的内涵。典故运用的妙处，恰如黄永武所谓之“凡据事类义，来增加风趣的气氛；或援古证今，

来影射难言之事；或摭取鸿采，来造成文章典雅的风格、审美的字面”（黄永武，1986，82-83）。因此，在诗作中引用典故，不仅可以使诗歌的语句对仗工整，结构严谨，而且还能增强诗歌语言的表现力，以达到深化诗歌主旨的艺术感染力。大历幕府诗人们所留存的幕府诗歌中也有大量的典故应用，切情、切事、切人地表达诗人此时的心情和想法。

李益《塞下曲》之诗，其云：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李益，1985:135）

诗中首句“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即化用东汉时期马列和班超的典故。“伏波”者，马列也，其少有大志，光武帝时，历官陇西太守、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六十二岁尚自请出征。《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载：“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儿。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范晔，1965：841）。次句接着用典，“定远”指班超。班超于明帝时出使西域，在外三十一年，恢复了西域对汉的内属关系，充任首任西域都护，被封为定远侯。其后曾上疏请返。《后汉书·班梁列传》载其言：“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范晔，1965:1583）。简练紧凑的笔墨，对仗工整的结构，皆淋漓酣畅的表现了诗人愿为保家卫国而甘愿战死疆场的豪迈气魄。诗末两句接着援引“只轮归海窟”和“一箭定天山”的两个典故，直接表达了诗人欲对来犯之敌全部歼灭的自信和奋勇进取的心情。“只轮”语出《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与姜戎败秦于殽，……晋人与姜戎

要之殲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者”（梅桐生，1998:220—221）。“一箭定天山”则出《旧唐书·薛仁贵传》，唐高宗时，薛仁贵领兵出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当时九姓突厥有十余万人，派数人来唐军前挑战，只见“（薛）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刘昫，1975:2781）。此后，突厥再不敢为患边塞。全诗共四句，句句用典，典直抒诗人心中激越昂扬的感情。诗人将自己的情感，以极其凝炼笔端熔铸于四个典故的内涵之中，自然贴切而无矫造之感。诗中典故地运用，不仅生动地抒发了作者渴望建功的爱国情感，而且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使全诗呈现出一种雄浑豁达的意境之美。

卢纶所作之《九日奉陪侍中宴白楼》，诗云：

露白菊氛氲，西楼盛袞文。玉筵秋令节，金钺汉元勋。说剑风生座，
抽琴鹤绕云。謏儒无以答，愿得备前军。（卢纶，1989:387）

露水凝结，菊花烂漫，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卢纶在秋高气爽之日陪侍登上白楼，与文人们饮酒作文。诗人在诗中活用“说剑”和“抽琴”的典故，“说剑”的典故出自《越绝书》卷一一（袁康、吴平辑录，1996:220），其中云薛烛其人，曾在越王面前列举“纯钩”等剑的形状及其优点。“抽琴”则由师旷奏琴，鹤为之舞化出。此处典故的引用，体现出了幕主与幕僚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表现了幕府众人在宴席之中饮酒论剑，奏琴起舞的热闹景象。

韩翃《田仓曹东亭夏夜饮得春字》云：

薛公门下人，公子又相亲。玉佩迎初夜，金壶醉老春。葛衣香有露，罗

幕静无尘。更羨风流外，文章是一秦。（彭定求等编，1999：2733）

此诗是韩翃在田神功幕，与田神功之子夏夜对饮时所作。诗中首开即用“薛公”典故，该典故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溢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司马迁，1959:2353）。此处以孟尝君田文和其父薛公田婴，比拟田仓曹和他的父亲田神功，而自比薛公门下客，表达了诗人对受到田氏父子的以礼相待。夏夜，饮酒赋诗，葛衣有香，丝罗帐幕静而不染尘埃。韩翃引用“一秦”典故，《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载：“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陈王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司马迁，1959:2576）。后人常借指同原有强者不相上下的另一强者。韩翃在此处活用“一秦”的典故，来赞誉田仓曹不仅风雅潇洒引人注目，而且还以文章见长。

韩翃之《送赵评事赴洪州使幕》，诗云：

孤舟行远近，一路过湘东。官属张廷尉，身随杜幼公。山河映湘竹，水驿带青枫。万里思君处，秋江夜雨中。（彭定求等编，1999：2731）

此诗是诗人在幕府之中为人送行时所作的送别诗。一叶孤舟，随水而行。山河苍劲，翠竹倒映，枫树苍翠，诗人以景为衬。接着诗人以“张廷尉”¹⁴点明赵评事为司法官员。再以“杜幼公”¹⁵喻指赵评事此时外出任官。诗人在诗中以“张廷

¹⁴《史记》卷一二二《张汤传》：“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得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张汤为廷尉……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后因此用作咏高级司法官员的典故。

¹⁵《汉书》卷六十《杜周传》附《杜延年传》：“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以

尉”和“杜幼公”的典故，言简意赅地言明了被送人的身份和官属。

大历幕府诗人们久居幕府，对幕府中的人、物、事皆有着深刻地体会与感悟。诗人们的情感与想法皆通过典故的运用得到淋漓地表达。大历幕府诗人的幕府诗中，以典切情的有：卢纶的“欲验少君方，还吟大隐作”（《奉陪侍中游石笋溪十二韵》），则以“大隐”之典，来说石笋溪有山林幽隐之趣。“机尽独亲沙上鸟，家贫唯向釜中鱼”（韩翃《寄雍丘窦明府》），韩翃在诗中以范冉之事，含蓄的表达自己的生计艰难。李益之“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诗中以“麟阁”的典故，感叹朝廷忽视对战将功勋的评赏。“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塞下曲》其四），诗中则用窦宪之事表现了出塞将士们克敌立功的信念。

大历幕府诗中还有大量的以典切人、切事的典故运用：如“八龙三虎俨成行，琼树花开鹤翼张。”（卢纶《酬赵少尹戏示诸侄元阳等因以见赠》）、“南郭群儒从，东床两客居。”（卢纶《酬陈翊郎中冬至携柳郎窦郎归河中旧居见寄》）、“李陵甘此没，惆怅汉公卿。”（卢纶《从军行》）、“鹤发逢新镜，龙门跃旧鳞。”（卢纶《寄赠库部王郎中》）、“便因当五夜，敢望竹林期。”（卢纶《奉和户曹叔夏夜寓直寄呈同曹诸公并见示》）、“非熊之兆庆无极，愿纪雄名传百蛮。”（卢纶《腊日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上客钟大理，主人陶武威。”（韩翃《送卢大理赵侍御祭东岳兼寄孟兖州》）、“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韩翃《送郢州郎使君》）、“鲁公秋赛毕，晓日回高驾。”（韩翃《祭岳回重赠孟都督》）、“两年戴武弁，趋侍明光殿。”（韩翃《赠别太常李博士兼寄两省旧游》）、“君到新林江口泊，吟诗应赏谢玄晖。”（韩翃《送客还江东》）；

延年三公子，吏材有余，补军司空。……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首发大奸，有忠节，由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徙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凤中，征入为御史大夫。”

“谁问南飞长绕树，官微同在谢公们。”（李益《奉酬崔员外副史携琴宿使院见示》）、“却将悲与病，来对朗陵翁”（李益《赠内兄卢纶》）“年发已从书剑老，戎衣更逐霍将军。”（李益《上黄堆烽》）、“蔡琰没去造胡笳，苏武归来持汉节。”（《塞下曲》其三）、“晚逐旌旗俱白首，少游京洛共缁尘”（《答许五端公马上口号》）等等。

典故的运用，既可以令诗歌的表达含蓄委婉，使诗人难以言说的情感和思绪得到表现，也使得诗歌具有微言大义和令人浮想联翩的作用。

第二节 诗歌的情景呈现

唐代孔颖达言：“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毛亨，1999：6）。诗，是对诗人内心情感与意志的书写与呈现。人心的情感复杂多样，当受到外在景物的刺激，产生感应，便将内心情感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而表达出来。景物的作用，则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刘勰，1968:693）

是触动诗人深沉情感的媒介物，也是开启诗人心灵大门的钥匙。恰如谢榛所云之：

“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谢榛，1983:1180）。自然山水，花鸟虫鱼，沙柳风月皆因诗人的情感变化而翻飞出动人的色彩。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言：“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亦是因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1998:1）。这是因为诗人在对景物聚精会神进行审美

观赏的时候，将自我内心的情感投射到景物之上，如李白：“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李白〈劳劳亭〉，1977:1150）、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1988:128）和“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杜甫〈江亭〉，1988:348）、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二首〉，2008:619）等等，皆使得景物呈现出人类所特有的生命形式和情感体验。

一、情景正衬之景悲情悲

李益的《听晓角》描写幕府征人眼中的边塞景物，透露出诗人心中苍凉的乡思之愁：

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

（李益，1985:106）

首句“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的景物描写，为全诗垫下诗人心中凄然的情感色调。深秋的边关，清晨的景色因“昨夜”的严寒而呈现出其不一样的色彩。银霜满地，榆树叶飘散凋落，一片衰飒清冷的景色。诗人登楼，独自伫立，孤独而浑厚的号角声回荡在这寒冷的清晨，显得悲凉而哀怨，声声号角呜咽，撩拨着诗人久未归家的心弦，也牵出了诗人心中屡屡的愁思。苍茫的高空，鸿雁南飞，流连徘徊，诗人的思绪亦随着高飞的鸿雁驰骋游远。诗末二句所蕴藉的情感，《诗境浅说》中云其：“或谓无限塞鸿，闻角声悲奏，回翅南飞，声音之感物，如六马仰秣，游鱼出听也。或谓地处极边，更北则为小单于之境，塞鸿避其严寒，至此不能飞度，唯有呜咽角声，随秋风远送，吹入单于。此两层之意，皆极言边

地荒寒，而征人闻角生悲，不言而喻矣”（俞陛云，2008：173）。此诗没有直接的抒写戍边人的乡思情感，而是将思乡的悲凉情感投射在号角声和鸿雁之上，恰如《唐诗别裁集》卷二〇所云：“塞鸿闻角声，尚不能飞度，况《小单于》吹入征人耳乎”（沈德潜，1979：666）。使号角之声与鸿雁飞不度的行为皆染上与人们相同的悲情色彩。

李益的《回军行》：“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李益，1985：116）。榆林关处，满眼的榆树皆枝叶枯黄稀疏；日暮时分，旷远苍茫的沙漠和天空的朵朵白云，皆因落日而染成了昏黄的颜色；荒野的战场，战争的厮杀之地，将士们的战死之所，满目萧然的悲情景象与诗人心中凄凉悲怆的情感，交织融会在一起，形成了浓重阴沉的压抑气氛，无不透露出诗人心中无尽的悲苦之情。尾联更是以“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的沉痛话语，深切地表达了对为国捐躯战士们，深沉悲痛的哀悼心情。

同样，戎昱在流落于蛮荒之地——桂州，其所作之《桂州早秋》，亦弥漫着诗人凄凉悲伤的情感：

**远客惊秋早，江天夜露新。满庭惟有月，空馆更何人。卜命知身贱，
伤寒舞剑频。猿啼曾下泪，可是为忧贫。（戎昱，1982：75）**

诗一开语即开宗明义直言自己为去乡离家的远客，漂泊异乡的惆怅哀伤之情溢于言表。桂州之地，唐时蛮荒之所，早秋来临，江河、天空、甚至是夜晚都已露出新的景象，而诗人则仍旧是孤单独处穷荒之所，颈联接着以“满庭惟有月，空馆更何人。”的孤寂画面，显示了作者此时落寞悲凉的无尽酸楚。“惊秋”、孤月、

无人的“空馆”等凄凉的景物描写，与诗人心中“身贱”、“下泪”、“忧贫”之思的悲伤情感融为一体，呈现出诗人内心无穷的悲愁之思。

卢纶的《秋中野望寄舍弟绶兼令呈上西川尚书舅》云：

忧来思远望，高处殊非惬。夜露湿苍山，秋陂满黄叶。人随雁迢递，
栈与云重叠。骨肉暂分离，形神遂疲沓。红旗渭阳骑，几日劳登涉。蜀道
蒿松筠，巴江盛舟楫。小生即何限，简诲偏盈箧。旧恨尚填膺，新悲复萦
睫。因求种瓜利，自喜归耕捷。井白赖依邻，儿童亦胜汲。尘容不在照，
雪鬓那堪镊。唯有餐霞心，知夫与天接。（卢纶，1989:338）

唐德宗贞元元年（七八五年），卢纶生活困顿，仕途蹇堵而入河中浑瑊军幕，在其入幕期间，卢纶之弟卢绶和其舅韦皋又西入蜀地，各自散落他乡。卢纶在秋日野望所见的景是：“夜露湿苍山，秋陂满黄叶”、“人随雁迢递，栈与云重叠”，而心中的情是“骨肉暂分离，形神遂疲沓”、“旧恨尚填膺，新悲复萦睫”，眼中的景与心中的情皆为悲苦的色调。满目衰飒荒凉的景象与诗人内心茫茫的愁绪，交错缠绕，情景交融，使物我皆成为了诗人哀愁的呈现者。“旧恨”未消，“新悲”又起，音信难通的离别所引起的双重悲感，使诗人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尘容不在照，雪鬓那堪镊”的浓浓愁苦之思。

韩翃的《送长史李少府入蜀》云：

行行独出故关迟，南望千山无尽期。见舞巴童应暂笑，闻歌蜀道又堪悲。
孤城晚闭清江上，匹马寒嘶白露时。别后此心君自见，山中何事不相思。

(彭定求等编, 1999:2744)

江淹<恨赋>中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诗中首句的“行行独出故关迟”则将诗人心中难舍的离愁别绪，表达的淋漓尽致。金圣叹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中评之曰：“故关曰‘关’，妙。出故关曰‘独出故关’，妙。独出故关，又加一‘迟’字，妙。独出故关迟，又加‘行行’，妙。行行者，言其行步可数，此是迟字之真正神理也”（金圣叹，1999:114）。人生聚散的离别之苦，“孤城晚闭”的寂寞和“匹马寒嘶”的孤独，悲笑皆泪落不止的情景描写，将诗人不可收拾的离散之苦映衬得分外沉重，使诗人陷入了“别后此心君自见，山中何事不相思”的伤感情绪之中，清人乔亿谓该诗为“君平七律最佳者，为其锻炼无迹，而气韵犹存也”（乔亿，2008:238）。

二、情景反衬之情悲景喜

李益的《夜宴观石将军舞》云：

微月东南上戍楼，琵琶起舞锦缠头。更闻横笛关山远，白草胡沙西塞秋。（李益，1985:118）

李益在诗中写出了唐代边塞之地夜晚的热闹景象：“微月东南上戍楼，琵琶起舞锦缠头”，新月初升，将军月下设宴，酒酣欢浓，将军和众人在琵琶的悠扬声中翩翩起舞。然而李益却是“更闻横笛关山远”，笛声悠扬，凄凉哀怨，一个“远”字仍写不尽诗人心中无边的愁绪。“白草胡沙西塞秋”则以边塞之地入眼的秋色，如衰飒“白草”和迷茫“胡沙”，来映衬李益心中的悲凉忧愁。溶溶月色下的将

军夜舞，本是一场引起人欢乐的场景，但诗人却以乐景写哀情，鲜明的对比写照，使人倍感诗人心中情感的悲伤。用“微月”、“起舞”来烘托和渲染愁情思绪，使诗人的孤独愁思更加的突出和委婉，也更加的深邃。

卢纶《九日奉陪侍中宴后亭》云：

**玉壶倾菊酒，一顾得淹留。彩笔征枚叟，花筵舞莫愁。管弦能驻景，
松桂不停秋。为谢蓬蒿辈，如何霜霰稠。（卢纶，1989:389）**

这是诗人卢纶在陪游幕主游宴后亭时而作。后亭宴游间，“玉壶倾菊酒”、“花筵舞莫愁”、“管弦能驻景”，本是快乐赏心之事，但卢纶却是以尝尽坎坷、残破凋零的心态进入浑瑊的幕府，在幕中虽然得到浑瑊的重视，但是其入幕前惊惧颤栗的经历，使卢纶心神俱碎，白发苍苍。“松桂不停秋”，借松、桂之树的经秋不落而喻幕主浑瑊年老却无白发，而自己则是“霜霰”色白，满头尽为苍苍白发。宴会中，玉壶倾酒的觥筹交错，花筵之间的翩翩起舞，管弦之声的悦耳动听，本因欢乐的场景却唤起了诗人心中凄凉黯然的愁绪，牵动着诗人心中的情绪，全诗极力描绘的欢乐场景，却在诗末的“如何霜霰稠”中转入悲凉，情悲景喜的情景反衬方式，表现出诗人心中难掩的怅惘与凄然之感。

韩翃在送别友人郎士元时所作的《送鄂州郎使君》中也描绘了友人到任所之时“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的热闹场景，“暮雪楚山冷，春江汉水清。红鲜供客饭，翠竹引舟行”，诗中的雪白、江清、“红鲜”、“翠竹”，色彩斑斓的景色给人以灵动情悦的审美观照，但是末联的“一别何时见，相思芳草生”，却将“景喜”的描写转入对“情悲”的抒发，愈发地突显出诗人情感的孤寂与凄凉。

第三节 诗歌的审美风格

语言作为诗歌审美意识的呈现方式，其局部、细微的变化都可使人感觉到诗人创作时的情感态度。大历幕府诗中的审美意识主要以雄壮浑厚、清新隽丽、苍凉悲慨、蕴藉含蓄为主，笔者现论述如下：

一、雄壮浑厚

辽远壮阔的天地山川，绵亘数千年的古往今来，并行不悖地充沛于无限苍茫的宇宙之中，开阔的意境以诗人心中磅礴壮阔的气势来抒写，呈现出诗歌雄壮而浑厚的语言风格。司空图所云之：“大用外腴，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司空图，1988：61）。即是此种浑厚雄壮风格的内涵所在。诗人在诗歌中注入的浩荡气概和广博胸襟大有浪高吞云，“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唐圭璋编〈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1965：2304）的气魄，亦有“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李白〈公无渡河〉，1977：160）的豪情，展现了诗歌中风驰电掣和飞扬纵横的壮美风格。

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云：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1985：124）

这是李益集中格调高昂，气象雄浑浩大的代表之作。《越缦堂书简端记》毫无谦

词，直用“高格、高韵、高调”的“三高”之语盛赞此诗，谓此首诗即是“司空侍郎所谓‘反虚入浑’者”（转引自陈伯海，1995：1486）。此诗不仅在后世的诗评家中有着很高的口碑，如清人范大士谓此诗“如空谷流泉，调高响逸”（转引自陈伯海，1995：1486），而且这首诗在当时就已经广为流传，据《旧唐书·李益传》中就曾载：“‘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刘昉，1975：3771）。直到现在仍然是被人们所称颂不已，朗朗上口的诗篇。

诗人寂夜独上受降城，诗首二句即“以对句写之，弥见雄厚”（俞陛云，2008：172）。举目远眺，却只见一轮孤独的明月和被皎洁的月光所映照的无垠沙漠。夜晚的月下景物十分简单，但其内涵却蕴藉宛转，情韵深远。将这孤塞城楼的寂静和月色的凄凉气氛突出得更加显明。幽静的时空中，峰前沙漠明似白雪，城外月色冷如秋霜，凄冷的意象正似诗人悲凉的心境，显得格外地孤独和寂寞。置身于远离故乡的荒凉边幕，在这凄清的景色中，诗人登楼望月，心中涌上阵阵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荒沙万里，万籁俱寂之中，却不知何处响起悠悠芦管之声，更加撩动着诗人这征戍之人不尽的乡思，其声随风而动，幽怨凄凉，但觉情入愁肠，顿感凄苦。诗末的征人抬头望乡的举止，画面定格，戛然而止的诗语，但诗人所寓之情却似平静湖水中投下的一粒石子，荡开了一层又一层的涟漪，尤其是余音绕梁三日而不止。一个“尽”字不仅表达了戍边将士共有的思乡之情，更将戍边兵士远离家乡的悲苦倾泻而出，真如清人施补华所谓之“意态绝健，音节响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施补华，1978：997）的乐府绝唱。

作为朝廷的“末秩”官员，欲在边塞求得名声的李益，在军幕的生活中，一直在诗歌的书写中以雄浑豪壮的语言，表达其宏阔的胸怀和内心昂扬的气魄。李益在首次秉笔参戎之时，就在诗中高昂着“一旦承嘉惠，轻身重恩光。秉笔参帷

帘，从军至朔方”的豪情（李益，1985:1）。在面对“边地多阴风，草木自凄凉”的恶劣气候和渺无人烟的环境，即使在“剑文夜如水，马汗冻成霜。”如此险恶条件下，诗人仍是披坚执锐，“参差引雁翼，隐辘腾军装”，胸怀“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的豪情壮志而远赴边塞战场，诗末更是以“寄语丈夫雄，苦乐身自当”来表达心中的广阔襟襟和激扬气概。

卢纶的《和张仆射塞下曲》（其又名《塞下曲》）则是借描写将士们的风采，展现其雄厚浑壮的风格，诗云：

（其二）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其三）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卢纶，1989:255）

此两首诗虽言语直白、质朴，但却气势雄阔，将将士们豪情满怀的英雄气概充溢于诗的字里行间，令阅诗之人振奋不已。贺裳赞其“《塞下曲》六首，俱有盛唐之音”。“林暗”一诗是化用李广射虎的典故，以喻将军的英勇威猛。《载酒园诗话又编》中亦对“林暗”此诗评之曰：“‘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一章尤佳”（贺裳，1983:336）。林暗、风惊、夜引弓，将军的豪勇在诗中显露无疑，《诗境浅说续编》中亦称“此借用李广事，见边帅之勇健。首句林暗风惊，不言虎而如有虎在。李广射虎事，仅言射石没羽，记载未详。夫弓力虽劲，以石质之坚，没镞已属难能，而况没羽。作者特以‘石棱’二字表出之。盖发矢适射两石棱缝之中，遂能没羽。于情事始合，卢允言乃读书得间也”（俞陛云，2008:25）。

“月黑”一诗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则将场景置于苍茫开阔的

边塞之地，夜深如墨，雁高无声，一幅月高夜深的画面以凝炼的字句渲染而出。就在这样寂静漆黑，茫茫无边的夜里，“单于”竟然趁着昏暗夜色遁逃。但敌人的出逃还是被警觉的士兵们所发现，将军欲令士兵以轻装部队进行追捕，时间紧迫，凌厉的气势透过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然而就在将士们列队的片刻时间里，漫天飞舞的大雪就已将士兵们所带的弓刀覆盖。诗到此处戛然而止，显得十分突兀，但细细品味，惊觉其诗之结局已自充于读诗之人的思绪中而不着痕迹，无迹可寻。真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矣，可见其“反虚入浑”之高妙所在。明许学夷亦谓其“气魄音调，中唐所无”（许学夷，1987:233）。李攀龙在《唐诗训解》中所评最高，其曰：“月黑雁飞高”一诗“中唐音律柔弱，此独高健，得意之作……此见边威之壮，守备之整，而惜士卒寒苦也。允言语素卑弱，独此绝雄健，堪入盛唐乐府”（转引自刘初棠，1989：260）。

从军入幕，胸怀壮志，李益随军征战时所作的：“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邠宁留别》）“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送柳判官赴振武》）、“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塞下曲》之四）、“行当收汉垒，直可取蒲泥。”（《送常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暮过回乐峰》）和卢纶所作的“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和张仆射塞下曲》其四）、“向日磨金镞，当风着锦衣。上城邀贼语，走马截雕飞。”（《赠李果毅》）、“传呼贺拜声相连，杀气腾腾阴满川。始知缚虎如缚鼠，败虏降羌生眼前。”等皆昂扬着诗人心中豪纵飞扬的壮志，遒劲激昂的磅礴气势，展现了幕府诗雄壮浑厚的风格。

二、清新隽丽

胡应麟在《诗薮》中云：“诗最可贵者清。……清者超凡绝俗之谓”（胡应麟，1958：177-178）。正是诗人所追求的一种清雅、脱俗的清丽风格。司空图《二十四品》将这种风格诠释为：“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履寻幽。载行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司空图，1981:140）。清新隽丽，爽朗明快的审美风格，有若满眼的青脆山色、入手的微凉沁泉、拂面的和煦微风、悠扬的飘逸钟声，皆透着诗作清新活泼而又不失宁静淡雅的独特风采。

李益的《塞下曲四首》其一，云：

蕃州部落能结束，朝暮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李益，1985:105）

这首诗情调高昂，意境开阔，节奏欢畅。诗中所展现的是将士们在边塞生活的真实写照，充满了边疆将士们的满怀豪情和高亢振奋的精神面貌。诗中首写军中将士的驱马行猎，表现出将士们在边塞之地的饱满情绪和振奋有为的精神状态，将将士们勇猛果敢的形象活灵活现的表达出来。“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句则是诗人将诗笔由近及远的展开，描写将士们生活和活动的辽阔背景。天朗气清，朵朵白云，广袤的原野上，飘荡着悠扬的边塞之声。天空之中，鸿雁也在成群结队地飞翔。在一望无际，鲜碧如画的草地上，入眼的牧马群集撒欢，或

悠闲荡尾，或在绿色的草原上追逐奔跑。爽朗欢快的言语将情感与景物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不仅展现出了边塞之地欣欣向荣的美丽景色，也将诗人内心的欢快之情与这明快活泼的意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丰富传神的景物摹写，使得清爽而又明丽的气息扑面而来，营造出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言之“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出于海”（刘勰，1968：494）的情趣意味。

幕府诗中清新隽丽的审美风格，同样亦呈现在下述的作品之中：

如韩翃的：“山河映湘竹，水驿带青枫。”（《送赵评事赴洪州使幕》）、“熨斗山前春色早，香炉峰顶暮烟时。”（《送客一归襄阳二归浔阳》）、“露色点衣孤屿晓，花枝妨帽小园春。”（《又题张逸人园林》）、“疏松影落空坛静，细草香闲小洞幽。”（《同题仙游观》）、“山色随行骑，莺声傍客衣。”（《送李侍御归宣州使幕》）、“乌帽背斜晖，青骊踏春草。”（《送李明府赴滑州》）、“葛衣行柳翠，花簟宿荷香。”（《送苏州姚长史》）。

卢纶的：“溪中鸟鸣春景旦，一派寒冰忽开散。”（《陈翊郎中北亭送侯钊侍御赋得带冰流歌》）、“晓桂香浥露，新鸿晴满川。”（《秋幕中夜独坐迟明因陪…谒上公因书即事兼呈同院诸公》）、“红霞似绮河如带，白露团珠菊散金。”（《九日奉陪侍郎登白楼》）、“林香雨气新，山寺绿无尘。”（《奉和李益游栖岩寺》）、“邛竹笋长椒瘴起，荔枝花发杜鹃鸣。”（《送张郎中还蜀歌》）、“树色参差绿，湖光潋滟明。”（《上巳日陪齐相公花楼宴》）。

鸟鸣花香，清泉翠柳，湖光山色，盎然的生机，透过清秀鲜丽的意象，仿若一幅幅清新隽永的山水图画呈现出来。

三、苍凉悲慨

“悲慨”，悲伤感慨之谓。中唐安史之乱后的大历时期，虽是大乱刚平，却是内乱继起，外患频仍，上下皆为一己之利所图，社会动荡不安。安史之乱前，最为唐代文人所向往、荣耀的“雁塔题名，曲江赐宴，名园探花”，（李志慧，1988:3）对大多数的文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失意的文人或沉沦为奸吏权臣的附庸，或成为遁逃山野的隐逸之士，或被弃谪于蛮荒之地，或心怀壮志而远赴他乡幕府，欲献一己之力救国于危难之中。中唐社会，时世衰丧，在异地他乡，武将专横的幕府环境中，入幕文人的一己之力犹如螳臂，难以阻挡唐代社会衰亡的滚滚巨轮。面对这风雨飘摇的黑暗社会，诗人壮志难伸、年华空老的凄凉酸楚之感，不禁悲从心中来，化为诗人笔下凝重的苍凉悲慨之语。司空图《二十四品》云：“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露雨苍苔”（司空图，1988：156）。正是入幕文人心中欲有所为，却在无情的现实社会与狼狈的个人遭际中，终无所为时发出的无限悲慨与感伤。

李益之《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云：

边城已在虏尘中，烽火南飞入汉宫。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李益，1985:125）

军情紧急，迫在眉睫的“边城已在虏尘中，烽火南飞入汉宫”的形势，李益以之喻当时的国家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了，但朝廷“汉庭议事先黄老”的无所作

为的态度，对外软弱无能的姑息政策，急缓之间的强烈对比，使得国家形势的危急跃然于纸上，最后诗人以“麟阁何人定战功”的方式，表明了朝廷政治情况的混乱，寄寓了诗人对朝廷中既无治国的良将，国家又无良将可以戍边御敌的深切悲慨之情。

戎昱之《云梦故城秋望》，诗云：

故国遗墟在，登临想旧游。一朝人事变，千载水空流。梦渚鸿声晚，
荆门树色秋。片云凝不散，遥挂望乡愁。（戎昱，1982:33）

云梦故城，是古楚的故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北）的所在，点明了这是诗人在荆南幕府时所作。戎昱在武将幕主卫伯玉的幕府中备受冷落，志向难伸。江水，千载不变的流动，人世，则是几经风雨，变化无常。“一朝人事变”的岁月里，“晚”、“秋”、“片云”、“不散”，都是诗人心中忧深愁绪的写照。戎昱将江水与人事进行比照，凸显出诗人凝结心中，难消的怀才不遇之感，蕴涵着诗人的无边苦闷与忧愤悲慨。

幕府诗作苍凉悲慨的风格，还表现在下列的诗作中：

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衰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
疮。（卢纶《逢病军人》）

尘陌望松雪，我衰君少年。（卢纶《送赵真长归夏县旧山依阳征君读书》）

霁后江城风景凉，岂堪登眺只堪伤。（戎昱《江城秋霁》）

远客惊秋早，江天夜露新。满庭惟有月，空馆更何人。

（戎昱《桂州早秋》）

登高上山上，高处更堪愁。 （戎昱《桂州西山登高上陆大夫》）

惆怅青山绿水，何年更是来期。 （韩翃《别甌山》）

独坐不堪朝与夕，高风萧索乱蝉悲。 （韩翃《寄雍丘窦明府》）

闲吟佳句对孤鹤，惆怅寒霜落叶稀。

（韩翃《赠别太常李博士兼寄两省旧游》）

寝兴倦弓甲，勤役伤风露 （李益《五城道中》）

磧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李益《从军北征》）

回身忽作异方声，一声回尽征人首。

（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

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

（李益《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其二）

文人慷慨赴幕，却最终未能一展壮志，却仍要在苦寒恶劣的环境和贪婪凶残的幕府环境中挣扎生存，“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的怀才不遇，忧国愤世的人生悲叹，这种苍凉悲慨的诗歌审美风格，常常透露出幕府诗人在历尽沧桑之后，心中无限悲凉的感慨之意。

四、蕴藉含蓄

蕴藉含蓄，极致委婉之意。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含蓄》中曾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司空图，1981:40）来进行阐释。宋人姜夔亦在《白石诗说》中曰：“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

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姜夔，1962:30）。中唐大历时期，国运衰微，政局不稳，社会混乱，军幕之中亦叛乱不已。投身于幕府之中的文人，在武人为主的幕府之中，过着常人难以想见的艰难生活，内心更多的是苦闷和被压抑的情感。因此，在诗人的幕府创作中，诗人常在有限的诗作篇幅中，以简要凝炼的文字，“语近情遥，含吐不露”（沈德潜，1978：542）地表达幕府中复杂的生活环境和内心难以言语的情感。

卢纶之《从军行》，诗云：

二十在边城，军中得勇名。卷旗收败马，占磧拥残兵。覆阵鸟鸢起，
烧山草木明。塞闲思远猎，师老厌分营。雪岭无人迹，冰河足雁声。李陵
甘此没，惆怅汉公卿。（卢纶，1989:264）

久居军幕的卢纶，对军旅的苦楚，已经有着非常深刻地体验。诗中虽以颇为高昂的“二十在边城，军中得勇名”起句，但“败马”和“残兵”的衰败意象，“雪岭无人迹，冰河足雁声”的凄凉景象，寒苦的生存条件，却使得兵士们精神疲惫，士气低落。对于“塞闲思远猎，师老厌分营”一句，《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吴山民曰：“‘师老戒分营’，五字有用。结有深意”（周珽，1989:267）。安史之乱后，仆固怀恩和李怀光本来都是平定叛乱的有功之臣，但是却皆因朝廷的猜忌，难逃被逼反叛朝廷，流窜附敌的悲剧的命运。这让身在幕府之中的卢纶，亦深感于唐朝廷对幕府危难时倚重，无事就猜忌的反复态度，以蕴藉含蓄的语言，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心中强烈的愤慨之思。唐汝询评此诗曰：“唐人赋《从军》，不述思家，必称许国。此独为判将之辞，语讥落镇，非泛然作也”（转引陈伯海，

1995: 1460)。《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亦引明人周珽之语云：“德宗之世，内多奸小，边臣解体，藩镇之祸日盛。此篇疑时有覆军之将，收其残兵啸聚边地，故允言述其意以为词。……末以李陵甘没虏廷为况，见在朝公卿忌功，致边有不还之将，深可“惆怅”者也，讥刺之词，甚于刑讨”（周珽，1989:267）。

李益之《塞下曲四首》之三，诗云：

黄河东流流九折，沙场埋恨何时绝。蔡琰没去造胡笳，苏武归来持汉节。（李益，1985:106）

此诗运用丰富的意象，采用剪影式、层递式、拼置式的三种意象相组合的形式来进行描写。（石克鸿，1997:31—33）诗首两句以蜿蜒九折的“黄河”和广袤无垠的“沙场”两个永恒的意象，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表达诗人对边塞战争永无休止的怨愤之情。诗的三、四句则由大及小，在空旷的时空背景下，诗人选择历史上两个典型的人物蔡琰和苏武进行描写，使诗中所蕴藉的“恨”通过鲜明的形象凸显出来，含蓄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无休止战争的痛苦难禁之情，同时深沉的寄寓了诗人对民族和平的强烈渴望。

戎昱之《寄梁淑》，诗云：

长忆江头执别时，论文未有不相思。雁过经秋无尺素，人来终日见新诗。心思食檠何由展，家似流萍任所之。悔学秦人南避地，武陵原上又征师。（戎昱，1982:57）

大历五年（七七〇）四月，湖南幕府兵马使臧玠发动兵变，杀害幕主崔瓘。湖南由此陷入一片混乱，“烈火发中夜，高烟焦上苍”（杜甫〈入衡州〉，1998:1020）。

戎昱进入幕府，不仅仅是为了生计，更是为了心中报国的壮志。可是，动荡不安的社会，混乱不堪的幕府环境，已到而立之年的戎昱，一事无成。“心思食檠何由展，家似流萍任所之”，现实的残酷，让戎昱倍感的前途渺茫。“悔学秦人南避地，武陵原上又征师”之语，深刻而又含蓄的道出了戎昱心中的无赖与迷惘。

韩翃诗之《寒食节》，其云：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彭定求编，1999：2756）

此诗以景入手，淡笔轻点，寒食节日的景色，“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柳絮漫天，风吹柳斜，营造出一幅清冷而萧索的氛围。诗笔轻转，“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描绘出一种轻松的宫廷闲暇，贵族沾恩的承平之象。可是，在对韩翃作诗的时间、地点与经历进行梳理后，再品诗中之味，发现诗内讽意暗藏。韩翃遭逢安史之乱，流离失所。在幕府之中亦过着颠沛流离，身不由己的生活，饱尝幕府混乱的艰苦与心酸，一生郁郁不得志，甚至在晚年之时，就连自己引以为傲的诗歌创作也被人称为“恶诗”。而造成这一切的皆是因为杨氏姐妹的专权擅宠，使得唐朝运势开始逐渐衰落。幕府独大奸险，韩翃久居幕府，对此深有所感。诚如贺裳所云之：“君平以《寒食》诗得名，……此诗作于天宝中，其时杨氏擅宠，国忠、钁与秦、虢、韩三姨号为五家，豪贵荣盛，莫之能比，故借汉王氏五侯喻之。即赐火一事，而恩泽先沾于戚畹，非他人可望，其余锡予之滥，又不待言矣。寓意远，托兴微，真得风人之遗”（贺裳，1983：335）。韩翃心中之怨，在这首诗中以蕴藉含蓄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样体现蕴藉含蓄风格的诗句还有：

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李益《夜发军中》）

更闻横笛关山远，白草胡沙西塞秋。（李益《夜宴观石将军舞》）

独行过邑里，多病对农桑。（卢纶《代员将军罢战后归旧里赠朔北人》）

未远金门籍，旋清玉塞尘。（卢纶《寄赠库部王郎中》）

岐路自奔隘，壶觞终寂寥。（卢纶《秋晚河西县楼送浑中允赴朝阙》）

玉杯分湛露，金勒借追风。（韩翃《送田仓曹汁州覲省》）

浮云不共此山齐，山霭苍苍望转迷。（韩翃《宿石邑山中》）

忽惊万事随流水，不见双旌逐塞云。

（韩翃《赠别太常李博士兼寄两省旧游》）

浮云飞鸟两相忘，他日依依城上楼。（韩翃《送夏侯侍郎》）

重谊人愁别，惊栖鹊恋枝。（戎昱《桂州岁暮》）

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戎昱《上湖南崔中丞》）

常叹苏生官太屈，应缘才似鲍参军。（戎昱《送苏参军》）

草草还草草，湖东别离早。（戎昱《湖南雪中留别》）

幕府环境之中，武人强势，诗人以浅显情真的语言，蕴藉含蓄的文字表达，寄托着诗人心中深刻委婉的情思。

结 语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曾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1958：671）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1958：675），深刻地揭露出了文学与时代更迭之间的关系。西方文学评论家丹纳亦有“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丹纳，1986：32）的言论。因此，作为唐代文学主要的展现方式——唐诗，也必然会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发展史上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它使唐朝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时代。大乱平定之后的唐朝政府逐渐瓦解，政治日趋腐败，新兴势力的异军崛起，社会生活也在连年兵燹中变得千疮百孔。唐诗也“必俟新朝之政治措施影响于社会生活，然后透过生活于该一新社会之作家笔尖，始呈现新时代之文学风貌”（叶庆炳，1987：318）的变化。

因此本文以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历时期为时代背景，以四位诗人的家世渊源、生平经历与幕府生活为辅，以诗人所作之诗歌作品为主，藉以探讨大历时期幕府诗人的创作。

在综观唐代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之后，可以发现时代留给大历诗人们的发展空间实在是太狭窄了。唐朝政府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变得四分五裂，政治、经济、社会面貌，都在这场动乱之中变得支离破碎。大历时期的诗人们也曾希望通过科举入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但是前往朝堂的科举之路却是如此的拥塞蹇堵，难以让诗人们有所发挥。加之安史之乱后的大历时期，是唐代“战事最频繁、经济最窘困、政治最灰暗”（蒋寅，2009：45）的时期，“离去乡间，

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刘昫，1975：339）的萧条破败，“行赆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刘昫，1975：339）的残破现实，令人不堪目睹，这时唯有偏安一隅的幕府，能让大历文人们暂安其身。

幕府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发展壮大，从临时性的使职发展成为具有实际权力的行政单位，并且开始掌握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作为大历时期的新生代力量，大历文人们仍然胸怀“郡公楯鼻好磨墨，走马为君飞羽书”（彭定求等编，1999：272）、“忠臣思报国，更欲取关西”（戎昱〈观卫尚书九日对中使射破的〉，1982：38）、“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李益〈塞下曲〉，1985：：15）的豪情壮志。文人们在理想、仕进和生计等因素的推动下，参军入幕，积极地想要在幕府之中发挥作用，实现经国济世、建立功勋的抱负。可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余嘉锡，1983：58），大历时期的幕府环境也并不安定，幕府内的统治时常翻覆，经常发生将士以武力逐杀节帅的暴力事件。文人们在这刀枪剑戟与弱肉强食的幕府环境中艰难地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们还要考虑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抱负，还是随波逐流沉沦于现实的幕府生活之中，他们的内心极度矛盾，始终无法两全的局面，使得他们饱尝煎熬。这种深埋于幕府诗人内心的矛盾，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无法改变的时候，就使他们深刻地体验到了有别于其他文人的特殊境遇与遭际。失落的人生理想、言难由衷的幕府环境、苦闷压抑的内心感情，无不成为幕府诗人创作中吟咏唱叹的对象。诗人们在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与人生经历下，在所入幕府之地的人文地理和政治环境中，共同造就了大历幕府诗别样的风格。

在题材内容方面，首先大历幕府诗的笔触范围、内容与诗人所处的幕府环境

有着直接的关系。幕府之地的民情风俗、风土物产不同，有的甚至差别很大。而这些不同之处，必然会对生活在这些区域里的幕府文人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幕府文人们的诗歌创作，使其呈现出各异的地域性风貌。如卢纶所入的河中幕府和韩翃所入的汴宋幕府，因近傍桑梓，所以在卢纶与韩翃所作的幕府诗中，就极少有抒写对家乡思念之情的作品。另外，在卢纶与韩翃的入幕之地物产丰富，风景名胜繁多，幕府相互之间往来频繁，幕府之中文人甚多。因此，在卢纶与韩翃的幕府创作中多以幕府游宴、来往送别之诗的创作居多。反之，李益所入军幕，多在北方边地，其地地接边荒，所在区域之人性多木强，多尚武节；戎昱所入幕府，则多为南方边幕，地湿多瘴疠，人性轻悍，易生逆节。李益和戎昱所在幕府，府中文人较少，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不强，由此导致两人的幕府创作中，甚少幕府陪游之作，多是以表达个人情怀归的诗歌创作较多。特别是在戎昱的幕府创作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其次，大历幕府诗的题材表现，也随着幕府诗人的性格、遭际、身份和处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如戎昱多次进入幕府之中，但却久居下僚，始终没有得到幕府节度使的重用。其入幕之所，也皆为离家几千里的僻远之地，路途遥远，音信难通。因此，在戎昱的幕府创作中，则多以抒写壮志难酬的苦闷和对家乡的极苦思念之情。又如，韩翃在第一次的参幕生涯中，亲身经历了幕府主侯希逸被将士驱逐的事件，就已然明白幕府之地绝非文人的久居之地。这也直接导致了韩翃在“府罢”以后的十年时间里，积极的向权贵靠拢，希望求得当朝名士的汲引，但是韩翃却皆没有得偿所愿。“无因得携手，东望转凄凄”（彭定求等编，1999：2732）的韩翃再次转向幕府。在首次的从幕经历之后，韩翃已深谙幕府之中的生存规则。因此，韩翃在汴宋幕府生活中，虽然武将出身的节度

使几番替换，但是不管幕府环境是怎样的仓皇艰险，韩翃都极为“大度”地承受住了。韩翃作为幕府之中的掌书记，在迎来送往的饯酬赠唱中，韩翃过着言不由衷、极尽人欢，醉生梦死的应酬生活，这样的幕府生活体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韩翃的幕府创作，从而使韩翃的幕府创作多以送别为主。与韩翃不同，卢纶在进入幕府之前，不仅经历了科举考试的连年失利，而且也在恐怖的仕宦生活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人生陷入最低谷的时候，幕府向卢纶投来了“橄榄枝”。卢纶进入幕府，这是一个身、心皆由绝望走向希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卢纶的心情是轻松的，情绪快乐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快乐给人带来力量和魄力，使人处于与外界事物和谐共处的境地；快乐的紧张度很低，使人处于超越和自由状态，因此，快乐把人展现于外，容易接受外界事物并容易导致对事物发生兴趣。”（孟昭兰，1988：118—126）因此，进入幕府之后的卢纶，在这样的心理体验下，卢纶的幕府创作题材丰富，内容多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卞孝萱、乔长阜，1988：22—27）。

虽然诗人们的幕府创作各有侧重，但综而观之，大历幕府诗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诗人们或在对自然景物的观照中，借对着景物的描写，将内心的豪情壮志与思想情感宣泄而出；或是将从幕时的不同心境体验，进行委婉含蓄地抒写；或是状写幕府之地的景色风物；或是描写诗人自己的境况遭际。

文人们心怀壮志，远投他乡幕府，在体现报国壮志的诗歌创作中，诗人直抒胸中昂扬豪迈的建功气概。身处幕府之中的诗人，在刀光剑影，风雷激荡的军幕生活中，对残酷血腥的战争有着更为强烈深刻地体会。因此，诗人在历史时空中，以今昔作对比，在物是人非的观照中，发出悠远而深邃的感慨。将戍边将士们的悲苦情愁注入诗中，表达出诗人对将士们深切的关怀之情。同样，在诗人的笔下

也有偶遇亲人好友的喜悦，亦有在幕府中把酒言欢，幕府游宴的快乐描写。时局纷乱，短暂相聚的快乐，长久分别的忧伤，诗人在对相隔之人的诗作表达中，诉说着人生的离别之愁、对亲友的思念之苦、对家乡深切思念之情，流露出内心真切的情感体验。唐代大历诗人笔下的幕府诗，表达内容多种多样，情感蕴藉深厚，将唐代幕府的自然人文，点缀得丰富多彩，同时也让诗人压抑苦闷的精神得到舒缓与释放。

大历幕府诗在艺术特色表达上，不拘一格，呈现出多源开放性的特色。语言风格多样，诗人们根据诗歌创作时的情感需要和生命体悟，或以雄壮浑厚的风格，表达心中磅礴浩荡的气概；或以清新隽丽的风格，描写诗人眼中清秀鲜丽的景色；或以苍凉悲慨的风格，表达纷乱现实中壮志难酬，徒然老去的凄楚悲伤；或以蕴藉含蓄的风格，展现心中忧国忧民和压抑苦闷的难言情感。幕府诗的情与景地描写，皆表现出诗人自身的心志情态和身境感受。因此，诗歌在情景的呈现方面，诗人们有的以“情悲景悲”的正衬之作，有的以“情悲景喜”的反衬之作，来凸显诗人在幕府环境中的复杂情感，使得读者能够深入地了解 and 体会幕府诗人的矛盾心理。

大历幕府诗，是在政治、经济、幕府环境等诸多客观因素地影响下，形成、发展，并逐渐绽放出其独特光彩。大历幕府诗虽难脱“自艰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尚诣五言，擅场饯送，此外无大篇伟什岿望集中”（胡震亨，1981:64）的不足，但是大历幕府诗人在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下，也在深知幕府统治反复无常的情况下，却还是自愿置身于军队幕府之中，去体验和状写大历时期幕府之中的真情、壮志和对人生时代的感悟与思索。这些激流勇进，投身于幕府之中的大历诗人们，不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吗？大历幕府诗的存在价值，

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认真品味的。可是学术界对幕府诗的研究至今却并未结有硕果，仍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期待本文的研究，能引起以后学者们对幕府诗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附 录

诗人年谱¹⁶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 740

戎昱生。

唐玄宗天宝七年 748

卢纶生。

李益生。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 754

韩翃登进士第。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755

戎昱初举进士不第。

卢纶开始读书，遇乱，客居鄱阳。

唐肃宗至德元年 756

卢纶避乱自长安徙居鄱阳。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肃宗干元二年 755—758

戎昱曾避难移家陇西数载。

唐肃宗干元二年 759

戎昱入浙西节度使颜真卿幕，为蜀吏。有诗《收襄阳城二首》。

唐肃宗上元元年 760

戎昱在长安。本年初，随颜真卿来上都。年后离长安东去。与驸马张潜相遇。

¹⁶ 本年谱参考书目：傅璇琮、李一飞、陶敏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元]辛文房撰，傅璇琮等编：《唐才子传校笺》；谭优学著：《唐诗人行年考》、《唐诗人行年考（续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等。

有诗《过东平军》。

唐代宗宝应元年 762

戎昱自东徂西，过滑州、洛阳，目睹洛阳等地惨状，回到长安。与王季友同作《苦哉行五首》。

韩翃入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幕，为掌书记。

唐代宗广德二年 764

戎昱在长安。

李益离开凉州，迁入内地，家居洛阳。

唐代宗永泰元年 765

戎昱仍在长安。拜见岑参。本年十月冬，到达甘肃泾州。有诗咏元戎出师。有诗：《赠岑郎中》、《泾州观元戎出师》。

韩翃在淄青侯希逸幕。七月，侯希逸被逐，韩翃随之返回长安。

卢纶年十八，约于本年前后，应举长安，不第。有诗：《晚次鄂州》。

唐代宗永泰元年大历元年 766

戎昱自长安客游入蜀。由剑门赴成都，曾在绵州之罗江县停留，九月在成都，见岑参于成都。有《入剑门》《罗江客舍》《成都暮秋雨》《成都元十八侍御》《赠岑郎中》等诗。

卢纶再举不第，赴池州。有诗《赴池州拜觐舅氏留上考功郎中舅》《至德中途中书事却寄李润》《至德中赠内兄刘赞》。

唐代宗大历二年 767

戎昱年春，仍在成都。有诗《送严十五郎之长安》、《成都送严十五之江东》。是年夏秋，离开成都，沿大江舟行东下，至云安，即四川云阳，阻雨，有《云安

阻雨》。至江陵，有诗《晚次荆江》。入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幕中从事。有诗《赠张驸马》。戎昱《观卫尚书九日对中使射破的》当与本年或次年重阳之作。

韩翃在长安。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夏侯审十人本年前后，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十才子”。

卢纶在长安。大历初，卢纶与司空曙、李端、苗发、吉中孚、钱起等相聚长安，文咏唱和，号“大历十才子”。有诗《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

唐代宗大历三年 768

韩翃在长安。钱起、皇甫冉、皇甫曾、韩翃同在长安作诗送王缙赴镇幽州，诗以韩翃擅场。

戎昱在江陵卫伯玉幕中任从事。有《云梦故城秋望》、《江城秋霁》、《客堂秋夕》、《江城秋夜》、《江上柳送人》、《霁雪》、《送苏参军》、《酬梁二十》、《别公安贾明府》等诗。

卢纶居长安。举进士不第。本年前后，有《与从弟瑾同下第后出关言别》《酬苗员外仲夏归郊居遇雨见寄》等诗。

李益居嵩颖，约本年应试不第，有诗送同下第者东归。有诗：《送同落第者东归》。

唐代宗大历四年 769

韩翃在长安。冷朝阳擢第，归上元。韩翃有诗《送冷朝阳还上元》送之。

戎昱约于九月离开荆南幕府至湖南。在湖南潭州（今长沙市）崔瓘幕中，有诗《上湖南崔中丞》，本年或次年作。《宿湘江》、《寄梁淑》。

卢纶来往于长安与盩厔之间。有诗《落第后归终南别业》、《落第后归山

下旧居留别刘起居昆季》、《落第后归山下旧居》、《秋夜寄冯著作诗及注》。

李益登进士第，调郑县（今陕西省华县）尉。

唐代宗大历五年 770

戎昱在湖州崔瓘幕中。四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崔瓘被兵马使臧玠所杀，湖南乱。是冬，离长沙。有《湖南春日二首》、《湖南雪中留别》等诗。

卢纶往来于长安与盩厔间。本年或稍前，有《送潘述宏词下第归江南》、《送杨皋东归》、《送元赞府重任龙门县》、《客舍喜崔补阙司空拾遗访宿》、《出山逢耿漳》、《春日灞亭同苗员外寄皇甫侍御》等诗。

唐代宗大历六年 771

韩翃在长安为官，本年或明年曾出使关东，过华州，有诗《华亭夜宴庾侍御宅》。

戎昱游历湖南，在衡阳。有诗：《衡阳春日游僧院》、《旅次寄湖南张郎中》、《湘南曲》。

卢纶奔走于权相元载之门，特闕乡尉。有《将赴闕乡灞上留别钱起员外》、《早春归盩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漳李校书端》、《寄郑七纲》诗。

李益登制科举，被授郑县主簿之职。

唐代宗大历七年 772

韩翃在长安。有《赠郢州马使君》、《送王侍御赴江西兼寄李袁州》、《送李中丞赴辰州》等诗。

卢纶在长安。

李益在上都制举“主文谏”，授河南府参军。

唐代宗大历八年

773

韩翃十一月，田神功入朝，被招至汴宋幕府。秋，东归兖州，有诗《赠别太常李博士兼寄两省旧游》留别；至兖州，有诗赠都督孟休鉴诗多首，复西归。有《陪孟都督祭岳途中有赠》、《祭岳回重赠孟都督》、《赠兖州孟都督》、《别孟都督》等诗。

卢纶于此年前后数年后，继阌乡尉后，旋任密县令。本年前后，有《华清宫》七绝二首及《早秋望华清宫中树因以成咏》。

戎昱第一次赴桂州，入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李昌巖幕府。有《桂州腊夜》等诗。

唐代宗大历九年

774

卢纶在长安。卢纶有《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送耿拾遗漳充括图书使往江淮》等诗。

韩翃在汴州田神玉幕。三月，因送人赴江东而寄诗独孤及《赠别崔司直赴江东兼简常州独孤使君》。八月，韩翃有诗《送皇甫大夫赴浙东》送皇甫温赴江东任。

李益在郑县主簿任官。秋，以三辅属吏秉笔参幕，入渭北臧希让朔方军幕府。参军有诗：《从军有苦乐》、《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听晓角》、《登长城》、《塞下曲》四首、《夜上西城听梁州二首》、《拂云堆》等诗。

唐代宗大历十年

775

戎昱因被谗离桂州幕，有诗上李昌巖，有《上桂州李大夫》；秋，在湖南流寓，作《哭黔中薛大夫》诗哭薛舒。

卢纶在长安任职。有诗《送黎燧尉阳翟》、《送丹阳赵少府》等诗。

李益在渭北幕府。

唐代宗大历十一年 776

卢纶在长安任职。本年秋，或稍前，卢纶赴虢州。有诗《奉和李舍人昆季咏玫瑰花寄赠徐侍郎》、《送李纵别驾加员外侍郎却赴常州幕》、《客舍苦雨寄钱侍郎士元二员外》、《送宁国夏侯丞》、《送乐平苗明府》、《送鲍中丞赴太原行营》等诗。

李益在渭北幕府。

戎昱复至桂州入李昌巖幕，有《再赴桂州先寄李大夫》等诗。

韩翃在田神玉汴州幕。神玉卒，韩翃有诗《梁城赠一二幕友》伤之。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 777

李益在渭北幕府。

戎昱在桂州李昌巖幕。作《桂州口号》、《宿桂州江亭呈康端公》、《送张秀才之长沙》等诗。

韩翃仍在汴州幕。暂来长安，与毕宏、钱起、郎士元会褚主簿宅，时郎士元已有郢州之命，韩翃作诗《褚主簿宅会毕庶子钱员外郎使君》。

卢纶受元载、王缙牵累，在虢州先入罪所，后受停务处分。昭雪后，旅居江湖，与密友赵纵仍有书简往来。有《虢州逢侯钊同寻南观因赠别》、《罪所送苗员外上都》、《雪谤后逢李叔度》、《雪谤后书事上皇甫大夫》、《春日书情赠别司空曙》、《同耿漳司空曙二拾遗题韦员外东斋花树》等诗。

唐代宗大历十三年 778

韩翃在汴州幕。

戎昱在桂州李昌巖幕。有诗：《桂州早秋》《桂州岁暮》。

卢纶在洛阳，与赵纵之弟赵袞有唱酬。有《送申屠正字往湖南迎亲兼谒赵和州因呈上侍郎使君并戏简前历阳李明府》、《和赵端公九日登石亭上和州家见》、《秋夜寄冯着》等诗。

李益本年或稍前，罢郑县主簿，罢秩游华山。有《罢秩后入华山采茯苓逢道者》、《入华山访隐者经仙人石坛》等诗。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779

韩翃在汴州。时李勉移镇汴州，遂入勉幕。

卢纶在洛阳。有诗《送张调参军侍从归觐荆南因寄长林司空十四曙》。

李益在长安。

戎昱在桂州李昌巖幕。

唐德宗建中中元年 780

卢纶本年为昭应令，有诗《驿中望山戏赠尉南陆贄主簿》、《同钱郎中晚春过慈恩寺》、《送夏侯审校书归华阴别墅》。

韩翃在汴州幕中。以《寒食》诗受知德宗，擢为驾部郎中、知制诰；秋，送故人赴江陵。有诗《送故人赴江陵寻庾牧》、《送夏侯审》等诗。

李益在长安。时改元大赦，作诗《大礼毕皇帝御丹凤门改元建中大赦》。

戎昱在桂州李昌巖幕。

唐德宗建中二年 781

韩翃在长安。韩翃为中书舍人，钱起为考功郎中，均在长安，本年或稍后，与王鎔、程浩题诗安国寺藏用院。

戎昱仍在桂州，重阳后始北赴长安。有诗《桂州西山登高上陆大夫》。北上至长安中途到达荆南境所辖之澧州，与澧州刺史李泌交往，作《澧州新城颂》。

卢纶在长安。时年前后有诗《送马尚书郎君侍从归覲太原》、《书情上大尹十兄》、《秋夜同畅当宿藏公院》。

李益是年秋，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幕，再次从军塞上，巡行朔野。有诗《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

唐德宗建中三年

782

戎昱在长安，官殿中御史台任侍御史。本年末，贬辰州。有诗《秋望兴庆宫》。

卢纶在长安。有诗《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逢南中使寄岭南故人》、《太白西峰偶宿车祝二尊师石室晨登前岫凭眺书怀即事寄呈凤翔齐员外张御》。

李益该年初夏还长安，拟仍返李怀光幕赴幽州。后以他故，未行。仍留长安。有诗：《来从塞车骑行》、《自朔方还与郑氏瞻崔称郑子周岑赞同会法云寺避暑》等诗。

韩翃在长安。

唐德宗建中四年

783

韩翃约本年卒。

戎昱在辰州（治所在沅陵 今湖南沅陵县），贬辰州刺史任。有《辰州建中四年多怀》、《谪官辰州冬至日有怀》等诗。

卢纶在长安，本年，泾原之师倒戈叛乱，德宗出幸奉天。有《春日卧病示赵季黄》、《送畅当赴山南幕》、《卧病寓居龙兴观枉冯著作书归洛阳因题十四

韵寄冯生病赠乔尊师》等诗。

李益在长安，登拔萃科。授侍御史。此年，朱泚之乱。

唐德宗兴元元年 784

戎昱在辰州。有诗《辰州闻大驾还宫》。

卢纶时陷长安城中，卧病。有《皇帝感词》、《春日卧病示赵季黄》、《贼中与严越卿曲江看花》、《题金吾郭将军石伏茅堂》、《送宁国夏侯丞》等诗。

十月府，入浑瑊幕，为元帅判官。

李益在长安。

唐德宗贞元元年 785

戎昱仍在辰州。有诗《闻颜尚书陷贼中》。

卢纶入浑瑊幕，仍在长安。有诗《奉陪浑侍中上巳日泛渭河》、《春日喜雨奉和侍中宴白楼》、《同兵部李纾侍郎刑部包佶侍郎哭皇甫侍御曾》、《送从侄滁州覲省》、《酬灵澈上人》等诗。

李益在洛阳，有诗送穆质兄弟入京制科举，有诗。秋，入灵州杜希全幕，第三次从军塞上。有《中桥北送穆质兄弟应制戏赠箫二策》、《再赴渭北使府留别》、

《上黄堆烽》、《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等诗。

唐德宗贞元二年 786

戎昱已回长安。韦况被征为左拾遗。有诗：《赠韦况征君》。

卢纶在浑瑊幕中。有诗《寄赠库部王郎中》、《得耿漳司法书因叙长安故友零落兵部苗员外发秘省李校书端相次倾因呈河中郑仓曹畅参昆季军》、《王评

事驸马花烛诗》等。

李益在杜希全幕中。行役过华州，再度登游华山。

唐德宗贞元三年 787

戎昱在长安。

卢纶在浑瑊幕中。有《秋中野望寄舍弟绶兼令呈上西川尚书舅》、《送赵真长归夏县旧山依阳征君读书》、《同路郎中韩侍御春日题野寺》等诗。

李益在杜希全幕中。

唐德宗贞元四年 788

卢纶在浑瑊幕中。有《和陈翊郎中拜本府少尹兼侍御使献上侍中因呈同院诸公》、《秋夜宴陈翊郎中圃亭美校书郎张正元归乡》、《酬陈翊郎中冬至携柳郎宝郎归河中旧居》、《奉和圣制麟德殿宴百僚》等诗。

李益仍在杜希全幕中。辑其从军诗五十首赠故人左补缺卢景亮。

戎昱在长安。

唐德宗贞元五年 789

卢纶在浑瑊幕中。有诗《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漳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皆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沈下泉畅博士当感怀前踪有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以申悲旧兼寄夏侯侍御（一作郎）审侯仓曹钊》。

李益在杜希全幕中，冬，李益入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有《赴邠宁留别》诗。

戎昱在长安。

唐德宗贞元六年 790

卢纶在浑瑊幕府中。

李益在邠宁幕。有诗：《惜春伤同幕故人孟郎中兼呈去年看花友》、《和丘员

外题湛长史旧居》、《立春日宁州行营因赋朔风吹飞雪》、《邠宁春日》。

戎昱在长安。

唐德宗贞元七年 791

戎昱在长安，官至虔州刺史。有诗《送吉州阎使君入道二首》。

卢纶在浑瑊幕府中。有诗《奉陪侍中春日过武安君》、《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颿》、《送畅当还旧山》、《寄赠畅当山居》。

李益在邠宁幕。时年二月，李观游邠宁，正直李献甫赏军，李益嘱李观撰《邠宁庆三州节度赏军记》。有诗《答许五端公马上口号》、《送柳判官赴振武》。

唐德宗贞元八年 792

戎昱在洛阳。陪杜亚观乐，有诗记之《开元观陪杜大夫中元日观乐》。

卢纶在浑瑊幕府中。李益奉张献甫之命赴河中浑瑊幕，与卢纶诗宴唱酬。有诗《酬李益端公夜宴见赠》、《宝应寺送李益端公》、《栖岩寺隋文帝马瑙盃歌》、《玩春因寄冯卫二补缺戏呈李益》、《敦颜鲁公送挺赆归翠微寺》。

李益在邠宁幕。是年张献甫以城盐夏二州故，遣李益往河中府请示洽商公务于朔方河中晋绛邠宁兵马府元帅浑瑊。李益内兄诗人卢纶时在浑幕。本年使河中，与卢纶唱酬。《赠内兄卢纶》、《登白楼见白鸟席上命鹓鸪辞》。

唐德宗贞元九年 793

卢纶在浑瑊幕府中。是年有《送张郎中还蜀歌》、《赋得白鸥歌送李伯康归

使》等诗。

李益在邠宁幕。

唐德宗贞元十年 794

卢纶在浑瑊幕府中。本年春，曾因事往江西洪州。有诗《上巳日陪齐相公花宴席楼》、《东潭宴河南赵少尹》、《酬赵少尹戏示诸侄元阳等因以见赠》。

李益在邠宁幕。

唐德宗贞元十一年 795

卢纶在浑瑊幕府中。

李益在邠宁幕。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 796

卢纶在浑瑊幕府中。本年有《送县延法师讲罢赴都》、《送道士郗彝素归内道场》、《和裴延龄尚书寄题果州谢舍人仙居》、《新茶咏寄上西川二十三舅大夫二十

四舅》、《九日奉陪令公登白楼同咏菊》、《送信州姚使君》等诗当等于本年。

李益在邠宁幕，是年五月，张献甫卒，后，李益离邠宁张献甫幕。

唐德宗贞元十三年 797

卢纶本年或明年，自河中入朝，为户部郎中，有诗《将赴京留县令公》《敬酬太府二十四舅览诗卷因以见示》。

李益本年或稍后游河东河北，北游河朔。后，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进为营田副使。有《同崔邠登鹳雀楼》、《北至太原》、《春日晋祠同声会集得疏字韵》、《题太原落漠驿西堠》、《临滹沱见蕃使列名》、《献刘济》、《置酒行》等诗。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

798

卢纶在长安。《元日早朝呈故省诸公》、《元日朝回中夜书情寄南宫二故人》。

李益在幽州刘济幕。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

799

卢纶约卒于本年。

戎昱在永州刺史任上。有诗《送零陵妓》。

李益在幽州刘济幕。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

800

李益离开幽州幕府，夏，南游江淮扬州，有《汴河曲》、《莲塘驿》等诗。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

801

李益年春，在扬州。与刘禹锡、张灯等会饮于扬州水馆，有联句诗。有《州早燕》、《扬州怀古》、《隋宫燕》、《杨柳送客》、《扬州送客》、《逢归信偶寄》等诗。

戎昱此时六十二岁可能还活着，曾在湖州花溪严侍御家作客，有诗《闰春宴花溪严侍御庄》。此后行迹绝，不可考。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

802

李益离开扬州，溯大江西上，至巴陵。有《行舟》、《水宿闻雁》、《喜见外弟

又言别》、《春夜闻笛》、《鹧鸪词》等诗。

唐宪宗元和元年 806

李益在长安。

唐宪宗元和三年 808

李益在长安，官至宫郎中。

唐宪宗元和四年 809

李益在长安，本年或稍前官中书舍人。

唐宪宗元和五年 810

李益在长安，自中书舍人，出为河南少尹。

唐宪宗元和七年 812

李益在长安，为秘书少监，由河南少尹而入长安内，集贤殿学士。

唐宪宗元和八年 813

李益在长安，降居散秩。

唐宪宗元和九年 814

李益在长安。是年有《奉和武相公春晓闻莺》、《奉和武相公郊居寓目》。

唐宪宗元和十年 815

李益在长安。有《哭柏严禅师》、《赠宣大师》、《喜入兰陵望紫阁峰呈宣上人》、《诣红楼院寻广宣不遇留题》、《送襄州李尚书》等诗。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 817

李益在长安。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 820

李益在长安，官右散骑常侍。

唐文宗大和元年 827

李益正月，为礼部尚书致仕。

唐文宗太和三年 829

李益卒。

参考书目

一 古籍

- 【春秋】老子撰 朱谦之校释（1984），《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 【春秋】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李学勤主编（1999），《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春秋】左丘明撰 杨伯峻编注（1981），《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 【战国】公羊高撰、梅桐生译注（1998），《春秋公羊传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1964），《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 【汉】董仲舒撰 【清】凌曙注（1975），《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
- 【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1999），《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汉】司马迁撰 【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195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 【汉】王粲撰 俞绍初校点（1980），《王粲集》，北京：中华书局。
- 【汉】袁康、吴平辑录 俞纪东译注（1996），《越绝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 【三国】曹丕著 魏宏灿校注（2009），《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三国】曹植撰 赵幼文校注（1984），《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1999），《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南朝·梁】吴均撰 王根林校点（1999），《续齐谐记》，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朝·梁】何逊撰（1980），《何逊集》，北京：中华书局。

【南朝·梁】刘勰著 范文澜注（1968），《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北·梁】宗懔著 姜彦稚辑校（1986），《荆楚岁时记》，长沙：岳麓书社。

【南北·梁】钟嵘著 曹旭集注（1994），《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北·齐】魏收著（1974），《魏书》，北京：中华书局。

【南朝·宋】江淹撰 俞绍初 张亚新校注（1994），《江淹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唐】孟浩然撰 佟培基笺注（2000），《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孟棻等撰（1957），《本事诗 本事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唐】白居易撰 顾学颀校点（1979），《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

【唐】白居易（1983），〈王众仲可衡州刺史制〉，【清】董诰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唐】岑参撰 廖立笺注（2004），《岑嘉州诗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唐】杜甫撰 [清]杨伦笺注（1998），《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1988），《通典》，北京：中华书局。

【唐】封演撰 赵贞信 校注（2005），《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唐】韩愈撰 马其昶校注 马茂元整理（1987），《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韩愈撰 屈守元 常思春主编（1996），《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
- 【唐】李肇（2000），《唐国史补》，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李白撰 【清】王琦注（1977），《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 【唐】李商隐撰 刘学锴、余恕诚（2004），《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 【唐】令狐楚（1983），〈荐齐孝若书〉，【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 【唐】刘宽夫（1983），〈汴州纠曹厅壁记〉，【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 【唐】刘餗撰（1979），《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
- 【唐】权德舆（2008），《权德舆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柳宗元撰（1979），《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
- 【唐】李吉甫（1983），《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
- 【唐】卢纶著 刘初棠校注（1989），《卢纶诗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沈佺期、宋之问撰 陶敏、易淑瓊校注（2001），《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唐】司空图（1981），《二十四诗品》，收录于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 【唐】魏征 令狐德棻撰（1973），《隋书》，北京：中华书局。
- 【唐】王维撰 陈铁民校注（1997），《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唐】元 结（1975），《元次山集》，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印行。
- 【唐】元稹撰 冀勤点校（1982），《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
- 【唐】元结（1983），〈再谢上表〉，董诰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 【唐】元结（1983），〈举处士张季秀状〉，董诰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 【唐】颜真卿（1983），〈蒲州刺史谢上表〉，董诰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 【唐】姚合（1996），《极玄集》，收录于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唐】张谓（1983），〈长沙风土碑铭〉，董诰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 【唐】韦应物著 陶敏 王友胜校注（1998），《韦应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杜牧撰 吴在庆校注（2008），《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唐】李益撰 范之麟注（1985），《李益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高适撰 刘开扬笺注（1981），《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 【唐】司空图 杜黎均译注（1988），《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北京：北京出版社。
- 【唐】殷璠撰、王克让注（2006），《河岳英灵集注》，成都：巴蜀书社。
- 【唐】戎昱撰 臧维熙注（1982），《戎昱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五代】王定保（1959），《唐摭言》，北京：中华书局。

- 【五代】孙光宪（1981），《北梦琐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五代】刘昫等（1975），《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 【宋】范曄撰 【唐】李贤等注（1965），《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 【宋】欧阳修 宋祁撰（1975），《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 【宋】欧阳修撰 李逸安点校（2001），《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 【宋】范祖禹（2004），《太史范公文集》，收录于《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
- 【宋】洪迈（2004），《容斋诗话》，《中国诗话珍本丛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宋】王溥撰（2006），《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宋】王钦若（2006），《册府元龟》，江苏：凤凰出版社。
- 【宋】王应麟（1990），《玉海》，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
- 【宋】计有功撰（1985），《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宋】姜夔著 郑文校点（1962），《白石诗说》，收录于郭绍虞《六一诗话、白石诗话、滹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宋】乐史撰 王文楚等点校（2007），《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
- 【宋】司马光编、胡三省注（195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 【宋】苏轼撰 【清】王文诰辑注（1982），《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 【宋】袁枢（2005），《通鉴纪事本末》，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宋】严羽撰 郭绍虞校释（1961），《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宋】周去非（1936），《岭外代答》，收录于王云五主编《桂林风土记、岭外

代答(一)》，上海：商务印书馆。

【宋】朱熹撰 蒋立甫校点（2001），《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晁公武撰 孙猛校证（1990），《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朱熹撰（2002），《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祝穆撰 祝洙增订 施和金点校（2003），《方輿胜览》，北京：中华书局。

【宋】李昉等编（1961），《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

【宋】陆游撰 孔镜清选注（1987），《陆游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脱脱等撰（1975），《金史》，北京：中华书局。

【元】马端临（1986），《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

【元】陈绎曾（1983），《诗谱》，收录于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

【元】吴师道（1983），《吴礼部诗话》，收录于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元】辛文房（1957），《唐才子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元】许有壬（2003），《至正集》，收录于《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胡应麟（1958），《诗薮》，北京：中华书局。

【明】胡震亨（1981），《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金圣叹著 陈德芳校点（1999），《金圣叹评唐诗全编》，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

- 【明】谢榛（1983），《四溟诗话》，收录于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 【明】许学夷撰 杜维沫校点（1987），《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明】陆时雍（2003），《唐诗镜》，收录于《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明】冯梦龙撰、魏同贤主编（2007），《冯梦龙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
- 【清】徐松（1984），《登科记考》，北京：中华书局。
- 【清】董诰等编（1983），《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 【清】顾祖禹撰 贺次君 施和金点校（2005），《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
- 【清】贺 裳（1983），《载酒园诗话又编》，收录于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胡文英撰 李花蕾点校（2011），《庄子独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清】彭定求等编（1999），《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
- 【清】潘德輿（1983），《养一斋诗话》，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乔亿选编 雷恩海笺注（2008），《大历诗略笺释辑评》，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清】沈德潜选（1963），《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
- 【清】沈德潜（1978），《说诗碎语》，收录于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沈德潜（1979），《唐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施补华（1978），《岷佣说诗》，收录于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谭献（1959），《复堂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清】叶燮撰 霍松林校注（1979），《原诗》，收录于郭绍虞主编《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碎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清】王夫之（1975），《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
- 【清】汪森（2003），《粤西文载》，收录于《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吴广成（2002），《西夏书事四十二卷》，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余嘉锡撰（1983），《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
- 【清】纳兰性德撰（1983），《渌水亭杂识》，收录于江苏广陵古籍刻印出版社编《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
-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1987），《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 【清】朱彬撰 饶钦农点校（1996），《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

二 中文论著

- 广西民族研究所编（1982），《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2000），《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国维（1998），《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立（2003），《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沈阳：辽海出版社。

-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1993),《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叶庆炳(1987),《中国文学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 许总(1994),《唐诗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邢昉(2008),《唐风定》,转引自乔亿选编《大历诗略笺释辑评》,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陈伯海(1995),《唐诗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陈良运主编(1998),《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陈寅恪(2001),《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岑仲勉(2000),《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朱光潜(2005),《诗论》,北京:北京出版社。
- 李泽厚(1981),《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
- 李志慧(1988),《唐代文苑风尚》,台北:文津出版社。
- 李元洛(1990),《诗美学》,台北:东大出版社。
- 林志敏(2014),《儒家诗教复变——以中唐诗歌为探讨中心》,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 吴廷燮(1980),《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 吴宗国(1992),《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 吴钢(2000),《全唐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
- 吴在庆(2006),《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
- 杨芳灿 郭楷(1968),《灵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 张伟然(1995),《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张国刚(2010),《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范之麟、吴庚舜主编（1989），《全唐诗典故辞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
- 周 珽（1989），《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自刘初棠《卢纶诗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郑晓霞（2006），《唐代科举诗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胡经之、王岳川（1994），《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柯庆明（1985），〈略论唐人绝句里的异域情调〉，收录于吕正惠《唐诗论文选集》，台北：长安出版社。
- 俞陛云（2008），《诗境浅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俞陛云（2008），《诗境浅说续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钟文典主编（1999），《广西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 郭绍虞编选（1983），《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钱 穆（1996），《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 钱 穆（1989），《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
- 钱钟书（2001），《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
- 钱谷融 鲁枢元主编（2003），《文学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陶东风 徐莉萍（1993），《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浙江：杭州大大学出版社。
- 唐圭璋（1965），《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
- 袁行霈（1996），《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袁行霈（1999），《中国文学史》（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黄永武（1976），《中国诗学·鉴赏篇》，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 黄永武（1986），《字句锻炼法》，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

- 黄维梁（1987），〈唐诗的现代意义〉，《唐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黄惠贤、陈锋（1996），《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逯钦立辑校（198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
- 蒋寅（2007），《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蒋寅（2009），《大历诗风》，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程俊英、蒋见元撰（1991），《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
- 傅璇琮（1980），《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
- 傅璇琮（1996），《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傅璇琮（2004），〈卢纶家世事迹石刻新证〉，收录于《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郑州：大象出版社。
-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撰（1973），《鲁迅全集》第五卷《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缪文远等译注（2007），《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
- 潘守廉修、张嘉谋撰（1976），《南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 颜进雄（1996），《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 冀朝鼎著（1981），《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戴伟华（1994），《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戴伟华（2006），《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北京：中华书局。
- 戴伟华（2007），《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修订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 外文中译论著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1958），《生活与美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丹纳著，傅雷译（1986），《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华兹华斯（1979），《〈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序言》，收录于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张竹明译（1982），《物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著 许金声等译（2007），《动机与人格》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日】松浦友久著（1996），《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丹麦】勃兰克斯（1982），《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赫士列特著 袁可嘉译（1961），《泛论诗歌》，《古典文学理论译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著，【加】罗宾森英译，楚荷中译（2007），《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 学位论文

于伟（2012），《杜牧诗文与幕府生活》，山东大学，山东。

张巍（2007），《李益边塞诗论稿》，吉林大学，吉林。

熊烜艺（2008），《卢纶诗歌的心态研究》，西南大学，重庆。

五 期刊文献

万春、杨敏（1999），〈无所依归的人生悲凉——《古诗十九首》感伤内涵的文化探索〉，《宿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卞孝萱、乔长阜（1988），〈卢纶的生平与创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王胜明（2009），〈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石克鸿（1997），〈李益边塞绝句的意象组合〉，《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1期。

孙涛、张晋光（2012），〈论安史之乱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临沂大学学报》，2012年第01期。

李浩（1993），〈论唐诗中的时空观念〉，《唐代文学研究》第四辑，中国会议，1993年6月。

邵逢（1982），〈诗人戎昱在桂林逸事一则〉，《学术论坛》，1982年06期。

杨国宜 陈慧群（1991），〈唐代文人入幕成风的原因〉，《安徽师大学报》第19卷，1991年第3期。

孟昭兰（1988），〈情绪的组织功能——关于情绪对操作的影响的几个实验总结〉，《心理学报》，1988年第2期。

苑汝杰（2011），〈唐代淄青镇：内在文化原因析论〉，《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郭润涛（1997），〈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郭 弘（2007），〈色、音、情的完美组合——析李益七绝《从军北征》艺术特色〉，《社科纵横》，2007年第9期。

陶东风（1992），〈中国文学中的死亡主题及其诸变型〉，《文艺争鸣》，1992年6月第3期。

葛晓英（1994），〈中唐文学的变迁〉，《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7月。

蒋 寅（1990），〈大历时期的江南地方官诗人——大历诗论纲之一〉，《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鞠 飞（2007），〈韩翃生平补考〉，《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7年10月。